

## 中國最高家庭的 經濟報告



- 戏台女皇梦：  
样板戏秘闻实录
- 祸起萧墙：  
皇权之痼疾
- 张自忠将军之死

### 國際特快專列在

### 邊陲被截

### 中央電視臺的

### 明星與保鏢

### 從民族資本家到國家副主席





1985年夏的一天，外孫女棉棉自己扎了許多小辮子，鄧小平一把攔住，說：“抓住小辮子”！熟悉“文化大革命”歷史的人都知道，鄧小平正是以不怕抓小辮子（即不理睬“四人幫”的攻擊詆毀）的精神同江青一伙堅決鬥爭的。

□ 偉人的生活情趣

# 扉页导读

## 来自中国最高家庭的经济报告

卫士田云玉因为没能调上工资，闹了情绪。毛泽东得知后，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每月给他支付60元。田听了很高兴，差点儿要说感谢了，可又一想，拿了主席的工资，还算不算国家干部呢？万一主席不在了……

本文将告诉你，毛泽东怎样安排他的私人存款。

## 华国锋“钦定”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

每年的9月9日，人们会早早地看到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向毛主席纪念堂。这是华国锋又来看望毛主席他老人家了。华国锋的名字与毛主席纪念堂已经难以分开。当年他拍板决定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的旧闻渐渐演绎为新闻，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兴趣。

## 中央电视台的明星与“保镖”

剧里有明星，那里便有“追星族”，于是在由“橄榄绿”把关的中央电视台大门内外，便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感慨又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喜剧”：彼舌渴望一见杨澜，但是……对追星族爱莫能助，但不能动武……不行的话，也得动点武……成方圆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国麟赵忠祥打抱不平……”

## 戏台女皇梦：样板戏秘闻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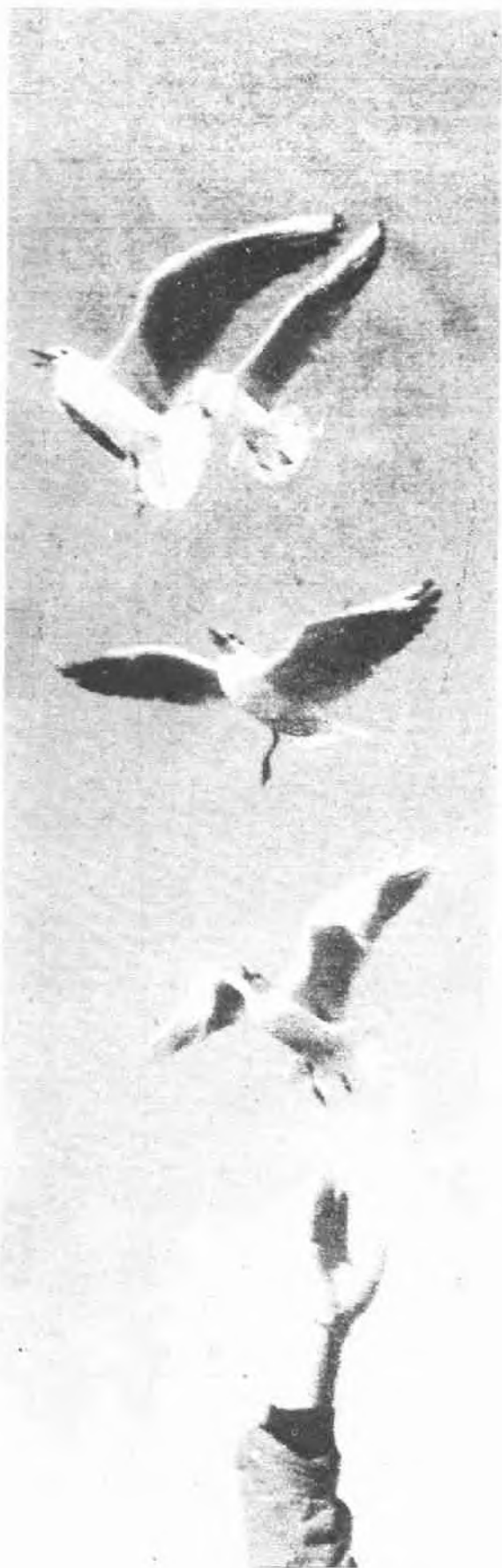
样板戏一度家喻户晓，人人哼唱，可是您知道江青一伙利用样板戏所搞的阴谋诡计吗？您知道样板戏的各种铁闸内幕吗？作者将以权威的知情人的身份告诉您这里鲜为人知的秘闻……

## 国际特快专列在边陲被截

1966年9月3日，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特快列车徐徐开进了边陲小城海拉尔，一场被载入中苏关系史的国际事件就此发生：一群十六七岁的红卫兵小将一拥而上，在国际特快列车上刷标语，发传单，贴毛主席像……一场不可避免的国际大混战由此开始……红卫兵的长途电话直接打给周总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反修小英雄”……

## 我在周总理专机上做空姐

这里叙述的是新中国第一代空姐在周总理专机上工作服务的难忘经历……



英 杰 谱

从民族资本家到国家副主席/李彦春 16

春 秋 笔

来自中国最高家庭的经济报告/江建高 4  
华国锋“钦定”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张凯 12

人 海 浪

我在周恩来专机上做空姐/马鸿杰 20  
中央电视台的明星与“保镖”/苏殿远 28  
留得齐璜翰墨魂——记白石大师女弟子姚陆其/牧青 38

殒 星 篇

上将许世友的生前死后/黎清 40  
张自忠将军之死/南友 46

古 镜 台

祸起萧墙：皇权之痼疾/田惠刚 50  
“医中之圣”李时珍/温济泽 52

同 根 结

拜谒台北胡适墓/叶维力 56  
朝祖团参拜神农节/刘永国 27

求 实 篇

戏台女皇梦：样板戏秘闻实录/晓高 58  
国际特快专列在边陲小镇被截/卢丹·里德 88  
“重庆号”巡洋舰的最后秘密/竹繁 94

\* \* \*

# 炎黄春秋

1993/9 (总第 18 期)

##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锲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 洪 炉

副总编辑: 刘家驹 杜卫东

总经理: 徐 孔

理事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霖

秘书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印刷: 河北省张家口市印刷厂

邮编: 100802



---

# 来自中国

## 最高家庭

●江建高



# 的经济报告

## 家庭总管李银桥如是说——

主席生前每月的工资，除去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外，所剩无几。五十年代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主席月工资两百元左右，江青月工资一百多元。他家里的经济开支实行包干制，家庭工资收入统一由我掌管。主席认真吩咐我：“家里的支出要有计划，吃饭不许超支，衣服不经我允许不能做新的。”

我根据主席的家庭“财政”方针，列出计划。伙食、衣服、杂费及节余都有计划表。当时我给他家定的伙食标准是每天3元。主席看过计划，觉得这标准高了。我说：3元一天的伙食还包括待客在内，不能再低了。主席便不再多说，提笔批上“照办”三字。

主席说一不二。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带领全国人民共度难关，他曾7个月不沾肉味。1953年至1962年9年整，他没添过一件新衣服。

主席的亲朋故旧特多，家乡湖南也时有亲戚朋友来访。亲友们在北京的花销，回家的路费，所赠北京特产或者给他们送件衣服什么的，所有款项都在毛泽东的工资中开支，所以经济是很紧张的。就说1953年10月那次吧。主席家乡韶山的乡亲毛月秋一行三人上中南

海作客。临行，主席叫我准备好礼物，他对乡亲们说：“我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送一点衣服和日用品，还有一点零用钱。”说完，叫我拿来礼品：每人一百块钱，一套新棉衣棉裤、内衣、鞋帽、蚊帐，另给年长的毛月秋老人送一件呢子大衣、一支钢笔、一副眼镜。事后，我对乡亲们说：“你们这次来北京，食宿和添制的几件衣服，都是主席自己掏的钱。他的钱并不多，这个月还用亏了。”乡亲们听了点点头，显得十分激动和不安。

为了节约开支，主席每个月都要抽空检查家里的收支帐目，听我们报告各项费用，并一再叮嘱不能超支。尽管他生活十分节俭，尽管有“朝朝留客不得穷”的古话，但因为主席太慷慨，亲友太多，所以家庭“财政赤字”是免不了的。幸亏他有一笔相当可观的稿费。

## 毛泽东的稿费当以数百万元计

迄今为止，还没有资料具体统计出毛泽东生前所得稿费数目。但可以肯定，这个数目是相当大的。比如五十年代《毛泽东选集》出版时，他一次获得的稿酬高



达一百万元人民币。《毛泽东选集》及其他文稿曾出版过俄文、英文、匈牙利文、保加利亚文等 10 多个语种的译本，这些国外稿费数字更大。

1955 年 1 月，中国外交部给毛泽东转去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付给他的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稿费支票，数额为 7299400 元。毛泽东得悉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呈送的《关于处理保加利亚文版〈毛泽东选集〉稿费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转送保共中央，“退回为好。”中共中央办公厅于是规定：今后凡此类问题，均将稿费转送各该国共产党。

对国内稿费，毛泽东把它交由中央办公厅下属的特别会计室保管，具体管理由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赖祖烈负责。其主要用途是：购置和印制书籍，资助社会名流亲朋故旧，支付身边工作人员的调查研究费用，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补偿江青的一些亏空，少量用来解决家庭“财政赤字”。

### 写书人得先买书

中南海丰泽园里有一个很高雅的四合院——菊香书屋。1949 年 8 月，毛泽东迁居丰泽园后，菊香书屋才真正名副其实。毛泽东博览群书，家藏万卷。据管理他图书的逢选知回忆，到 1966 年夏，他的藏书达六七万册之多。“毛泽东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菊香书屋的六七万册图书，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掏钱买的，少部分才是借的。买的部分图书有影印本、线装本、大字本，印制精美，造价特高。他晚年视力严重下降，看小号字非常吃力，书都印成大号字。特别是 1975 年他眼睛做过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所看书都要印成大大字线装本。印

书的钱，都从他稿费中开支。此项费用相当大。

有一次，毛泽东决定用他的稿费印一批书，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一套。后来，政治局委员们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怎么能用毛泽东的私人稿费给大家印书呢。从此以后，中央再没有用他的稿费印发过书籍。

### 资助社会名流、亲朋故旧

毛泽东视钱财如粪土，看仁义重千金。他一生节俭朴素，对社会名流、亲朋故旧却有求必应，热情相助。

1920 年春，毛泽东为了送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大数额银款。他到上海找章士钊，请其出面帮助。章凭其名望（曾任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部长、教育总长、政府秘书长，更有“古义士”之称）和热情，多方奔走，最后筹集到两万块银元。蔡和森、蔡畅、徐特立、李富春等旅欧求学者因此得以成行。毛泽东不忘章士钊对革命的帮助，公借私还。

1963 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对帮助他学习英语的章士钊之女章含之谈及过这笔借款，并说：“我从现在起开始还你老人家这笔欠了 50 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清。”

章含之大惑不解。回家问父亲。章老哈哈大笑道：“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

几天后，毛泽东即让秘书给章老送去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

章老原认为毛泽东只是说说，不会当真。他不肯收钱。因为当时的银元是募集起来的，并非他本人所有，现在却让他当债权人，问心有愧。他让人给毛泽东捎话：“这‘债’不要还了。”

毛泽东得知后风趣地道：“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章老一点生活补贴。要是我明说给他补贴，依老先生的脾气，是断然不会收的，所以我我说还债。”他吩咐秘书：“请转告老先生，我



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中付出的。”

到1972年，毛泽东“还债”已满10年，累计已还满两万元。帐已经清了，1973年春节过后，秘书把还债的事停了。毛泽东有点生气道：“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老先生的补助，哪能真的十年就停？”继而说：“告诉章老，从今年起开始还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该还多少，就这样还下去。章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就还下去。”

直到1973年秋，章老以93岁高龄逝世，毛泽东才停止给章老生活补贴。

毛泽东还用稿费赡养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老人。据毛泽东儿媳邵华回忆：全国实行薪金制后，毛泽东知道岳母生活困难，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按期给向振熙老人寄去生活费。有一次秘书忘了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让人补寄，以尽人子之情。

1950年春，向振熙老人八十岁生日，毛泽东特让长子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让岸英给外婆带去两棵珍贵的东北人参。1960年杨老太太九十寿辰时，毛泽东特意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信：“杨老太太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两百元，烦为转致。”杨老太太常同人说：别看泽东是个大人物，可他有一颗普通

人的心。1962年老太太不幸去世时，毛泽东立即致信妻兄杨开智：“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用他的稿费帮助过许多亲朋故旧。1950年10月2日，他致信私塾老师毛宇



毛泽东同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携手同行

居：“毛泽连（毛泽东堂弟——作者注）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旧币一万元值新币一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用。请告他们不要来京……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助其家用。”信末，毛泽东叮嘱：“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就是这位家贫多病的泽连（毛泽建烈士胞弟）堂弟，毛泽东没有给他一份“皇粮”，也没有给他一个铁饭碗，却从稿费中每年给他寄去两百元，如遇困难，略加补寄，直到1958年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为止。

从毛泽东的文稿书信中，还记载过如下帮赠数字：1952年12月，给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易南屏寄款300万元（旧币）。1954年10月，给韶山时的私塾同学郭梓材寄款300万元。1955年2月，给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毛森品寄款200万元。1955年5月，给邻居张四维200元（此时为新币），并给东山学校时的同学谭世瑛300元。1973年4月，给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师李庆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

毛泽东用稿费帮赠的亲友名流远不止这些。1963年他用稿费帮助清朝皇叔载涛修补房屋，数额为2000元。他还给从前的师友吴启瑞、谭熙春、符定一、张干、王季范、黎锦熙和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好友李淑一，从前的保姆陈玉英及家乡湖南的许多亲友，都给过数额不等的帮助。

## 专项支出及其他

毛泽东的稿费对调查研究工作，帮助他身边工作过的困难同志立有专项支出户头，同时还用来退赔工作人员下去多吃多占的款额。

毛泽东毕生重视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晚年他由于年事高及其他原因，不能深入一线了解实情，因此常感叹：自己下去调查，人家只给你看好的，不给看坏的。他建议组织一支干部部队，人员从基层的县、专区调来。一方

面担任警卫任务，另一方面下去搞调查研究，让他们将调查结果直接送他。毛泽东说：“这些人的路费由我出。”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67岁生日。他起床后不吃不喝，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在他深沉的思索中，烟灰缸满了，他才向值班卫士封耀松交待：“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和敬先、林克、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七人同毛泽东围桌而坐，陪毛泽东过生日。桌上没有酒，也没有肉，只是菜里油盐多了点。毛泽东的筷子伸向菜盘，旋又放下，一一环顾工作人员，然后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把情况反映上来。”接着又郑重地吩咐道：“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

那天夜里仍是封耀松值班。他替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时，毛泽东仍想着心事，眼里默默地流出两行浊泪。毛泽东抚着小封的后背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有许多事情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躺在床上睡不着，便又起床用宣纸给身边的七位工作人员写信；让他们去河南信阳专区调查。信中说：“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然而，就在毛泽东分期分批派身边工作的同志下去调查时，有少数人在下面随便收礼物，多吃多占，且数额不少。毛泽东得知，一面对他们进行教育整顿，一面派人下去退赔。从天津开始，然后河南、山东、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一路退赔去，多吃多占多少便退赔多少。这次共退赔款两万多元，是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开支的。

在毛泽东的家庭经济支出表中，对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困难同志进行帮助，也立有“户

头”。五十年代，卫士张瑞岐给毛泽东写信，说回家乡后生活困难。毛泽东对这位曾在警卫排工作过的老同志很关心，吩咐李银桥从稿费中取出数百元寄去。旋即，警卫战士李二亭从家乡来信叫苦，毛泽东又吩咐马上寄钱。卫士田云玉工资低，生活困难，毛泽东也给过资助。

1964年，卫士长李银桥到天津工作后，毛泽东听说李的家乡遭了灾害，便又吩咐秘书从稿费中支出1000元帮助他。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为了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学文化，提议办一所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并叫秘书从他的稿费中拿出一部分，为学习者买来了书包、课本、作业本、字典和笔墨，每人一套——毛泽东的稿费简直成了社会福利基金了！

## 中南海边的游泳池和西子湖边的别墅

毛泽东生活节俭简朴。他穿衣的标准只有两条：不露肉，不透风。一些报刊把他写成穿补丁衣服的形象。其实，他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内衣、内裤和粗线袜子上。这些补丁“千姿百态”，布合不合色都不要紧，只要不透风，穿着暖和就行。他说：补丁在里面没关系，别人看不见，我自己不嫌就行。毛泽东的外衣补丁不多，有，也比较讲究：补的布要与衣服合色，补丁形状要整齐，针脚要细密。他说：“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毛泽东吃的更简单随便。统帅三军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他最好的享受是一碗红烧肉。

毛泽东亲切问候韶山乡亲



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是蔬菜淡饭，只是每餐少不了辣椒。他的伙食补助费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开条，经他批准，从稿费中开支。除外宾外，他请客的费用也从稿费中开支。他请客的膳食标准是四菜一汤，从不超出这个规格。这四道菜由客人点一个，自己点一个，再配两个蔬菜一个汤。

毛泽东严于律己，最反对生活特殊化。1954年春，由江青提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背着他同行政处商量，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修了一座小型游泳池。毛泽东后来看到，立刻沉下脸来问：“怎么回事？哪里来这么个池子？”

工作人员解释：这是专为您个人修的，主席最喜欢游泳。

毛泽东顿时来了脾气：“给我个人修？为什么不报告？我们刚进行了抗美援朝，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节约每一分钱。我说过许多次了，为什么还给我个人修？”

为此，毛泽东于是年4月25日致信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诸同志：

“汪青此信（指江青1954年4月20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建游泳池一事作了检讨——引者注）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5亿（旧币——引者注）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毛泽东

1954年4月25日”

这座游泳池毛泽东一次也没有下去游过，建好就被封闭了。

与毛泽东截然相反，江青却是生活特殊化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前，她以治病养病为名，夏天到青岛或北戴河，秋天住北京，冬天赴广州，春天到杭州（毛泽东讽刺她是“候鸟”），游遍名山胜水，享尽人间欢乐。在广州、杭州、上海、北戴河等地都有她高标准超规格的别墅。就以西子湖边雷锋塔左旁的那幢别墅为例看，别墅即将完工时，江青左看右看都不如意，亲临指挥装修，一切按江青意图：第一，隔音；第二，门窗双层玻璃，不能透风透灰尘；

第三，消除一切杂音，无论开闭门窗，各类家具用柜和抽屉，书柜玻璃以及地板、卫生间的马桶、自来水管开关龙头，电话电铃等，所有各物件都不能有声响；第四，房屋油漆一色苹果绿，家具同色，大窗帘墨绿色丝绒，小窗帘白色杭纺，灯罩、暖气罩、沙发套一律绿色；第五，别墅配有乒乓球房，电影放映房，健身房及洗印相片暗室，第六，与毛泽东睡房远隔，以免互相干扰睡眠（一次，毛泽东在此住下时，即告诉秘书：此处建筑过于讲究。他住不惯这般豪华的宫殿，住两天就到杭州别处住了，以后再也不肯来这里住）；第七，所有电器材料要最新式现代化的，所有房间配备电铃、电话机……如此豪华富丽的别墅，一位建房子的干部曾痛心地说：“装修这所房子的钱，足够我们几十个人吃用一辈子！”

据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花在她身上的精力，国家为她付出的代价，大大超过所有中央首长，超过毛泽东。她爱照相，有一回在广东一家商店看上了一架日本照相机，看上了就拿走了，根本不提付钱事，是广东省委给她付的帐。毛泽东知道后用稿费帮她付了帐。不仅如此，她让人用外汇买补品、买布料、买外国黄色的、刺激的电影拷贝，甚至用外汇买冷霜之类的化妆品。1958年，毛泽东曾叫秘书查询过，他用稿费补偿给了国家。可是要真正查清江青前前后后耗费了国家多少钱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毛泽东与江青早在五十年代就分居了。工作人员不忍心为了江青的事打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的心境，对江青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毛泽东的遗产及其分配

毛泽东数以百万元计的巨额稿酬，现在还留有多少，是一个谜。在毛泽东生前，他用稿费给前妻贺子珍买药。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盘县时，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遭敌机轰炸。为掩护一位受伤的师政委，贺子珍的头部背部14处受伤，其中有的弹片伴随她

终生，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1937年，她是为了养伤也为了学习才离开毛泽东去苏联的。1948年回国后，仍经常生病。毛泽东几次派人四处寻找治病良药，买好送去。

据贺子珍回忆，1975年中央办公厅曾给她送去两万元，这也是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开支的。她用来买了一台彩电、一部高档录音机。余款3000元在她1984年去世后，上海市委老干部处把它交给了贺子珍之女李敏。

江青曾向毛泽东要过钱，而将她自己的工资存入银行。毛泽东从稿费中批给江青3万。此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的刘松林（长子岸英遗孀）、毛岸青、毛远新（毛泽民烈士之子）及女儿李敏、李讷等的开支，都记在毛泽东的帐上，毛泽东都用他的稿费支付。毛泽东晚年自己动用的稿费，每年不到一万元，特别是他晚年患病后，深居简出，这方面的花费更少了。

毛泽东去世后好几年里，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子女）提及过他的遗产——保存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的稿费问题。1981年，中央办公厅派人找到毛泽东的长女李敏，了解她的生活和要求。李敏说：“我没有什么奢求，如果可能，我只想要爸爸原来要给我的一份。”

这样，李敏得到了中央办公厅送给的8000元现金和一台20英寸彩电、一台电冰箱。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又给李讷送去一台彩电和一台冰箱。1975年，毛泽东曾批给李讷8000元现金，助其家用。

毛泽东的稿费遗产，二儿毛岸青也同样得到一份。

## 毛泽东的金钱观

毛泽东一生献身革命，追求真理，鄙视金钱和物质享受。他年轻时曾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约定“三不”：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家庭琐事。他在致友人彭璜信中说：“吾人惟有

主义之爭，而无私人之爭。主义之爭，出于不得不爭，所爭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

早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一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作客。原来约定是要谈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并且当着他的面把佣人喊来，为着买一块肉的小事仔细吩咐了老半天。毛泽东对此事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自己的朋友，以后就不再跟他来往了。

物换星移。三十多年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了。在个人生活上毛泽东仍然克勤克俭，清淡如水。

1956年在第一次调工资时，卫士田云玉未能如愿，在单位闹了点情绪。毛泽东得知后，准备从他的工资和稿费中按月给些帮助，说：“我给你60元钱一月可以不可以？”田听了很高兴，差点要说感谢了。可他定神一想：拿了主席的工资还算不算国家干部呢？万一主席不在了……他喃喃道：“这怎么行啊？主席，那样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

“啊？”毛泽东显然没想到这一层。他怔了怔，点点头，发表了他对于金钱的联想和感慨：“唉，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可是我拿它也没办法，现在谁拿它也没办法，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指1918年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每月只有8元钱。到街上买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极了。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饺子吧？有一次我坐火车去上海，坐火车没有钱，借了人家的钱去。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到浦口下车才知道。正好碰上熟人，又借了钱，才买了鞋子买了车票，这才到了上海。钱就是这么讨厌，可是有时没有还不行。”

毛泽东毕生视金钱如粪土，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无法估价的巨大财富。

〔责编：穆图〕

# 华国锋“钦定”

## 毛主席纪念堂

报载，每年的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人员都会早早地看到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来，他们知道这是华国锋又来看望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在毛主席的诞辰或是忌日拜谒毛主席纪念堂成了华国锋多年养成的习惯。这位当年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这感情绝难用语言和文字加以表达。当他神情肃穆地行走在纪念堂前笔直的甬道上时，他是否会眯起眼睛再一次仔细端详眼前这高大的建筑物？当他定定地站在毛泽东那富丽堂皇的水晶棺前，他又会想到什么呢？是“你办事，我放心”的无价承诺？还是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壮怀激烈？抑或是往事如烟，世事蹉跎的感慨？

当然，他不可能不会想到这座占地5.74公顷的巨大陵墓以及他为它做过的一切。因为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建筑史上，华国锋的名字与毛主席纪念堂已经难以分开。他亲笔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金字匾额至今还高悬在纪念堂的风雨檐下。当年他拍板决定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的旧闻也渐渐演绎为新闻，并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

且让我们的文字回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主席纪念堂刚刚开始破土动工时，全国29个省市都曾为它捐献过自己最具特色的物产，北京有上百万市民曾自愿到工地去参加义务劳动。翻阅当时的报纸，有多少整版对它的报道，赞美它如何壮丽辉煌，如何庄严肃穆，是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一座伟大建筑。然而，当年夏天的某一个清晨，它四周高大的木板围墙突然撤去时，围观的人们却都迷惑地眯起



---

# 设计方案

●张 凯



## 春秋笔

了双眼。没人说它的形状不好，可是又不知该说点什么，流过心底的是一阵长长的惆怅。当时参加纪念堂设计组的吴观张和马国馨苦笑着回答，它完全是那个年代必然中偶然的产物。

本来，按照吴观张的设想，应该像北大校园内的斯诺墓一样，在一个风景秀丽之地为毛主席立一块洁白的石碑，朴素而又肃穆。然而，他的建议立刻就遭到了否定，毛主席是不能被埋在地下的，虽然他已经去世，也必须像活人一样，要住在房子里，而且还得住在人民中间，让老百姓常常见到他。

于是便决定建陵，这是最高的规格。可是陵该建

在哪儿呢？十三陵不行，那里是皇帝的墓穴，况且离北京又太远。香山也不行，在那儿建陵将与中山陵过分相似。玉泉山也不行，那里中央首长的住房太多，地下还净是洞。景山也不行，虽说它地理位置适中，却是吊死崇祯皇帝的地方……

建陵不成，于是又决定降格一级，建堂。可堂又建在哪儿合适呢？有人建议建在午门前的空地内，这显然不行。有人甚至建议就建在天安门上……

议来议去，最后决定堂地选在北京两条中轴线的交叉点上，这里虽然不能造陵，但却符合两大政治条件：一是可以盖座房让老人家住，二是居于市中心，确实是生活在人民中间。当然，这中间也许还有一个潜在心理因素，那就是它相距故宫太和殿皇帝的宝座不过数百米，而且同一条皇城中轴线上，南北相对。







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

当然，也许最终批准它的人并没这样想过，可许多老百姓想到了，凭着朴素的感情，他们满意。

中国人反了一个世纪的封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可以说人人提起封建二字都咬牙切齿，但到了讲排场的时候，也只有封建所具有的规模和威严才能使大家默然。

堂址既定，那形状呢？中国的建筑师们充分运用了那个时代的想象力，有的设计成金字塔，有的设计成芒果，有的设计成文冠果或万年青……在一连串的否定之后，设计组的成员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他们后来设计出了一个巨大的圆顶形建筑，顶上覆盖着火红的玻璃钢，白天放光，夜里也放光，简直就像半轮从地里钻出来的红太阳，可最终连它也被否定了，因为国内的建筑材料还不过关。

也就在同时，他们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个事实，按照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纪念馆的地基已经夜以继日地打好了，它是标准的正方形，那么答案

也就别无选择，必须是正方形，他们只好赶制出两个同类模型送政治局审批。其中，多数人认为相对好一些的一个，被列为第一号。

第一号模型摆在桌子上，政治局委员纷纷表示赞同。等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进来时，桌上摆的已经是第二号模型了。

“这个好啊！”华国锋用他软软的山西口音称赞道。有人告诉他另外还有一个模型，他问：“哪一个高呀？”论高，自然是第二号模型高，它高达33.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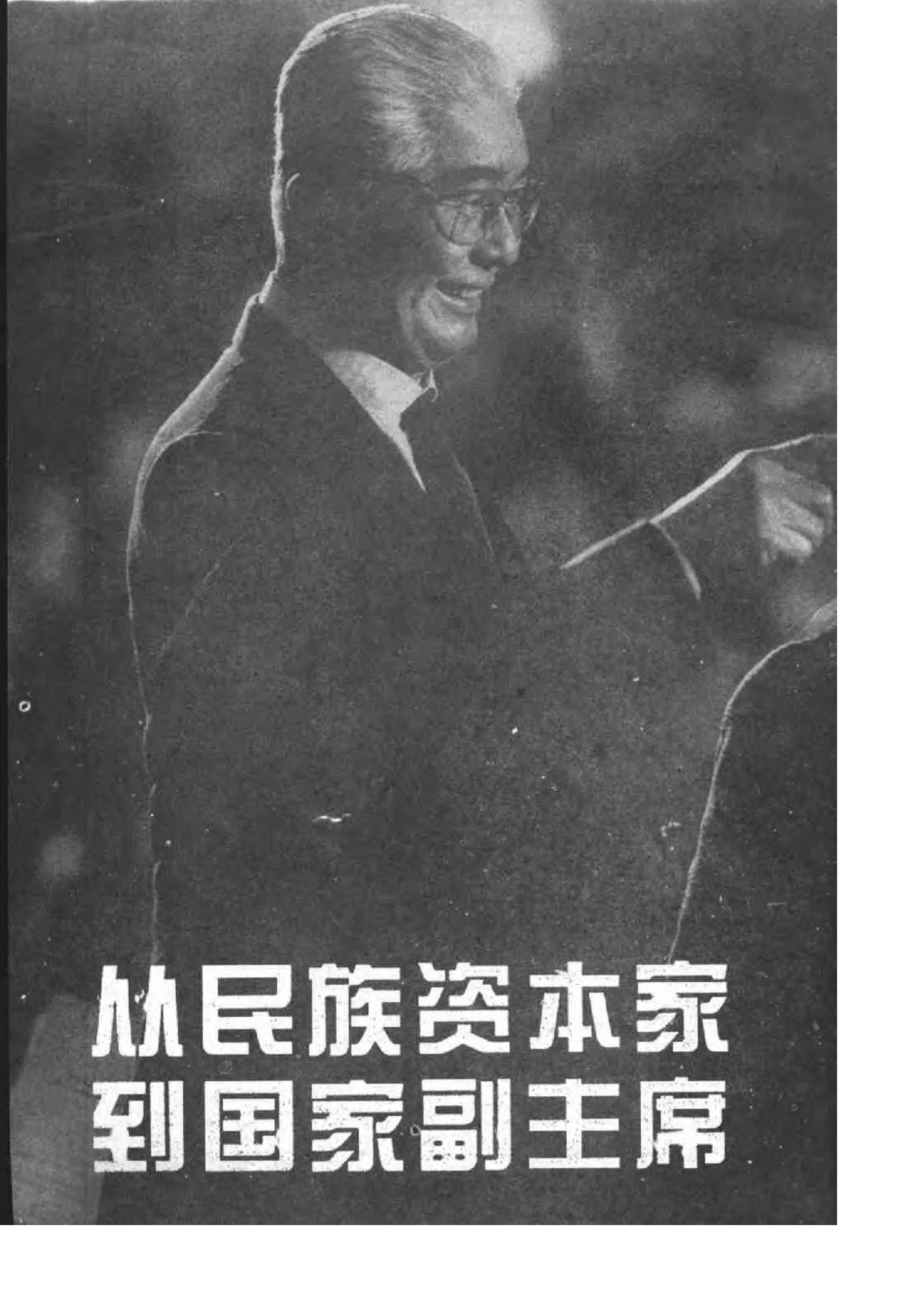
“那就用这个吧！”

华国锋肯定，其他人自然也纷纷表示首肯。

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占地5.74公顷的毛主席纪念馆。

在这里，毛泽东——这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时代伟人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接受着千千万万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的瞻仰……

（责编 禾图）



# 从民族资本家 到国家副主席

1993年3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

一个举国关注,世人瞩目时刻。2931名人大代表将作出一项庄严的选择。1200名中外记者把成百上千个镜头对准了会场,对准了主席台。

18时许,大会主持人胡锦涛宣布:

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荣毅仁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宏大的万人礼堂内,顿时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闪光灯竞相闪烁,记者们记下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走上前来,同荣毅仁热烈握手,人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荣毅仁将自己的心情归结为一句话:我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要全力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好……”

3月28日,全国诸家大报在二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荣毅仁的照片;新华社北京3月27日专电,公布了荣毅仁的简历,短短的400字概括了他走过的漫长的人生历程:

1916年5月生,江苏无锡人。

1937年后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的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

……

第一至七届人大代表,第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届人大副委员长……

荣毅仁用为人民效力的坚实步伐,走过了从民族资本家首户到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漫长历程。

1949年,人们面临着一种抉择。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和他的家人留了下来。他的举动一时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悬念……

1949年4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挥师百万,直取江南,上海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囊中之物。上海的资本家纷纷出走,有的去了海外,有的去了台湾。而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和他的家人都留了下来。他的举动一时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悬念。

荣家的创业始自荣毅仁的父辈。1896年,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在上海开设钱庄。由于他的作风稳健务实,谨言慎行不做投机生意,讲信誉,到解放前夕,荣家在全国各地经营的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厂共有24家。荣家被外电称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然而,由于蒋介石集团政治反动、军事与外交无能,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荣家产业横遭

摧残。抗战结束后,荣家步履艰辛,磨难不断。1946年荣毅仁的71岁的父亲荣德生被绑架34天,终于以交出50万美元与绑匪“成交”。早在北伐时期,蒋介石就敲走荣家10万银元。1949年5月23日,国民党军队在荣家门前架机枪,以占房子为要挟,结果是

拿走500元大洋了事。还有人状告荣毅仁,法庭让他准备出庭,结果是又被敲走5000美元“了结”。

遭此种种,荣家父子对“国民政府”曾经有过的所有幻想,都被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摧毁了。面对渡江的百万解放军,荣家父子想:共产党来了,总不会比国民党还坏吧!年迈的荣德生表示死不离故土,并叮嘱子女不得把工厂迁往海外。于是,荣毅仁把已在香港的妻子儿女接回上海。这样,他个人和他的产业就都留在了共产党人解放了的上海。

在历史的大决战中,荣毅仁客观上把赞成票投给了共产党。

“我们跟着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党是不会抛弃我们的。”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荣毅仁成为社会主义的积极建设者。

1937年,荣毅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每年寒暑假他要去荣家工厂实习,熟悉企业管理业务。毕业后他开始企业家生活。解放时,33岁的荣毅仁已是茂新面粉厂、上海福新面粉厂、申新纺织印染厂等企业的经理了。1950年,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荣毅仁时,称他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

从1949年6月开始,上海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有关领导和上海市政府领导帮助留下来的荣毅仁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党和政府在有关税收等重大决策上主动征询他的意见,并推动工商界人士建立自己的组织。荣毅仁耳濡目染,对比国民党的行径,共产党人确实是想把国家建设好。他庆幸自己做出的选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积极建设者。

1955年年,荣毅仁向上海市人代会保证:“我要把所得到的利润,投资企业,购买公债,支援国家建设。”他表示:“我要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做一个真正的同志。”

1957年1月,荣毅仁当选当上海市副市长。毛泽东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家现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



影响,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陈毅说:“凭着他(指荣毅仁)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深深镌刻在荣毅仁及家人的心中。

1959年,荣毅仁奉调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到“文革”结束,这时期,荣毅仁遭受过误解、不公正乃至非礼,甚至被抄没家产,扫地出门,去扫街,挑煤。

但就在这期间,毛泽东仍明确指出:“要把荣毅仁与右派区分开来。”周恩来多次保护他、鼓励他。因而,荣毅仁坚信:“我们跟着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党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你来牵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荣毅仁当选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富国之路。由于荣氏家族海外亲友众多,联系广泛,邓小平同志理所当然地想到了荣毅仁这位与党风雨同舟几十年堪当重任的人才。

1979年1月,邓小平找来荣毅仁等几位原工商业者,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你来牵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要排除干扰,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邓小平要求荣毅仁探索发展经济的新路子。荣毅仁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论证,拿出了按国际惯例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下简称中信)的方案。中南海迅速拍板,荣毅仁当选中信董事长。此时他人已近古稀之年,为了国家和民族,荣毅仁又一次鼓起风帆。

中信在荒地上开辟了第一条路,第二条路……美国权威刊物评选,荣毅仁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邓小平题词,“勇于创新,多做贡献。”

1979年10月4日,荣毅仁创建的由16人组成的中信公司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和平宾馆的七八间客房里。荣毅仁上任不久,就率团赴海外考察,研究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些科学的有效做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公司筹备之初,国家拨款尚未下来,荣毅仁自己拿出存款,垫作开办费。荣夫人杨鉴清也把一大笔款

项交给现任副总经理王军,以解公司之急。

中信在探索中前行,在夹缝中生存。为了树立企业的信誉,荣毅仁规定下属“有客必见、有问必答、有信必复”,并提出“积极、稳妥、主动”的要求。在他的带领下,中信在一片荒地上开辟了第一条路、第二条路……他们创办了中国诸多第一。

—1982年,国家22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资金不足,准备下马,损失不可估量。纺织部找到荣毅仁,熟悉商品经济又懂得国际惯例的荣毅仁产生了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去融通资金(即借债)的想法,这与当时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经济思想是相悖的,一时间,议论纷纷。荣毅仁坚持自己的选择。1982年1月,100亿日元债券在日本东京首发成功。这一举措,被称为“仪征模式”,即“借蛋孵鸡”,后来,这一负债经营的模式被各企业接受并采纳。

—1981年,中信的租赁公司从日本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租进汽车各200辆,两年不到,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租赁业务在中信发展成为一大系统。

—1985年7月,国际大厦(巧克力大厦)拔地而起。100多家外商机构租户迁入。这座投资3000多万美元的国内第一家公寓写字楼,三年时间收回全部投资。

—1981年,中信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际经济咨询公司。

—1988年2月,中信技术公司和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和记黄埔通讯公司各出资三分之一,在香港组建了亚洲卫星公司,共同经营“亚洲一号卫星。”1990年4月7日,中国的“长征3号”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太空,引起国内外关注。目前,“亚洲一号卫星”的24个转发器全部出租。

14年来,中信迈出的每一步都凝聚着荣毅仁与合作者的心智。从14年前在和平宾馆租用客房到今天的京城大厦,开辟了一条“中信”之路。

如今的中信已发展为近30000人的直属国务院的大企业,1992年底,总资产达507亿,拥有30家子公司,投资企业达600家,其中著名企业有:广州标致、国安集团、小鸭—圣奇奥洗衣机厂、江苏利港集团、山西安太堡露天煤矿、渤海铝业有限公司、利嘉皮鞋有限公司等,荣毅仁靠着他的声誉引进外资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4年8月,邓小平给中信题写了“勇于创新,多做贡献”八个字。

1986年底,美国权威经济刊物《幸福》半月刊公布了该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的

名单,荣毅仁成为新中国成立40年来跻身于世界知名企业行列的第一人。在这份刊物上题:“他们是振兴工业的强有力的人物,他们代表了重要的趋势,今后若干年内他们将在广泛的范围内起影响作用。”

荣毅仁立下军令状,并率先垂范,以儒为本兼继父辈守信家风,他把荣家叱咤实业界的真经带给了中信。

荣毅仁自创办中信公司后,他给中信人立定了32个字的军令状: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谦虚谨慎、团结互助、勤勉奋发、雷厉风行。他自己是中信风格的严格执行者,中信人称荣老板是中信风格的楷模。

中信成立14年,无论过去的巧克力大厦还是现在的京城大厦,老百姓对它了解很少,人云亦云地罩上一层神秘色彩。这源于老板恪守着少说多做,只做不说的语言。到了非说不可的情况下,老板的又一原则是,谈公司可以,免谈我个人。

荣毅仁办中信的明确目标是为国家办实事。他常说的两句话是:我们要有利可图,但不唯利是图。

荣毅仁的经营哲学是以儒为本兼继父辈守信家风,他将这荣家叱咤实业界的真经带到了中信。当某企业恢复了元气,欲把他们输过气的中信用掉,面对愤愤的中信人,荣毅仁说:“把事情做成了,给国家解决了问题,就成了,宠辱都不要考虑。”

中信人熟悉他稳健务实的作用。他让下属整理的会谈记录、起草的文件和祝酒辞等,一律开门见山,脉络清晰,繁文缛节性的词句他一概删去,一位下属感慨地说:“跟老板多年,形容词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

“荣毅仁是个大老板,有钱。”不明底细的人这样想。其实他节约过日子的事,很少为人知道。当下属把用过的一面复印纸给他复印材料时,荣毅仁会高兴地说:“他是个把中信当成家的人。”1989年上半年,荣毅仁在加拿大休假,敏感人士捕风捉影地说他跑了。荣毅仁风闻后,不顾发作的心脏病,立即乘飞机回国。

同年10月,荣毅仁以“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的名义出国邀请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名世界要人。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人会见了他们,礼遇隆重,在世界产生了影响。荣毅仁以个人的魅力、公司的信誉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

荣毅仁的魅力为他在海外赢得了朋友,为公司招来合作者,为国家争得脸面。

荣毅仁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国对家情牵依依,他对夫人杨鉴清说:“我是先国家,后公司,再家庭。”

荣毅仁有一子四女,儿子荣智健任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大女儿在澳门,他对这个在“文革”中因为他蹲过监狱的女儿格外疼爱。

荣毅仁在他77岁的时候走上了国家副主席的新岗位,承受着人民给予他的新重任。在此前一天,3月26日,他在与浙江省领导晤谈,参与开发宁波大榭岛的有关事宜。一个新的经济特区15年后将在他亲手创办的中信手下诞生。

## 荣毅仁告别中信公司

3月30日,京城大厦四层会议厅。

新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正在主持中信公司第11届董事会。这是他最后一次以董事长的身份参加董事会了。从此他将退出工作了14年的中信公司。

会场充满了分别前的氛围。荣毅仁操着浓重的无锡口音说:“在八届人代会上,我被选为中国副主席,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际惯例上都不适宜再担任中信的工作了。”回顾中信之路,荣毅仁流露出对曾创业过的中信的眷恋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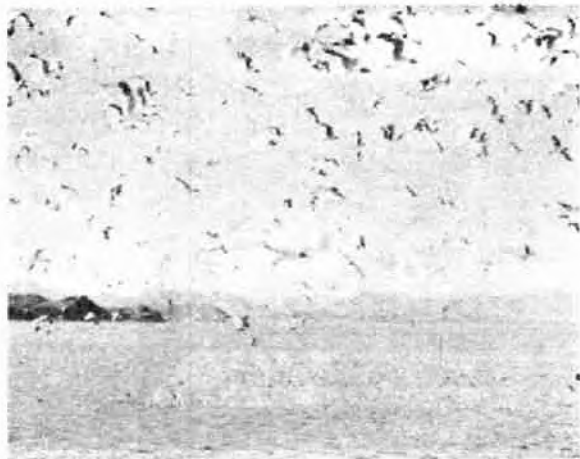
他希望中信在新的董事会的领导下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

中午,到会的董事、员工和记者50余人,在荣毅仁亲自起名的“两宜轩”餐厅共进午餐。

餐厅全体员工送来一个直径半米的大蛋糕,上书:“恭贺荣毅仁荣任国家副主席”、“恭贺中信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召开”。

重颜鹤发的荣副主席微笑着切开蛋糕……

作者:李彦春 摘自《北京青年报》



1955年9、10月间，新中国民航第一次招收空中乘务员，我有幸被挑选上了。而且后来还被

# 我在周总理专

——中国第一代空姐自述

●马鸿志



在飛機上同機組工作人員合影。

分配到周总理专机上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光荣也最难忘的经历。

# 机上做空姐

1955年，我还是一个天真的中学生。虽然面临高中毕业，但我仍是成天价无忧无虑。

民航局第一次招收空中乘务员，当时是非常保密的。事先也没有发招工通知，更没有招工简章，全北京市招收的十几个人，都是从各中学选派的。一天，学校一位姓肖的老师突然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到飞机上去工作。50年代，人们对民航还是非常陌生的，尤其是对好奇心重的女孩子来讲，能经常坐飞机飞上蓝天，翱翔于云雾之中，从天上俯视祖国大好河山，周游世界各国……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景象啊！我就是抱着这无边的遐想，踏进了民航的大门。

这年的11月，我接到了中国民航总局的录用通知书，这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民航总局招收的第一代“空中小姐”共18人。除两位姐妹是从部队转业来民航工作的以外，其余16人都是从各中学挑选的。我们正式进入民航以后，经过短期的培训，其中有五个人分配到广州、兰州及成都民航管理局工作，我和另外十二个姐妹被分配到北京民航管理局飞行大队，成立了一个乘务组，我担任组长。

那时候的新中国民航，航线少，机群差。在各条航线上飞的飞机，大多是苏联制造的中型客机，设备条件、飞行速度，远远不能和现在的大型波音飞机和“空中客车”相比。

我值乘的飞机，实际上是一架只有10多个座位的苏制伊尔14。这种飞机，现在绝不会去国际和国内主要航线飞行了。可在50年代，它还是一种了不起的飞机呢。

50年代，周恩来总理经常坐飞机到各地视察和出国访问，大多数时间，他都坐这架飞机。所以，大家都称这架飞机是周总理的专机。

“我们是半个老乡呢！”

周总理一向工作很忙，就是在旅途中的飞机上也

是不停地工作，常常是刚坐上飞机就开始批阅文电，或同随行人员谈话，或同同机客人讨论国际间问题。他还利用喝茶休息的时间，找机会同机组的同志们谈话，亲切地关心着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

那是我刚上飞机不久，第一次在机上为周总理做服务工作，我们为能见到总理而万分激动，工作起来又总是怯生生的。总理似乎看出了我的窘态，就亲切地说：“小鬼，你是哪儿人？”我说是山东人。总理说：“不对吧？听说你的口音像是河南人？”听了总理的话，我的紧张心情一下没有了，笑着对总理说：“我从小随家里人到河南新乡等地，在那儿上的中小学，所以有不少河南口音。”接着我还说：“我老家是在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四省交界的地方，过去曾一度划归江苏、河南呢。”总理说：“噢！那么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今天你又跑到大山东边去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从那以后，每当总理再见到我时，不是说小老乡来了，就是笑着问：“你是山东人还是江苏人？”我见到总理就再也没有紧张的感觉了。

在民航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当时的新鲜感慢慢过去了，考虑的问题也多起来了，尤其是对女乘务员来说，什么交朋友呀！成家呀！将来不能飞了干什么工作呀！等等，都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思想问题。这些问题正在我们脑海里出现而又无法排解的时候，没想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却非常细心地关怀着每一个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记得在一次飞行途中，总理很认真的把我叫到身边关切地问：“你们乘务员不飞行时都干什么？”我说：“自己学习。”总理又问“学习以外还有没有时间干别的？”我说有，但没有具体安排。总理听了我的回答认真地说：“你们除学习必要的业务外，还应当学习点技术



嘛。机场不是有个修理厂子吗？不飞行时，可否利用些时间，组织大家去学习学习，这样，三年后你们不是就可以当一个小小的技术员吗？”

是啊！总理为我们想的多么远又多么周到啊，听了总理的话，我十分感动地说：“谢谢总理，我回去后一定向大队领导汇报。”总理点点头高兴地笑了。

回队后，我向领导和同志们传达了总理的关怀，大家听了也很高兴。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总理的这一指示，一直没有能实现。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内疚和不安。

### 总理视察黄河

1958年的一天，我随周总理从郑州到济南执行视察黄河的专机任务。那天，飞机起飞很晚，大概是下午4点半钟，总理在向河南省有关部门了解近期黄河的情况后，就风尘仆仆地上了飞机。飞机上除了我们机组人员之外，随周总理视察的只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整个机舱里显得格外冷清。总理一上飞机就坐在前边靠窗口的沙发上，手拿地图和红蓝铅笔，俯首下看，态度是那样的严肃认真。因为飞机是沿着黄河低空飞行，上下颠簸得很利害。总理虽年过半百，又劳累了一天，但为了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根治黄河决口泛滥，他在飞机上一刻也不停的看呀、记呀。总理不时变换着座位方向和姿势朝下仔细观

着，他看到某地有水灾险情，不仅认真地在黄河地形图上作了记号，而且常常叫来机长和秘书一起观察，共同标上确切的方位和地点。每当这时，总理的心情很沉重，脸色也变得严肃。头紧紧贴着窗口朝下注视着，好像要在心中牢牢记住这个地方，要彻底治好这个地方才甘心似的。我们都为总理这种爱国惜民的精神所感动，大家也都把头探向窗口，凝视着这条祖国的人民摇篮但又为患人民的滔滔黄河，希望有朝一日，它能变害为利，驯服地滋润着中原大地。

“你们看，他们这个办法不错嘛！”总理突然手指窗外说。我们赶紧跑到总理坐的一边朝下看，啊！飞机快到济南了，横跨济南近郊时黄河大桥已呈现在眼前。我们顺着总理指引的方向看去，可不是吗，一排排锯齿式防水堤坝清楚地立在黄河两岸排开。

总理高兴地指点着解释着，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他一面叫摄影师拍下来，又一面对秘书说：“到济南马上找有关同志谈谈。”

大家也都非常兴奋，刚才沉闷的空气一下子被总理的发现驱散了。

飞机在暮色中徐徐降落，机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一天的疲劳，随着总理步出机舱，乘车进入济南市区。

晚上有招待总理的文娱晚会，我们机组人员全去了，可谁也没看到总理。他老人家去哪儿去了呢？谁是不顾疲倦又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

### 总理叫我们种实验田

首都机场是1958年初启用的。当时，除飞机跑道和少数设备占用一部分农田外，周围还有不少良田荒芜了。

总理经常出入机场，看到这些土地闲置不用，心里非常不安。一次在飞行途中，总理叫我到他身边，和蔼地问我：“你们乘务员不飞的时候都干什么？我说：“有时开会，有时自己学习。”

总理又问：“学习以外，还有没有时间参加劳动？”“有”我回答道。

总理沉思了片刻，又说：“机场周围有不少土地闲着，你们是不是可以带个头种种实验田？这样把荒芜的土地都种上庄稼，既绿化了机场，又有收益，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吗？”总理看看我又笑着问道：“怎么样？你回去先同你们的女同志谈谈，带个头！”没等我回答，总理又接着说：“过些时候，我来机场，看看你们种的实验田！”

总理的指示，我是记在心里了，回到飞行队后，马上向有关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但这件事也由于种种原



●本文作者在飞机上服务



因，很长时间没有落实。

可是总理是说到做到的。时隔几个月之后，总理在飞机上又问另一个乘务员王竹报同志，说：“你们种的实验田怎么样了？”王竹报同志面有难色答不出来。后来，她又把总理的关怀向飞行队领导作了汇报，我们都感到非常惭愧，决心把空闲的土地种上庄稼。

此后单位领导号召和带动机场人员积极行动起来，整个首都机场周围不但种上了麦子、玉米，还种了不少果树和蔬菜。

总理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今天首都机场美好的环境，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当年首先提出倡议和鼓舞人们去实现的啊！

### “给陈总盖上毛毯吧！”

1958年秋，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某国一位国家元首到上海、杭州和广州等地参观访问。当时，乘坐的是一架普通的苏制伊尔14型客机，这种飞机由于密封不好，又小，所以飞行时不但颠簸得厉害，而且碰到气流时，它就满舱满气，飞得越高，空气也就越加稀薄，所以坐这种飞机长途旅行，是很辛苦的。

两位总理在陪外宾访问期间，工作十分繁忙，既要举行招待会，谈判，又要陪同走访参观，每每工作到深夜。

那天，送走外宾回北京的途中，由于太劳累了，陈总看着看着文件就睡着了。我忙走过去轻轻拉上窗帘，关上通风口。刚要转身，看见周总理向我招手示意，并轻声地说：“给陈总盖上毛毯吧！他很累了，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接着，总理又低头批阅起文件来。

我遵照总理的吩咐，取了一条毛毯，轻轻给陈总盖上。回头又取来一条想送给总理，当我走到总理面前轻声说：“总理也休息一会儿吧！现在飞行高度较高，氧气稀薄，请总理盖上毛毯也稍休息一会儿。”

“噢！谢谢，我不用了。”说着，他又关切的抬头看看陈总，并说：“你也去休息了，这里没什么事了。”

我虽然遵照总理的意思回到前舱坐下，然而心情却平静不下来。想到我们的总理日理万机，日夜为国家操劳，他的工作永远是那么多，那么繁重，然而他却时时处处关心着别人。

有一次，总理乘坐的专机伊尔14“600”号，由昆明回北京。当飞机飞越秦岭上空时，天气突然变坏，山顶雾茫茫的，能见度很差，尤其叫人担心的是怕飞机结冰。那时候的伊尔14飞机，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只能飞三千六或三千九百米，否则机上的人会因为高空缺氧而受不了，秦岭最高处是三千七百米，为防万一，



飞机必须爬高到四千二百米以上。

由于飞行高度高，天气冷，飞机外壳果然结起了冰，这就加重了飞机重量。这时飞机上下颠簸得很厉害，不少同志脸色苍白，呕吐不止。看到这种情况，我们都很着急，所以机长要我转告总理，请他老人家暂时停止工作，躺在床上休息一会。我遵照机长之命来到总理身边，转达大家的心意。没想到总理却大声地笑着说：“不用不用。你看我很好嘛！”又指指同机的人说：“你们的脸色还不如我呢！”接着他对秘书说：“你倒是应该躺一会，看，你的脸色都发白了。”然后又指着吸氧面罩对我说：“快！给大家送去吧！”说完，又低头看起文件来了。

总理的话激励着飞机上的每一个同志，但是谁也没有躺下。我无可奈何地坐下来，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总理，感到十分内疚，因为没有完成机长及大家交给我的任务。万一总理因缺氧而影响了身体，那可是大过呀！想到这里越加心里不安。

总理看出我不安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文件，转身对大家说：“成秘书，你还记得吗？1946年我们从重庆坐国民党的军用飞机，那天天气不好，本来飞机不应该起飞，可是那些飞行员为了完成任务赶回家过节，非要飞行。结果也是在飞越这个山头的时候，飞

机严重结冰，那些飞行员可大方啦，打开紧急舱门，把机上所有的行李、货物都扔下去了，幸亏没有把我们扔下去，否则今天就不会再来了。

一场虚惊在总理的说笑声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 难忘密支那

密支那，座落在缅甸伊洛瓦底江边，是一个紧靠着中国云南省边界的幽雅小城。1957年冬，我们专机送周总理到缅甸同缅甸总理吴努进行边界谈判。

缅甸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两国山连山，水连水，中缅两国有着传统的胞波友谊。周总理出访缅甸，受到缅甸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在紧张的国务活动之余，应主人的邀请，周总理访问密支那。

那是一个美丽诱人的夜晚，密支那城灯火辉煌，远处青山如黛，近处透明清澈的伊洛瓦底江水，哗哗地奔流。遍地的绿草和盛开的鲜花，迎风吹来阵阵清香。身着五颜六色民族服装的缅甸各族人民，手里拿着鲜花和彩旗，载歌载舞，从四面八方赶来，不住地高呼：“欢迎！”“欢迎中国总理来访！”“欢迎中国人民的使者光临！”……

招待晚会是在露天进行的。好客的缅甸人民，把那硕大的露天舞台，设在伊洛瓦底江边一个花园里的草坪上。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吴努总理的陪同下，坐在花藤架下。随行的同志和我们机组的人员围坐在两旁。

晚会的节目，是由缅甸当地十二个少数民族，分别表演他们本民族的歌舞。每个民族都穿戴着最漂亮的各自民族服装。有的在高高的帽上插着好看的羽毛，有的服装上、脖颈上和手腕上，挂满了银铃，也有的挎着绣满美丽图案的背包、手拿闪闪发光的砍刀边舞蹈边吹竹笛……在这绿草铺满的地毯舞台上，依次翩翩起舞，歌声、铃声和欢呼声，在阵阵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中此起彼伏，使整个会场都沉浸在中缅友谊的欢乐之中。

当每一个民族表演结束时，周总理都带头热烈鼓掌，表示谢意。在十二个民族的演出快要结束时，总理一手拉起吴努总理，一手拉起贺龙副总理，同时又招呼我们机组人员及其他随访人员一起向“舞台”走去。

走到舞台上后，周总理高兴地高声说：“我们非常感谢主人的盛情招待，感谢吴努总理给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别具一格的、丰富多采的晚会。现在让我们大家拉起手来，共同跳一个团结友谊舞吧！”说着，他向身边一位青年舞蹈演员借来民族帽子戴在头上，贺总

也借来一把闪闪发亮的长刀拿在手里。大家在总理带动下，一起模仿着缅甸民族舞蹈的姿势，在和谐的乐声中，在阵阵的掌声中，翩翩起舞。观看的人们也不约而同地加入了歌舞行列纵情欢唱，使得这个幽静的小城一时欢腾起来。

## 敌机向总理专机飞来

50年代后期，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时时叫喊要反攻大陆。他们还经常派飞机到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有时，甚至派飞机深入我内地，进行侦察飞行或散发传单。那时，我们民航的飞机去沿海执行任务时，经常会得到消息说，有敌机行动，要我们注意安全。

一次我们机组担任一次十分重要的飞行任务：送总理、陈毅和贺龙副总理从上海返回北京，同机还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那天，天气还好，飞机准时从上海机场起飞。当飞机腾入空中后，舷窗边，万里无云，天空湛蓝湛蓝。这是南方少有的大晴天。

可是，当我们正在飞行时，得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就在我们飞机升空不久，我有关方面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从海上窜来敌人四架飞机，向上海南昌方面飞来，看来是有目标的。要我们注意做好应急准备，或许返航，以防万一。

那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刚参加工作不久，从来没碰到过这类敌情。所以，听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心情很是紧张。心想：我们这架飞机上，有这么重要领导，别的事小，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大事呀！万一敌机来扰乱怎么办？我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可越想心里越乱，手里拿的东西都有些不自如了。

这时我发现周总理的茶该换了，于是走到总理面前，心中不安地将总理爱喝的绿茶送上。茶杯放下后，就一直在总理身边愣愣地站着，心想自己应保护总理。看着我这般模样，总理放下手中的报纸，端起茶杯，慈祥地看看我说：“怎么？你身体不舒适了吗？先回前舱休息一会吧。”听了总理的话，我欲言又止，再看看总理亲切安详的笑容，我很快冷静下来，赶忙回答说：“不，我很好，只是怕总理有事。”

总理听后慈祥地笑了笑。可正在这时机长和领航员急急地走进舱来。他们手拿航行图，走到总理身边，小声地说着什么。只见总理平静地点头说：“好嘛，咱们继续飞！”原来，敌机确实来犯，只是刚进入我领空，看到我空军飞机起飞，马上就调头逃窜了。直到这时，我这颗紧张的心才安静下来。

回到服务舱，想到自己在这种意外情况下，就慌

乱紧张，要不是及时解除敌情，自己还不知出什么洋相呢！再想想总理，遇事总是那样平静坦然，还处处关心着别人，真是我一生都难以学得到的。

### 珍贵的纪念

1957年11月的一天，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亚洲11个国家结束后，回到了山城重庆。此次出访，我们民航派出了三架飞机，我有幸随机担任乘务工作，在重庆我们住在白市驿飞机场招待所。第二天下午两点，航站负责同志突然来电话说：“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很关心机组的同志，问大家休息得好不好。”并说两位总理赞扬你们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要同你们一起照相留念。我们听了欢喜若狂，都非常感激总理们的关心。

汽车很快就到了交际处。在一座大楼门前，已排好了几十把椅子。总理的秘书成元功同志招呼我们先休息。他说：“两位总理因刚同四川省负责同志谈过话，午饭还没吃完。正说着，就听见“完喽！”“完喽！”的喊声，寻声看去，贺总已经出现在大楼的门口，手里还捏着牙签，兴冲冲地朝我们走过来。紧接着是周总理和其他同志。大家一齐迎了上去，向两位总理问好。总理和往常一样，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又一面示意，叫大家坐好准备合影。

我们首先请两位总理坐在前排中间的椅子上，几位机长分别坐在两边，其余的同志都围站在两边。

这时周总理向左右两边看了看，放声笑着说：“三位女同志到前排来坐嘛！”“是喽。这是国际礼貌哟，我们可不能怠慢姑娘们啊！”贺总接茬打趣地说，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我们三个姑娘得到两位总理的特别照顾能坐近在他们旁边照相自然就更高兴了。

摄影师对好镜头，正准备拍照，忽然又停下来，说：“贺总，牙签！”大家不约而同地一齐朝贺总看去。噢！原来贺总的嘴上还含着牙签呢！贺总自己也笑了，说：“老习惯了！”摄影师乘机举起照相机“咔嚓”一下！没有错过抓拍的好时机。

在回机场招待所的路上，同志们回味着和总理合影的幸福时刻，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有的说这次照得一定不错，有的说摄影师乘大家笑贺总的牙签按了快门，可能照出来大家都是笑得挺甜美的，也有人担心自己的姿势没摆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珍贵纪念啊！

时隔不久大家都放心了。每人都得到一张和两位总理一起合影的相片。如今多年过去了，敬爱的周总理，贺龙副总理也都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慈祥的

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上！

在这次出访中还有一件事，那是在访问越南河内回国途中，总理的秘书成元功同志终于满足了我们机组的心愿；送给每人一张总理访问河内时，手持花束检阅三军仪仗队的照片。

大家看了照片非常高兴。领航员老宋同志提议说：“我们请总理在照片上给签个名吧！”

老宋话一出口，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好主意！好主意！于是大伙就推举我去请总理签名。我自然很乐意去，可是又怕影响了总理短暂的休息。因为这些天来，总理实在太劳累了，我们怎么好去打搅他老人家呢。然而我也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于是乘给总理送茶水之机，我对总理说出我们的心愿。

没想到总理听了很认真地笑着说：“可以嘛！不过在飞机上签不好吧！照片也太光滑，回去用毛笔吧。”

我心想，大家都想早点得到总理签名的照片，又考虑到总理回去后事情是很多的，不能再占总理宝贵的时间了，我就说：“还是请总理用钢笔签吧。”

总理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愿，于是拿起笔，又很认真地看了看照片，说：“那就在背面签个名吧。”说着提笔在每张照片背面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我接过签了名的照片高兴地说：“谢谢总理。”

总理却说：“谢谢你们喽！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很辛苦。”

我快步走到驾驶舱，兴高采烈地将照片分送给每个同志，并转告了总理的话。大家都十分兴奋地表示：总理的话是对我们的鼓励，总理签了名的照片比什么礼物都珍贵。我们一定更好地做好工作，以此回答总理的关怀和信任！

### 口香糖与茶

我刚参加机上乘务工作不久，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常常碰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飞专机任务的时候，心情更加紧张，事情也就越多。有一次，在总理的专机上，为了减轻起飞时因气压变化而引起的耳膜压痛，我给每人都送去了一包口香糖。万没料到客人吃了口香糖后糖胶都沾在牙上，咽也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干净。这时有的客人要水漱口，有的客人要毛巾擦嘴。当时急得我跑前跑后，既忙乱又着急，立时出了一身汗。心想如果带盒牙签来就好了，可事先哪能想到这种口香糖会有问题呀？我急中生智，忽然想起把火柴杆削尖了，再用开水烫烫消毒当牙签不是也行吗。当我把自制的牙签送到总理及同志们手里的时候，总理笑笑说：“你很想办法嘛！不过，最根本

的办法还是给这个厂写封信，反映一下他们做的糖质量很有问题，再把这种糖寄去，叫他们也尝尝滋味……。”总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可我倒觉得很难过，感到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事先没有对这种质量差的口香糖进行检查，而造成大家在旅途中的麻烦，是自己的失职。同时也深深感到总理教导细致有方，不是滥加指责，而是叫你在表扬中受到教益。

1956年的一天，缅甸总理吴努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在整个访问期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直陪同到各地访问参观。专机服务工作要求很严，不仅要有良好服务态度，而且还要求乘务人员懂得外交礼节。因此，送茶水时，我按“客先后后”的礼节，准备先把茶水送给吴努总理，然后再送给我们总理以及其他同志。然而这次送茶我却碰到了难题，当我步入客舱，只见吴努总理正在双手合十，两眼紧闭，盘腿打坐，口中还念念有词。我一下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递茶吧，怕惊动了吴努总理，不送吧，又担心失礼，回去吧，怕更不好。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周总理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小声对我说：“他在工作，不要打扰他，先送给其他外宾吧！”总理的提醒，使我在难堪的情况下解了围。

在坐的中外客人见此情景也都望望我友好地笑了。

### 总理的笑声

1957年11月，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亚洲十一国后，在重庆稍事休息又匆忙赶到成都。

此次出访，历时两个多月，周总理行色匆匆，十分忙碌。在整个访问期间，总理日夜不停地工作，就连在飞机上，总理一坐下来就改文件批材料、阅电报。每到一个国家，国务活动排得十分紧张，从早到晚，总理都处于工作状态。有时，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回到祖国，四川省的领导同志为了让总理好好休息一下，就给总理安排了一些文娛活动。

那天，四川的同志特意给总理安排了一场晚会。晚会上，主要是看川剧，剧名叫《画梅》、《二度梅》。这是两出喜剧，轻松活泼。

川剧历史悠久，语言诙谐生动，加上四川方言的

念白，听了使人倍感亲切。

根据市文联的安排，我们机组人员也应邀观看。有幸的很，我们就坐在周总理等首长的后边一排，因此，既能看到戏台上演员表演，又能听见总理同其他领导同志的谈话。

画梅，描写一位家境贫寒的书生，娶了一位聪明手巧的媳妇。一天，年关到了，家中无米下锅，穷书生一筹莫展。聪明伶俐的妻子却很快想出了办法，手执画笔，画了一张梅花图，对丈夫说：“你到集市去卖掉这张画，买些米回来过年。丈夫拿起画来一看，皱着眉头用四川腔说：“这花好是好，就是没叶子。没叶子，算是什么花呀！”

总理听了这段很有趣味的四川话对白，仰首大笑，笑得非常开心，在坐的其他同志也都笑了起来。



新中国第一代空姐

我坐在后边，听到总理的笑声，深为感动，心想我们随总理出访那么多国家，不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哪个国家参观访问，我们的总理总是夜以继日的忙碌着，很少看到他有清闲的时候。在国外即使是看戏，也是一种不轻松的外事工作，而今天就不同了。出访亚洲十一国已圆满结束，同亚洲十一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是我国外交上的巨大胜利，总理的心情轻松愉快，因此他开怀大笑起来。这是胜利的笑，是放下重担后的大笑。第一次听到敬爱的周总理发自内心愉快的笑声，我和同志们都感动极了。

(责任编辑 方徨)



## 海外朝组团参加神农节

1993年6月14日至16日，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在相传的炎帝神农故里随州市举行。海外370多名烈山子民，前来谒祖认根。

据《国语》、《礼记》等史典记载，数千年前人文始祖炎帝神农生于“烈山石室”（烈山位于今湖北省随州市厉山镇西）。当时尚无纪年，但子民们代代相传，说农历的4月26日是炎帝神农的生辰。于是，每年这一天，烈山香火旺盛，深沉而激越的社鼓自夏代至春秋至明清，直敲到如今。厮守故园的子民如此，飘蓬他乡的炎帝神农裔也莫不如此；寓居海外的同胞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同乡会、同宗会之类的民间团体——烈山宗亲会。父老之邦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0多个烈山宗亲会与炎帝神农故里沟通联系，每年派出朝祖团队。今年欣逢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有22个海外胞裔的朝祖团队来到随州。

6月14日上午，烈山宗亲恳谈会在烈山宾馆举行。来自台湾高雄的同胞即席发言，极力主张下届（1995年）世界烈山宗族代表会议到随州召开。他说：“随州市炎帝神农故里，是烈山宗亲的‘家’，大家都回这个‘家’。”曾经三次来随谒祖的台湾姜氏宗亲会常务理事姜竹先生发言说：“我这是第四次到烈山朝祖了，每次来都看到新的变化，随州有资格有能力作为烈山宗亲的‘家’！”曾投资100万元人民币在烈山建“归宗园”的加拿大籍华人刘敦仁也慷慨陈词：“我不是烈山宗亲会成员，但谁也拒绝不了我，因为我也是一个正宗的炎黄子孙啊！”

6月16日（农历4月26日），烈山碧空如洗，丽日如炽。上午9时，炎帝神农生辰庆典在文化广场举行。炎帝神农雕像前的贡桌上，摆满了寿饼、仙桃。在肃穆祥和的音乐声中，数以万计的炎黄子孙，虔诚地行鞠躬礼。生辰庆典完毕，来自海外的几百名赤子，和乡亲父老一起，和来自北京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刘杰、常务

副会长李宝光一起，登上烈山之巅，为始祖的功德祠奠基。来自台湾高雄市的许关伟先生说：“作为炎黄子孙，不能忘了老祖宗的恩德。要记住，我们的根在大陆！”

当日下午，意犹未尽的台湾宜兰县64名台胞，再度赴烈山，向始祖炎帝神农敬献牺牲——黑色的整猪、整羊。至诚至虔的三叩九拜之后，由朝祖团团长邱显水率同行绕炎帝神农庙一周，齐声大呼：“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此情此景，催人泪下。

留给海外亲朋深刻印象的，还有那展现辉煌的炎黄文化与迷人的烈山风情的大型文艺表演《神农风》。身披兽皮、手执耒耜的古代先民，簇拥着巨大编钟的南国佳丽，秀丽的荆楚山川和黑黝黝的沃土，……叙说着悠悠历史，给今人以启迪；远古时代，洪荒漫漫，靠着发明与创造，炎帝神农部族开启了古代长江文明，黄帝轩辕部族开启了古代黄河文明，两大文明的融汇，形成了巍巍华夏的基石。

如其说《神农风》是艺术表演，不如说她是艺术地再现历史的启示与呼唤：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有共同的始祖，我们靠着进取与融汇从远古走来，我们还要靠着进取与融汇去建设未来。台湾高雄市烈山五姓宗亲会理事长吕天良先生激动地谈到：“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不分老幼，不分党派信仰，在炎黄这面神圣的旗帜下聚集起来，团结起来，就是中华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向心力。”他还说：“台湾不能独立，也不可能独立。台湾民众希望早日统一，实现民族的大团结、大发展！”

台胞的谈话无疑是对首届“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开幕式的认同与回应。谁都注意到，既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的钱伟长在宣布“炎帝神农节”开幕后，向这次海内外瞩目的盛会赠送了“和平统一”铜鼎。

（刘永国）

# 中央电视台



哪里有“明星”，哪里便有“崇星族”，于是，在由“橄榄绿”把关的中央电视台大门内外，便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感慨又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喜剧”。

●苏殿远

## 第一章：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明星脚下有一道铁墙

### A. 彼吉渴望一见杨澜，但是……

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北京时间19点多，正是中央电视台“特价”的“黄金时间”。

离“正大综艺”节目时间还有15分钟了，天阴得越来越劲儿，不时地打着雷鸣闪电，大雨如瓢泼盆洒地往下泻……

这时候，东门外100多米处有一辆“奥迪”停在路边。雨幕中，偶而能看到车上有人在抽烟。

这是一辆干什么的轿车？为什么顶着暴雨闪电不离开？……

车上的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藏在远离中央电视台东门100多米远的阴暗一隅，竟被中央电视台的“暗哨”发现了。

车上坐的是一位国际上颇有名气的记者，名叫斯尔·彼吉，原籍澳大利亚。从21岁走马新闻论坛，彼吉已经有6本专著、100多万新闻文字见诸于世界各大报端了。

1992年7月12日，彼吉抱着“三大目的”从纽约乘坐波音757辗转飞到北京。他头一天顶着炎炎烈日，登上了八达岭长城；下午玩了故宫——实现了两大目的。

晚上，他要实现第三个目标，去正大综艺现场看一看杨澜。

他很喜欢杨澜主持的节目。后来彼吉毫无掩饰地对笔者说，他觉得杨澜是一颗真正的“明星”，她有“星光”让你感到闪烁，不是一般的照耀，而是足以能把你的心灵照亮。

他说：“中国的杨澜在我目睹过的少男少女艺术节目主持中，是最机敏、潇洒、灵活、巧妙的一个，她是实实在在有魅力的甜美得很适当、很随和的女性。”

这些话，表达了彼吉为什么把亲临现场目睹杨澜的芳姿定为他来华的“三大目的”之一。

他等不得办手续。下午逛完故宫已是4点40多分了。他洗漱一番，吃过晚餐，正好6点半。他于是和雨点一样急

人海  
浪

# 的明星与“保镖”

促，驾着奥迪冲进雨幕。

他在暗中寻机。他知道车子单独地往里冲是冲不进去的，太明显，太容易露馅儿。最好的办法是等有几部车来的时候，一块儿混水摸鱼地混进去。

他不知道他的车子早被人盯梢。

一阵狂风乍起中，两三辆小轿车亮着刺眼的车灯驶过去。彼吉一踩油门，“奥迪”箭一般跟上！

他的车紧紧咬住一辆“皇冠”的屁股，如影随形地开进中央电视台的东大门……殊料，车子刚挤进门口，雨帘中从高处猛地跃下一条黑糊糊的人影儿！

一只胳膊横刺里伸出，不偏不倚，正拦在“奥迪”的迎风玻璃上！

彼吉吓了一大跳，急忙煞住车。

——How do you do, sir. (你好，先生?) 随着一声礼貌的问候，一个身着空空荡荡的雨披，内着橄榄绿色警服的卫士将胳膊收回，让他出示进台证。

——Sorry sir, I haven't. 彼吉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先生，我没有。”但是，他没有混过去去。

“撒赖”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外国著名的“老记”而放他入“关”，也没有因为他再三要求“只看眼杨澜的表演便即刻离台”而迁就松动。

“先生，请您离开，请您赶快离开！”对方的礼貌而坚决，软中带硬的语气使彼吉涨红了脸，他吃了一个“歪把儿酸梨”，被反溜溜地赶回来。

事后，在香港的《星岛日报》还是什么报上，彼吉发表了一段感慨之词：

“我本想在 24 小时内完成旅游中国的三大目标：长城、紫禁城、中央电视台——后者更确切地说是杨澜小姐。但是，我没有达到预定的‘快速旅行’的目标，我要去英国的曼彻斯特，那里有一场欧洲足球赛等我报道。说不定，我还要一阵旋风刮到伊拉克，去实地考察一下战后的伊拉克，描绘下萨达姆的近况……因此，我很遗憾”。

最后，彼吉歉疚地说：“我很想寄语北京，我没有时间完成采访杨澜小姐的主题，但我感到歉疚之时也更感到杨澜艺术风格的潇洒、瑰丽！我还想要补充一

万无一失，  
随时待命，  
以便中央电视台的安全  
苏殿远摄



句：中央电视台的保镖们，是世界一流的。”

## B. 中国的名流“老记”们也逃不过他们的“鹰目鹞眼”

某报社“体育采访热线”记者H，为了抢头条，约好了一部“马斯达”并自备了一辆“幸福”型摩托。

六个车轮来回转，哪儿风热他朝哪儿奔。

那会儿，金风飒飒，秋阳高照，色彩调和，气候宜人，正是亚洲体育健儿奋身一搏的最佳时机——1990年9月22日，星期六，熊猫盼盼踢着足球上场了，来自西藏的舞蹈女郎——幸福的月亮达娃央宗（达娃，藏语“月亮”的意思；央宗，意指“幸福的祝愿。——笔者注）运来了亚运会圣火的火种。

H采访完了达娃央宗，觉得没挖出多少东西，充其量只能发一条新闻，顶多来个两千多字的通讯，因此，老觉着不过瘾，于是，脑瓜儿一转，打起中央电视台的主意。

中央电视台的中心转播室和亚运联播指挥中枢才是消息最多的大本营。

他一路轻骑，把摩托开到中央电视台门口，嘎地煞住。

一会儿，过去一辆小车，他

注意地瞥了一下里头的人，啊，是韦唯！她大概是现场直播“亚洲雄风”——亚运会的主题歌吧？

H猜测着，也忘记了看车号，只见那辆小车风驰电掣地开进了中央电视台。

门口，有一个哨兵，呆立着，好像根本没看见韦唯的车。门口内部，靠进入电视台右侧的，还有一个岗台，岗台上也站着一个绿衣哨兵。他的两眼直视正前方，压根儿连韦唯的小车都没看一眼。

一辆车，又是一辆车……

有门儿——不由心花喷香，思忖：闹了半天，中

央电视台的保镖们都是秫秸杆儿，打站票不弯腰的呀！

嘻嘻，他差点儿笑出声来。

“嘟嘟……”他后动了摩托，一上来就开得飞快，小野马似地往里冲。

“腾腾腾”，摩托颠到离门口八丈远呐，门口外的头一个“保镖”就伸出一只直直的铁臂，大有你要不停住就一锤把你打倒在地之势。

更令H奇怪的是，门右侧岗台上的那位哨兵眼珠子会拐弯，眼睛愣看着前方，却声如雷霆冲他喊：“请停下！”

摩托车跳了几跳，停下，H跳下车。

“请出示您的证件。”门口外的保镖说。

“我是记者。”H掏出了新闻出版署统一发的记者证。

“请原谅，记者证不行。”

“我要急需采访。”

“那请您赶快到传达室登记。”

“登记！”H故作玄虚地说，“新闻采访是没有楚河汉界么！”

“进台都有合格的出入证件，您这一件——对不起，我们不能算合格的。”

“我是代表中国的大报之一的一名记者，是专门搞体育采访的，宋世雄就是我的

老朋友吗！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喝过酒、碰过杯，老哥们儿啦，您呐，就用报话器给我通报一下就行了。”

“先生，请不要饶舌了。”卫士的脸色有点冒青，话音里带出一种不耐烦的气味儿，“我是保卫整座电视台的安全的，不能因为先生一人一事而影响整个电视台的千头万绪！”

另一个高台上的卫士说：“有和我们交涉的功夫，您进传达室联系老宋（世雄），进行登记，说不定抢到一条5万元也买不到的特价新闻了吧？”

这句话触到了H的“痛点”，他好像感到失去的



港台影星胡慧中和卫士在一起

罗莱摄影



时间太宝贵了，便连忙诙谐地说：

“谢谢您的点拨，谢谢您的点拨。”

“这门卫铁兵，干嘛专认我呢？”他不解地向传达人员牢骚着。

门房的传达说：“这些人眼特贼，别说您一个生人，一闻气味儿就能把你闻出来！就是邢质斌、杨柳这些天天磕头碰脑的新闻联播的明星，如果哪天不带证，他只须瞥你一眼，就能瞥出破绽！”

1991年初春的一天，一个新被邀来的女红星进入中央台主持一个艺术节目。鉴于她的大名，上午9点左右，卫士小张和她照了一张相。下午，出门的一刹那，小张斜了她一眼，说：“你是否忘记带什么东西了。”

她莞尔一笑：“什么也没忘。”

第二天一早这位红极一时的女星脚还没迈进门口，小张就说：“刚才，有一个穿着时髦的小伙子在你身后跟踪，你以后要小心点儿。”

她心底一颤问：“你看见了？”

“你下1路公交车不多远，我们就看见你了。那个年轻人大概是在车上认出你的面容才跟踪而来的，我们看他对你没恶意，才没过去干涉。”

“这么说，你们在暗中保护我啦？”太谢谢了。

“不用谢——”小张语气一转说，“不过，您以后别忘了带出入证。”

“出入证”她一怔，一摸，果然忘带了，便惊问：“您怎么能知道？”

他没有回答，只是对这位“红星”报之一笑。

H听后感叹道：“真是神人神眼了！”

他这儿没有日闯关，在采访中央电视台的正常新

闻中，又幸运的采到一条千金难买的消息：中央电视台有一群铁保镖。

## 第二章：一种顽固病：爱慕名人明星发了狂

### A. 对追星族爱莫能助，但不能动武

驻守在北京市复兴路11号中央电视台的武警北京总队一支队的官兵，个个都是铁板汉子，论擒拿格斗，少林武功，各有一绝。

里边个头最矮、身体最单薄的是罗荣。他是四川兵。个子1.6米左右，体重不过百十斤。爱笑，长得不丑，像个不扎眼的初中生。可久经沙场，功夫不俗。

不敢说小罗有力盖泰山、拳碎盘石之力，但出手非凡，三四个身高马大的硬朗家伙也敌不过他。

他们身穿橄榄绿站岗巡逻是明哨，脱下军装大街上一溜达，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暗探。

1992年迎春花开放时节，也就是澳大利亚的彼吉闹台未成的第二天，小罗出外执行命令返回电视台，耳畔现出一种异常音响，猛抬头，呀，不好！歹徒从小车上跳下来行凶！

歹徒杀气腾腾，野火正旺，一记重拳朝小罗头部击来，小罗头一侧，躲过劲拳，向前顺势斜跨一步，

扭回身，一个海底捞月，便将歹徒未发力的另一只胳膊捉住，“喂”地发力一拐，便听“喀吧”一声，歹徒胳膊骨位脱臼，疼得吱吱怪叫，像一个残废人，耷拉着胳膊耷拉着脑袋连连叫饶。

小号的罗荣有这么股制敌于千钧一发的功力，其他卫士就可想象而知了。

可这帮比吴彬、李连杰（前者为李连杰在北京北海体校从按时的老师）毫不逊色的硬汉子，心眼儿却



中央电视台的“保镖”在苦练擒敌技术  
苏殿远摄影

像春天的柳丝一般软，丝缕线绕的心头充满一片爱。

中央电视台上亮相的“星”们，最受青睐的是这儿部分人：一是新闻联播组的广播员，从早一些时候的杜宪、薛飞、邢质斌、罗京、张宏民、卢静，以至后来的李瑞英、王宁、杨柳、李秀英以及离开另就新位的计瑜、肖晓琳等，都拥有一个相当庞大的观众群。他们的形象如同太阳和月亮——白天像太阳在他们口头碑颂，夜晚像月亮飘进他们梦中的向往。

第二类受爱戴的是那些经常的、三天两头露相的像综艺大观、正大综艺、经济半小时、世界体育等节目的主持人，如杨澜、赵忠祥以及宋世雄、孙正平、鞠萍、倪萍等等，不一而足。

他们受青睐的程度，不亚于新闻联播区域中那些“口才明星”。

第三类是通过电视台的助力和自身奋斗拼搏而自成一家的“星群”，这群“星”就更多更辉煌更有如灿灿银河了！

笑星：侯宝林父子、马季、姜昆、冯巩、牛群……

歌星：毛阿敏、韦唯、彭丽媛、成方圆、田震、刘欢、杭天棋、苏红……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21岁的二班长霍艳文镇守东门。

车辆络绎不绝。一阵忙活后，突然一个十分风流的“潮青”（北京话，很有气派的潮味浓厚的青年男女）从一辆“标致”屁股后头钻出来。

其人快如闪电，敏捷如猿，如果不是霍艳文手疾眼快，其人真能粘在小汽车的屁股后头钻进去。

以快对快，小霍铁臂轻探，将其人后衣领牢牢抓住，只轻轻一提，便将其小鸡般提在旁边。

“请亮一下证件。”

“我找一下李玲玉。”

“我再重复一遍：请您出示证件。”

“我再敬告您：我找李玲玉。”

“没有证件不许进台。”

“李玲玉刚刚进去，她同样没有证件，为什么偏向歌星，歧视我这个普通小民！”

原来，这个身材魁伟、风度翩翩的“潮青”在中央电视台门外等候十余天了，他天天翘首以盼，只盼着他最敬慕的歌星李玲玉玉驾早临，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他真的等着了。他歇着车里坐的是小李，便尾随在络绎不绝的车流后头，猫儿一般地匿伏着，不料在“入关”的零点几秒的时间内，被人意外“捕获”。

像这位“青年”出于对著名的歌星一片真挚纯朴

的感情，想方设法、费尽心机，渴求一面，您能说他什么呢？

但是，如果真要让他混进关口，缠住入台的歌星、笑星、舞星完不成节目预制和现场播演，那谁又能承担得了呢？

“对于这些追星族，从私自冒险闯台斩关来看，我们真想好好把他们收拾一下。但是，我们不能，不敢动武，也不允许感情冲动，唯一的办法，是耐心艺术地说服，引导他们用健康的心理正确对待他们心中的圣洁偶像。”

## B. 不管是扳弄舌簧，还是“调虎离山”，保住“镖”才是好手

患“崇星病”的人尽管男女有别、职业不同、性格各异，有的是北京人，有的是外来妹、打工仔，但都有个共同的目的，一睹明星风采。有的，希望看一眼就行。湖南长沙市黄泥街的一个王姓观众说，“我请了一个星期事假，宁愿扣掉全月的70元奖金，跑到北京来，下车就赶到中央台，就为了亲自看一眼我心目中的主持人。”而有的，比王姓观众要求高了点，“能和她说上几句话，合张影，就算没白活。”还有的，比前两者的要求更高更苛，他（她）们希望不仅能和心中的“星”合影并立，交个朋友，甚至请“星”一起到酒家共饮相识酒。

“在外国也许有这种传奇，比如著名的女影星先后和几个邂逅相遇的“崇星者”热恋得不可开交，甚或成为情夫和丈夫。但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起码在目前此路难通。中国是中国，有中国的民俗民风，有中国独特的情爱观。”“保镖”小霍侃侃地谈着，“我们不仅保护着‘星族’们的人身安全，也要保护他们的名誉。”

不久前，来了个远方的客人，毡帽皮靴黑氅衣，外表像个维吾尔兄弟，小霍一看似曾相识，向记忆深处一想，想起来了，此人一月前曾来此找节目主持人××，大言不惭地称××“是我的爱人。”斯时小霍就说：“你既然喜欢××，就应该尊敬她。你把人家谎称‘爱人’，是对人家的尊严、声誉的侵犯，你侵犯你尊仰的人的人格，你不心愧吗？”

小霍认出他之后，主动地说：“你瞅，你要找的××向那边去了，她去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

“毡帽”向那边看去，好像真有几个花枝招展的女郎翩跹前行，便跟过去。

当然，“毡帽”追不上××。小霍不过是虚晃一枪，

将对方支走。因为“毡帽”要找的××，根据以往的规律，这会儿快出东门了。时不我待，他得赶紧想办法把“毡帽”甩掉，否则××来了，就该麻烦多了。

从那以后，“毡帽”再也沒来，估计他知道来一百次，一千次也沒指望——这次化妆他就得花点本钱，老赔本的事谁干？

小雪后来也总结出—条经验，只要不出圈儿，不违法，不论想什么法子，只要保住中央电视台的安全就得。

### C. 不行的话，也得动点武

光来“文”的也不行，必要时刻也得动动拳脚，采点武的。

1992年5月，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漂亮的女主持人××作完了节目，轻松愉快地走出东大门。

“××小姐，我……”一个男子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迎面拦住了女主持人。

“去！我不认识你！”

男士却嬉皮笑脸，说他如何如何……然后提出无理荒唐要求：“让我们结婚吧！”

一向以口齿清晰、字正腔圆、风格温柔著称的××一时不知所措。

那男士见××失去方寸，竟伸出手想施非礼。

“勿得动！”随着一声南方口音的暴喝，一只铁拳从半空中探下，牢牢抓住了非礼者的脏手！

“哎哟！”非礼者哪禁得住整天打沙袋、击雷石的

武士发力猛握，疼得大声喊叫。

××安然无恙，脱离了险境。她哪里知道，在她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总有一些“隐形保镖”在随时随地接应着她。

她受了一场虚惊。

经查，被制服的非礼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对风格温雅大方的女主持××，昼思夜想，已经形成“癡仿性”好感，现在萍水相逢，所以病情发作，失去自控能力。

“崇星”、“敬星”本来很正常，但走到神经失控的地步，形成了疾病，以致对“星”失去正常的礼貌以至非礼，是多么不应该啊！

“崇星族”给中央电视台的保镖们所造成的困难，也是数不胜数。有一个崇星者找女主持人×××。他在中央台转悠两年了，×××每天潇潇洒洒，进进出出，他不认得。“我们都暗暗地保护着×××，两只眼睛不敢用它，一直把她目送到安全区。”一个“保镖”如是说。

不久前，某家晚报刊登了一条《倪萍将梅开二度》的消息。消息说，倪萍即将再度披婚纱，她的丈夫是某某单位的某某人士等等。

对于这样—则短小的消息——如果属真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自由婚姻对于名人也好，下里巴人也好均无可非议。可是，偏有一位影视迷，竟然脑袋瓜儿转了筋儿，跑到中央电视台来问倪萍，想探个究竟，是不是真的。

卫士和舞蹈家

罗英摄影



要证件没证件，要介绍信没介绍信，要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完全是个“三无人物”，这样的人物要放进去那还得了。

“不行，我得找倪萍，非得问清！”对方匪液里儿四溅，说话很野。

“这事与你无关，你没必要问，快走！”卫士眉头斜挑，也不客气了。

“我是为了维护她的名誉，怎么着？对对证！你不要狗拿耗子，多管他妈闲事！”

听对方满嘴污言秽语，卫士气得肺火直烧，但他还是压住火，和和气气地说：“你穿戴这么干净、整齐，语言却太不文明，我劝您自尊一些。至于不让你进去，这不是‘闲事’，而是‘正事’，试问：‘您那个家门随便往里闯行吗？’”

卫士开导着，驱赶着对方的“野味”道：“你若真的出于爱护倪萍的声誉，对证一下这则消息是真还是假，可以给她写封信，本市信件一角钱就可以表达你的心意了，何乐而不为？”

“笛笛——笛笛”对方的“野味”被赶得差不多了，但还萦绕两句话，不料门口几辆台内的汽车来了，冲这人直鸣笛。这人刚一侧身，小车一缕风驰过去，差点儿把他挤倒，这人吓一跳，斜斜趑趄地往后倒退几

步，朝卫士一举手：“拜拜了，您哪！”

卫士说：“对这种人，急不得，恼不得，骂不得，打不得。”

中央电视台驻警的领导王福印说：“看来，文明能治野蛮。”

“就是嘛！”驻警指导员李进中说，“文明也是一种武器嘛！”

### 第三章：心有灵犀一点通——明星和“保镖”的交往

#### A. 杨丽萍小姐，我来了

1993年1月22日，是鸡年降临之际。在这瑞雪兆丰年的欢乐之时，刚刚在台湾刮起一阵“杨丽萍热风”的风源——杨丽萍又在春节联欢会上获得了“蛇面舞”的重头奖——一个特号大彩电。

大年的欢声笑语随着夜深人静而渐渐消逝，这位“孔雀公主”抱着大彩电步出中央电视台的播演大厅，已是累得气喘吁吁，额角汗如珍珠了。

别看“孔雀公主”婀娜多姿，柔若柳枝，在世界上创下了“翩翩鸿羽”的芳香大名，但弄这么个几十斤重的大彩电，确实力不从心。

她走几步，歇一歇，喘口气儿再走几步歇一歇，好歹又往前挪动了几十米，精疲力尽。

这会儿，大地一片沉寂，远远近近响起了起伏起伏的鞭炮声。她前望后望，不见一个人影。是啊，那些同她一起演出的“星姐星妹”们此时恐怕早已经到家，同家人温温醇醇地共度佳宵了，可她……

不远处，已经看到小车了，可是越是看到小车越是感到一丝力气都没有。

正在这时，不知夜暮的哪一个角落发出一声呼唤：“杨小姐，我来了！”

看时，灯影中飞步跑到一个年轻人。

卫士二话没说，接过了她手中的“重奖”。

杨丽萍说：“真想不到，半夜三更的，还能遇到您这个大力士！”她擦着汗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卫士小李说，“这说明您新年大吉，一定会万事如意！”

“对对！对对！”杨丽萍说，“我参加舞蹈，就有这种预感，今年一定会风调雨顺！”

说着，“大力士”已经把重重的彩电轻轻搬到车门口儿。说也巧，正好一位摄影大师从后进来，“咔嚓”一声给“孔雀公主”和“大力士”拍了一照《雪中送炭》的合影！



“观察与思考”主持人肖晓琳与卫士在中央电视台大厅合影。

罗荣摄

## B. 成方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成方圆，是中央电视台的老“顾客”，很守规矩，每次进台都是热情大方、彬彬有礼地出示证件、打招呼，卫士们心里头都叫她“成大姐”，而不是“成大姐”。

但是，成大姐偶而也有忘事的时候。

“六·一”儿童节这天，赶上尹衍国值勤。明星来的不少，难得碰上这么个时辰给孩子们献支歌，献只舞。——尹衍国看着明星们的笑脸，这么想，

一辆小“夏利”驰过来，小尹早瞥见里面是成方圆。

果然，车停了，窗口露出了成方圆甜甜的笑脸。

小尹知道成方圆今日到台，肯定是应邀而来的，但职责不能不使他严格执行使命：“您好，成小姐，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糟糕，”成方圆依旧笑眯眯地说，“我还真没有带什么证件。不过——”成方圆语气一转道，“我是急忙来参加‘六·一’转播的呀，电视台没来得及发我出入证。”

“没关系，成大姐，那就请您到传达室登个记吧！”

“好好。”成方圆下了车。

成方圆登记毕，尹衍国礼貌地说：“真对不起。”

“没关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成方圆自然而诙谐地说。

## C. 赵本山夸奖说：“老乡，你可真行啊！”

卫士李莹是东北人，说话还是一腔东北音儿，一日把关恰好碰上“同乡”老本山。

说也怪，这一天“星河”里的星真多，一个接一个，而且还有一些到电视台办事的、私人来访的，等等，等等，传达室登记处排队登记的形成一条“龙”。

赵本山脑子多好使呀，他见人那么多，排队登记，得猴年马月呀？便想来个“绝招”。

没等老赵细琢磨，李莹那儿开口了：“赵老师，您有证件吗？请出示一下。”

赵本山一听小李满口的东北味儿，马上灵机一动，套着近乎说：“哟，今日来得还挺有缘份哩，碰上——一个老乡呀。”

“啊，老乡——”小李被赵本山的“乡音乡情”打动了，刚想叙两句“家乡话”，却立刻想到自己是在站岗，便改口说，“请您出示一下证件吧！”

“嘿，”赵本山笑微微地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还论什么证不证啊。”

“老乡有缘千里会，没有证件不能进！”李莹学着赵本山，回答说。



瞧他俩，多近乎！真像哥俩儿。  
侯跃文和卫士李权

罗荣摄

“哟，真有你的啊！”赵本山只好去排在“龙”尾等候登记。

办完手续，赵本山走到小李身边，大拇指一翘，夸奖李莹说：“老乡，你真行呀！”

## D. 侯宝林大师和“保镖”拉家常

相声大师侯宝林这天进台，出入证摆在车头上，卫士一眼就歌得分明。可放行之间，卫士瞥见了侯宝林，真想和他聊两句，就冲着侯老微笑着招了招手，算是一种敬意的表达吧。

侯老看得清楚，他让车子停下，特意走出来，到卫士跟前热情地与卫士握手：“你们辛苦啦！”

“不辛苦，侯老，您过去夏天穿着长袍褂说相声，不容易呀，您这一辈子才叫辛苦哪！”卫士握住他的手，激动地回答着。

“您看过我的段子吗？”侯老对这位十八九岁的小卫士也尊敬地称“您”。

卫士说：“看过，看过，我早就听过您的《夜行记》。”

说起《夜行记》，侯老不禁感慨一番。是啊，这个相声段子的脚本原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叫郎德洋的干警和几个伙伴合写的，是为了自己演出而编写的。当时请侯老来辅导这个段子，不料侯老喜欢上这个段子，并且锦上添花地作了些修改，《夜行记》就捧多了，侯老也就越发喜欢上这个段子，后来，干脆，他自己说起来，再后来，这个段子成了一个颇受全国观



李谷一和卫士在一起

罗荣摄影

众、听众有口皆碑的“传统段子”，或俗曰“保留节目”。

“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啊！”侯老由衷地说：“社会安定离不开‘保镖’，没有你们，这中央电视台就不太保险了！”

E. 倪萍念念不忘：真感谢他们给我打气

倪萍调入中央电视台前，已具备了“口才明星”的才华和风貌，但进入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具有轰动效应的单位以后，她心里不免打起鼓来。

“这个大舞台亮度大，面积宽，听众观众覆盖面广，万一说漏了一个词儿，露了一颗‘沙子’，岂不在全国人的面前丢丑？”她带着忐忑的心情向赵忠祥“老师”请教。

赵说：“倪萍，你再那么紧张。你看人家中国女排，打得紧张就得‘露’怯，要不袁伟民老让她们‘放开打’吗！放开，就赢了，你记住，这就是窍门儿。”

赵忠祥说得幽默轻松，倪萍听了点点头。但事后，倪萍心里头还略有些包袱。过大门了，她抬眼看到门前矗立着一枝“橄榄绿”，而且那“橄榄绿”正含着挚爱的微笑迎着她哩。

她向卫士笑着举举手，算是个招呼，也是头一次的“见面礼”吧。

“您好，倪萍？”

倪萍没想到这绿杆儿“保镖”主动向她问好，心头一热呼，便同“保镖”聊起来。

“你认识我？”

“不但认识，而且很熟。”

“哟，竟是这样？”倪萍说，“我新来乍到，你怎么能熟识我呢？”

“我和我的伙伴们看过你的小品，意思（好）得很！我们还欣赏你演的影片，也很叫座。”

“是真心话？没撒谎？”

“当兵的，撒谎倒着爬。”

两个人越说越实在。倪萍又问他看过她的什么小品、电影、到底怎么个“意思”法儿，对方回答得如水似流。

倪萍于是把心里话掏给他，问：“我有个秘密告诉你，我调到台里来了，你们要保密。我还有句心里话想问问你。你们是电视台的卫士，在这儿见得多、识得广，对电视台内部的情形比我熟悉得多，所以，我想让你给我评一评，或者给我打个分，看我主持个节目什么的，够不够分，及不及格？”

“没问题，您尽管放心好了。”卫士一字一顿、丝丝入扣地说，“您绝对没问题！”

他还向倪萍分析了她的所谓“三大优势”：一、倪萍入台前有表演经验，有比较雄厚的基础；二、她的风格甜中带着自然美，适合在主持大型节目中与各路明星映辉成趣，灿烂加彩；三、倪萍身材好，有个儿和条儿，且比较匀称，这样的身材和风格与个头高矮胖瘦的演员都能配搭，没有“对比悬殊”的反差感——这，也是一种得天独厚吧。

倪萍听了这个陌生的观众对自己如此评价，心头的包袱全卸了，进入了赵忠祥所说的“放开打”的宽松心境。

春节联欢晚会上倪萍开始亮相，赢得了五湖四海的赞美——当然，她的登台、走红并不是单单从春节联欢晚会上露头儿，但不可讳言的是，春节联欢晚会是全台众多节目中最受欢迎，收视率最高，好坏是非反映最快最强烈的一个与世永恒的传统节目。在这个节目中亮相成功，生苹果也会熟透一半。要不，那么多大星小星都争着在大年三十露一面呐！

倪萍心境好，技艺又深进一层，不免常对绿杆保镖们抱以感激之情。她对身旁的人们说：

“亏了他们给我打气儿。要不是他们啊，没准儿还没有我今天这个主持人哩！”

因此，有的卫士要跟倪萍合个影、留个念，倪萍都痛痛快快地答应，从不拒绝。她觉得这也是一种答

谢的方式。

#### F. “国嘴”赵忠祥打抱不平

这天，一辆“桑塔纳”随在几辆正常进台办公的小车后面鱼贯而入。进门前一刹那，被锐目似剑的卫士小张一瞥正着：“站住！”因车速太快，小张不得不提高嗓门儿，大喝一声，同时探出臂膀强行拦动。

兴许是动作突然，匆促中小车“嘎吱”一声停下。瞬间，从里边跳下一人，大背头，戴墨镜，威风凛凛、怒气冲冲，冲小张开口就骂：“他妈的，小子，找死怎么的？”

“不要出言不逊。”小张提出批评道：“进台必须有证明，你难道不懂？”

“屁！老子从来不知进门还要证！”司机满口污词，蛮不讲理。

小张逼上一步，带着冷气问：“请快些拿出您的证件吧！”

对方挽起袖口儿，抻着脖子，似是一只爱斗殴的公鸡，向走上来的小张吼道：“怎么着，想练练怎么着。”

“想练练你可不是个儿。”司机身后传来声音。

他扭头一看，嘴，挺面熟，再一看，认清了，是赵忠祥。

他刚想跟赵忠祥“套磁”，赵忠祥已先入为主的微笑而严肃、风趣地说：“跟他们练你可能不是个儿。人家是行武出身，吃这碗饭的，您呢，先生？”

老赵的弦外音是：人家不愿和你较真儿，你还是知趣一些为好。

司机听老赵一点拨，抻长的脖子恢复了原形，叉腰的双手也自然下垂。

老赵顺势“釜底抽薪”道：“喏，您瞧！”他指了指门口的一只大牌子说，“那上面写着‘进门须知’，没有证不能入内，这是中央台的规矩——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

赵忠祥说着晃了晃证件，说：“我跟您一样，进台靠这个。”

那人听“国嘴”一番甜中带辣、辣中带甜的“教化”，自知理亏，蔫蔫地走进传达室登记。

#### H. 可惜迟了一步，韦唯大概没有发现这位“老外”

人们常说：人的命，天注定。这个带有哲学中的“机遇”和迷信中的“宿命学”的俗语，在某些特殊的场合还真是“唯一的”注脚。

北京大学的一个外国留学生 W·S，自称给韦唯写过几封信。但石沉大海，不知是他把地址写错了还

是什么阴差阳错吧，他没有得到韦唯的回音。但是，这个崇拜韦唯的年轻的“老外”并未因此而灰心。有几次，他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探听韦唯登台的准确的小道消息。然后，花百十元车费“打的”赶到电视台。

卫士们的“神眼”当然早已瞄准了他，但不知他在搞什么秘密名堂，好在 W·S 不入台，不折腾，只在大门口外徘徊，踟蹰……

因此，卫士们也不去干涉。

这天，韦唯来了。她下车后，主动向卫士出示证件，然后就像她演出时的老样子，浅浅地笑着登上了车。

“喂喂！喂喂！”

说来不知怎么那么巧，这“喂喂”的呼声和韦唯关门的“啪”的声音几乎是同步发出，一秒半秒都不差！韦唯没有听见，车子风儿似地驰进了院门。

W·S 垂头丧气。当时笔者正好在场，看到此情此景，不由怜从心起，告诉 W·S 不要气馁，并且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给他讲了一段韦唯的故事——

那是很久以前了，她伴随“心连心艺术团”沿广西边境演出。一天在合浦演出，结束时人们把韦唯里三层、外三层围得似铁桶，这个让老乡（按：韦唯是壮族人，祖籍山东，成长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原名张菊霞）签字，那个请老乡留言。

也难怪，韦唯成了红歌星后还没有到“老家”登台亮相，所以大伙儿千载难逢，一呼喽而上，把“老乡”围得个气儿都喘不过来。

这一下急坏了维持秩序的干警，他们连忙拨开人群，“杀”出一条“血路”，将韦唯像抬轿似地抬上了汽车。

谁知一个听韦唯的歌听得入了迷的小妞妞在车后紧追不舍，韦唯感动了，恳求司机停车，给这个小妞妞签了个名儿。

W·S 听了这段插曲，沮丧的神情一改而为笑颜毕露，他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告诉卫士：“我们交个朋友吧，将来我把信交给你，你替我转给韦唯小姐，好吗？”

我连忙接过话把儿，说：“他不能成为你的秘密信使，因为他们是‘保镖’的，上级不许可随意同台外陌生人交往，这差使就交给敌人吧。”

“好，好，好。”W·S 说得很中听。

我送给了他一张名片。同样，W·S 也给了我名片一张，那名片还有一句中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愿和中国人交朋友。”

[责任编辑 穆图]

# 留得齐璜 翰墨魂

——记白石大师女弟子姚陆其

●牧青

在国画大师齐白石门下，有一位“女中豪杰”——这就是今年80岁的著名画家姚陆其。

这位早年投入齐白石门下的姚陆其，专攻花卉草虫等写意技法，由于她天资聪慧，勤奋刻苦，画艺精湛，成为白石老人得意弟子之一。

几经苍桑，迄今已有70余年绘画生涯的姚陆其，已成为当代杰出的女国画家。她的作品继承了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笔墨功力极深，又融合现代意识，颇富有感染力，深受国内外收藏家的欢迎。

在谈到她的少年时代启蒙教育时，姚老爽快地说：她是湖南人，她的父亲姚鸿钧是民国初年南派著名山水画家，曾被誉为“南山子”。父亲还是清末的举人。除担任公职外，深谙医道，兼事行医。幼年时，即逢乱世，她随全家迁居吉林，长于松花江畔。那时父亲行医之余，以丹青为乐，他绘画造诣很深，但出于封建的旧观念，总认为女孩子没出息，不愿教她画画。但从小聪颖灵慧的小陆其，偏偏对绘画如痴如迷，每天家父作画时，总不离左右，甘当下手，细心观察，用心思索，仔细研修，融汇心田。

记得5岁那年，姚陆其父亲外出应诊，她趁机溜进画房中欣赏家父的作品，并趴在桌子上翻着父亲的画谱。翻着翻着她心中开始萌动，只见一页画上有小孩正煽扇子，挺有意思的，小陆其兴起，欣然提笔临摹下来，然后往桌子上一丢。不一会儿，忽听得几声铃铛响，父亲坐着洋车回来了。她悄悄躲在门边听墙根。父亲进屋看了画后问夫人：“这是谁画的？”夫人答：“是咱的小陆其。”“啊，不错吗？我教她画画吧！”

从此她就经常在父亲的画房里磨墨，看画谱，学作画。日久天长，父亲开始教她涂涂抹抹，并给她找了一堆宣纸，让她学画，并说：拿去画吧！画完一堆之后，又拿一堆学画。以后，父亲逐渐地给她讲点绘画的道理。如山水、松树怎么画，山石的性格花鸟虫鱼的技法等。

在小陆其年幼时，每当看到周围的小朋友纷纷背

上书包上学堂时，心中十分羡慕，虽然没能上学，但她更加刻苦地学习绘画，珍惜时光。当时父亲同意教她绘画时，她心中比圣旨下来还高兴。就这样经过父亲的严格训练和耐心指点，在国画艺术氛围熏陶下，她的画艺日臻成熟。十年过去，小陆其15岁时，便可全权代表父亲提笔作画，并应付画债。就在这一年，小陆其的父亲因病辞世。此时，全家悲痛欲绝，小陆其和二姐佩其便操父业，刻苦练笔，以画养家，并供她上学。

“九·一八”事变，小陆其一家颠沛流离，从东北逃进关内，落户在北京宣武门外教场小六条一栋四合院里。不久，她便考进“流亡中学”读书，此时，她二姐考入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当时正逢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和徐悲鸿都在艺专担任教师。小陆其的二姐佩其画艺精湛，出手不凡，成绩优异，深得白石老师的青睐。一天，佩其带着15岁的妹妹陆其到齐家拜访。白石老人见小陆其功底不错，头脑聪颖，话锋伶俐，颇有作画天赋。待看过她的绘画作品后，便主动捡起“湖南同乡”之情，收以为徒，此后，陆其和姐姐都是白石的弟子了。

以后，小陆其和姐姐佩其就是齐白石老师家中的常客。不久，姚陆其因语文和英语成绩优异考入了山





东齐鲁大学，每逢假期，必到齐老家中学画。后来，她转入北京中国大学，向齐老学画的机会更多，更方便了，她的未婚夫郭湘武也拜齐先生为师，学画之情更加浓了。

记得她和姐姐初到白石家中时，齐老院内有个大木盆，里面养了许多虾，大的有两三寸长，一个个活蹦乱跳，白石老人常叫她们围在盆旁仔细观察每个虾的动作，练习写生，完成对虾写生之后，煮虾入盘招待大家，学生吃虾，先生讲虾，十分有趣。

在齐老家中，陆其姐妹画艺循序渐进，长进很快。白石老人曾多次为她们绘画作品题跋，在佩其临摹的一张《螃蟹白菜图》上写道：“佩其弟子乡亲也，闻其声如在南衡之麓，其画颇肖余笔，喜我弟子业精于勤。”在陆其的《藤萝图》、《山水画》中题写了“陆其女弟子画笔秀劲，丘壑天然，往日之同侪不如女子也”。

在我国传统绘画中，字、画、诗三者的结合，能使艺术作品达到美不胜收之感。齐白石、李苦禅等大师的作品多为后人作出了典范，这对陆其绘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她的作品也常常配以诗书画字，使绘画别有情趣，有维妙维肖之感。

在齐白石大师的绘画作品中，具有独特的艺术功力和风格。他常对学生们讲：“凡作画，必须胸中要先有所见之物，然后才笔下有神韵。不要以传颂古人姓名多为学识，更不要以善道今人短处为己长，要我行我道，我有我法。”他特别强调写意。说是作画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大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善写意者专其神，专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复写生，写意而后写生，自能形神俱见，非偶然可得也！

有一次，白石老人在院中见一虫子抱一片树叶落地，马上出口成章：秋虫抱落叶，落地有余声。便这一情景描绘的自然，甚富有情趣。此外，白石老人治学有方，特别严谨，并趋于自然。记得，陆其姐妹每回一到老师家中，白石老人便手持放大镜，将她们引到院子里。院子内喂着不少鱼虾，种植着许多花草，老师常用放大镜观察着鱼虾花卉，给学生讲授着这些动植物的特点。然后返回画室，令大家铺纸作画，有时，他干脆边画边讲。在着笔和用墨时，他讲墨分五彩，凡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都要恰到好处。

有一次，友人请他画一幅桃花，陆其姐妹为他接住纸头，只见抹抹点点，一挥而就，桃花满树，灿然生辉。陆其看了心中暗想，花太多，不符合疏能走马、密不透风的原则。可是名师笔下的作品，弟子谁敢妄论是非？待画挂到墙上时，白石老人坐在围椅上注视



良久，忽然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将画一把扯下来，丢进纸篓，对陆其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马虎不得！”

在坎坷的人生和艺术生涯中，白石先生教诲深深记忆在陆其的心中。经过勤学苦练，她用心揣摩老师的各种技法，达到日臻成熟的境界。她画的花卉、翎毛、荷叶、藤萝、小鸡小鸭、虾虫鱼蟹等，都深得老师的赞赏。

回首她走过的艺术道路，她十分感激齐白石大师的亲切教诲，是恩师的指点和帮助，使她成为人民喜爱的画师。她要把学到的本领奉献给人民。

今年初，姚陆其的一幅佳作《紫藤》由乒乓健将国手邓亚萍赠送给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作品上还书写着“发扬传统丹青技，留得齐项翰墨魂，写出春光迎奥运，夺得荣誉振乾坤。”

今年6月，姚陆其为新加坡新任总统黄金辉画了一幅祝寿图，黄金辉赠送给姚陆其《国辉》磁盘，磁盘上刻有黄金辉的亲笔签名。

近年来，她先后被聘请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研究员，太行国画院顾问，妇女界乒乓球俱乐部名誉理事等多项社会荣誉，并在深圳等市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在多次展览中获大奖。为弘扬中华国画艺术，陆其女士应京津两地电视台邀请，向观众讲演绘画技艺，并多次为来华访问的日本和美国朋友介绍中国画发展历史及技法要点，并曾应邀到美国讲学，为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责编 穆图〕

向许世友将军遗体告别时，晴朗的天空忽然浓云密布，电闪雷鸣，洒下一阵骤雨。告别仪式完毕，竟然天晴云开……

# 上将

## 许世友 的生前 死后



●黎汝清

人们都知道许世友是个有着特殊的性格、独特魅力的战将，但大都是知道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多，知道他运筹帷幄善施奇略的少；知道他粗率严厉的多，知道他精细温情的少；知道他尚武的多，知道他习文的少；知道他求实的多，知道他浪漫的少……总之，不少人把他看成雄赳一介武夫，这是很大的误解。

我走进他生前的卧室，这是约有16平方米的房间。有一张三尺宽的单人棕绷床，对于在少林寺睡惯了木桩，在战争年代睡惯了门板的他来说，已经过分舒适了；靠窗口有一张办公桌，一张硬木椅，这便是他每日苦读的地方；在办公桌的右首，有两只单人沙发，一只落地灯，这一切都是公家配的公物，如果多来两个客人，那就要坐在床沿上。

深灰色的窗帘经长久的日晒风吹，变成了淡白色。在迎窗的墙壁上，有两张地图，这是他时常伫立纵目骋怀的地方；在房间的另一头，是一个大立橱，在橱顶上摆着两只战争年代就有的破损得很厉害的牛皮

箱，盛着他平时穿的几套新旧军装，几双布袜和日常替换的补过的内衣。拉开立橱，里面竟是空的。

这真叫人难以置信，我用骇异的目光询问他身边的秘书和管理人员：“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连排干部也比他多几件精美的家具，多几身新军装，多几双新鞋啊！”

“不是不给，而是不领，不领！不经他的允许谁敢给他领取新衣？”身边的工作人员用无可奈何的口吻作着解释，“就说棉衣吧，普通干部的棉衣四年一换，其实到第三年上就不暖了，他竟然一身六年，棉衣里都破了，还是不换。1982年，田普同志（他的夫人）给他打了件毛线衣，他一天未穿就送给了警卫班的战士，我们常劝他（简直是哄他），你的军装该换身新的了，还不如我们的新呢，他说：‘你们年轻人爱漂亮，我又不要漂亮！’我们说‘军容风纪总要讲究吧？’他说：‘怎么？旧军装就不讲军容风纪了？我不像你们，老是不扣风纪扣！’……”

在办公桌上，在翻开的台历上，记着他身臥病榻前，每天散步的路程：×月×日三千五百米；×月×日

三千里……在桌子的右角，放着毛、刘、周、邓、朱、陈等中央首长的选集；还有毛泽东同志要他读五遍的《红楼梦》和《周勃传》。“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要文武结合嘛！”

这些年来，他一直把这一教诲铭记在心而且身体力行，以冲锋陷阵的毅力苦学苦练，从清晨，沏一杯浓茶，直到中午，闭门读书，没有特殊事情，谁也不敢打扰，所以《红楼梦》里的许多诗，他都背得下来。

他写过一些诗，却从不示人，只给他的侄儿、女婿看过，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他是第一名，他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许多诗，也暗自背诵吟哦。

房间里，再也没有多余的摆设，墙上挂着几幅他与中央首长们合拍的照片，还有两幅国画，一幅是山鹰，一幅是奔马，此外，就一无所有了。这里几乎找不到他个人的财产，那床、那桌、那橱、那灯，都是公家配给他的营具。

一代名将简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可他的每月近400元的薪金哪里去了。他不是喜欢打猎吗？他不是喜欢喝茅台酒吗？他不是好吃狗肉吗？不要光说好听的了，他不是有个儿子犯了国法判了徒刑吗？在“文革”中“继续深挖五·一六”，下放干部，他不是犯过扩大化的错误吗？在破除“江南无煤论”中，他不也有过瞎指挥吗？至今还有人不能原谅他，在他逝世那天，在南京公共汽车上，不也有人高兴地说：“许大马棒死了”吗？还有，中央领导人都作过决议，死后火化，为什么他不？而且是从海南岛运来楠木棺材，而且还有施工部队去他家乡筑路修墓，这不是封建旧俗吗？是的！这些疑问都对，作者也都要作出回答：

我默默地站在窗前，窗外古木森森，落叶萧萧，深秋霜风给钟山抹上苍凉悲壮的色彩，像从历史远方飘来的一曲悲壮的歌！那窗外，就是他散步的地方，在那片蔬菜地里，仿佛还能看到他那任劳任怨的身影……我把目光收回，重又注视着简朴的房间，这里，每一件用品，都能叩击出历史的回声。

说他一贫如洗，也许不尽准确，他临终时，还留下1100元存款，一是伙食费，二是买茅台酒，三是救济身边的工作人员。这1100元的存款，按他的嘱咐是这样处理的：拿出500元给他的将近80岁的一身残疾、无人照应的妹妹；拿出500元给在坟地施工的人员会一次餐……

## 二

我们怀着极不平静的心情，走出他的卧室，来到

他的亲属中间：他的长子（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许光告诉我：“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之后，爸爸就不断提到自己的后事了，他从广州寄给我50元钱，要我给他做一口薄棺，他也知道，山区木材虽然便宜，50元钱是做不成棺材的，他是生怕我们做得太好了……信上说，棺材，不能超过一般群众……还说，在他百年之后，用一辆解放牌汽车，把他拉回去，埋在爷爷奶奶坟前……说什么自古忠孝难两全，我生为祖国尽忠，死为父母尽孝，也就两全了。……许光莹然欲泪，“这也算是爸爸的非正式的遗嘱了。”

他的侄儿许大权补充说：“我一直守在他病榻前，他对我说，大权，你不是会开车吗？你能搞到一辆解放牌吗？你开车把我送回去。然后，他说，在广州，在北京，他还有很多书，他把毛主席要他读的书送给我。……”

这就是许世友性格！

“他嘱咐我好好学习，他喜欢勇敢的人，最鄙视怕死鬼，我入伍后，第一次上前线就要求参加了突击队（敢死队）受了伤……伯伯看到我有点自满的情绪，就训诫我说，‘你只当过一次敢死队，受过一次伤，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当过七次敢死队，受过八次伤呢’……”

许光又说：他的大孙子道昆从部队复员后，想请他说句话安排个工作，他反而批评说：“工作不是由个人来安排的，还是回家去好好劳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爸爸身边有7个儿女，许光慨叹道，“我是1950年入伍的，我这个副团级算是最高的了。”

“这一点，爸爸是很严！”儿媳杨定春缓缓地说，“我那老三道江（许的孙女）高考未被录取，想请他在南京跟哪个学校说一声，借读复习一年，他一口回绝：“考学要靠自己下苦工，考得上就上学，考不上就下田劳动。……”现在，他的孙儿孙女都在乡下劳动……

许世友同志对子女的要求是严厉的，可是，在外地，在他鞭长莫及的地方，也有一个违犯国法的不肖之子，他听到之后，七窍生烟地怒吼：“枪毙！一定要枪毙！”在这个不肖之子依法判刑之后，直到他病危都不敢来见他。“幸好他不来，不然，伯伯真会对他开枪的！”

一段难耐沉默，也许各自想着自己的心思，也许都在走向这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的内心，看他是不是有一副铁石心肠。他的儿媳杨定春似乎敏感到这一点。用极为缓慢的声调打破了沉默：

“1969年，他的家被抄了，从仁和路5号搬到中山陵8号，我去看他，他问我几个孩子，学习怎么样，是

不是强壮,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名字也都和他说了,他老人家沉思了一会儿说,起名字,要响,要有气魄,要有意思,我看他们4个就叫昆、仑、江、海吧!他们是‘道’字辈吧?……我说的是……”

“他跟我拉家常:‘咱们的世系是:开绍元存仕,大道正光明,宗德永朝在,世代学先仁。我是第五代,我原来叫许仕友,后来知道仕就是做官,我干革命,不想做官,就改成了士;……后来,在长征路上,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两支部队在这继续召开了庆祝大会,那时,我在四军当军长,去参加毛泽东同志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同志问我的名字,他说,啊,你的名字我知道,只是闻名未见面,士友、士友,你现在是军长不是战士了,《共产党宣言》有个口号,叫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应该放眼世界嘛,世界之友不更好吗?……我现在的名字,还是主席给起的哩。’……”

许光继续说:“1981年,我和定春来看他,只见他在用罐头盒自制的木炭炉上炖火锅,是萝卜炖羊肉,我真是大吃一惊,我在部队30年,没有见过哪个首长用自制的炭火炉子烧饭吃。我说:‘你不是有炊事员吗?……’他说,‘我自己烧来更好吃!……家乡,过节,祝寿,才吃上这样的菜哩!’接着,我又发现了一件怪事,他的右腿在过雪山时,受了潮湿,每到天气不好,就浮肿酸痛,他用一个塑料袋装上热水,用绳扎起来,自己热敷,我问他为什么不让保健护士帮他,他说:‘我的法子灵,我们家的人一生不打针不吃药不进医院。’……”

“这次病危,他也不住院,”许光说,“只是在他昏迷时,才送他到医院的!……”

“后来,告诉他,他要的棺材做好了,是用十二原方木做的,放在小坡屋里,想让他高兴高兴,谁知他沉声地责备说,‘噢,你们也有钱,我就是怕你们做得太好,才没有多寄钱给你们,人死如灯灭,自然地来,自然地来,干么要浪费人力物力呢?’我也知道,实行土葬,可能引起非议,可他并没有在火化的决议上签字,自愿嘛,当时,中央是答应过的:面对这种生尽忠死尽孝的小小愿望,我们做晚辈的能说什么呢?……”

“临回家乡时,爸爸说:‘你们背几十斤红薯回去吧,是我种的,’我们觉得既为难又好笑,我说,‘咱家乡哪能缺这个?’他说,‘这里便宜,只有七分钱一斤,’我笑了,‘家乡只有三分五一斤哩!’后来,还是让我们带上他自己腌的酸菜。……”

感谢当代技术的恩惠,我们可以用最省力最真实的办法,从几十盘录音磁带中,剪接出他的生前友好们的声音,这里面有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各兵种的领导,他的过去的同级、下级、秘书、医生等。

“在战场上,他总是亲临敌前侦察,子弹在他耳边飞,急得警卫人员直跳脚,……所以他情况明,决心大,打得狠。”

“许司令下部队,一下子就插到连、排、班,就说国防施工吧,一下子就到前沿小岛上,钻遍所有坑道,连机枪掩体他都看,还要卧倒在地试试发射角,就是连工程指挥部的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他挖煤下矿井,练兵做示范,生产打赤脚,……各级干部爱他这一点,也怕他这一点,他做到了,你没做到,……所以,在他下边工作,不敢犯官僚主义,更不敢偷懒。……”

“打仗就更严格了,你老怕死,他非当场枪毙你不可,在万源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他不是亲手枪毙过一个团长吗?……”

“他喜欢打硬仗打恶仗,他是战场上的‘暴君’。就说万源保卫战吧,他那时是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可他的指挥所却设在离火线几百米的地方,我们这些当参谋的,真是紧张万分。……”

“他的严和爱总是联在一起的,严和恨也是联在一起,有时,他骂娘,‘我枪毙你!’有一次他在大会上批评一个犯了腐化错误的高级干部,‘我把你的军装脱了,你还不是一个光屁股的猴子!’那真是疾恶如仇,雷霆之怒啊!”

“在六五年,他视察海防部队,带了一个演出小分队,给守卫小岛的战士演出,有的地方只有一个班一个组,他是每场必陪战士们看,连看几十场,他很懂得战士的心,当兵三年,看不到司令员,那是遗憾的,他跟战士在一起坐着小板凳,教战士打少林拳,说三国、水浒里的故事,战士没有怕他的,只觉得他有趣,可亲,敢跟他开玩笑,摔跤;在南京,他组织了一支轰动全城的‘老战士篮球队’,跟丹阳县‘新农民队’友谊赛,他当队长,打得认真、泼辣、横冲直撞,把全体观众的肚皮都笑破了。跟农民在一起,他又成了道道地地的庄稼汉了!……”

“……杜甫出塞诗里说,挽弓当挽强。许司令员打仗,就是喜欢跟强敌打!真是处境越险恶。越能显出英雄本色,在万源保卫战中,面对30倍于我的强敌顶了三个多月,没有说个‘难’字和‘苦’字;他上战场,真是大将出马八面威风,只要他在火线一出现,士兵就像

感受了神功,使敌人谈虎色变。四川军,都怕‘铁胡子’厉害,这是他的不大为人所知的绰号。因为他在万源保卫战中,四五个个月没有刮脸,这个绰号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当然,跟他的性格,跟他那一身武功有关,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嘛。……”

“他有一种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战斗中不怕死,生活中不怕苦,为政不怕丢官,他常说丢了乌纱帽戴草帽,在‘文革’中敢揪张春桥的帽子,敢骂江青,敢说中央选错了人的,恐怕就是他了!”

“我跟他打仗多年,每次作战,他必亲自视察战场,当他摸清敌情、地形后,便泡一杯浓茶,把帽子向额头上一推,拉过板凳,在地图前,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仅仅1943年一年,他带的部队,在胶东就作战975次,……”

“在长征中,他调任骑兵部队司令,与敌人进行了70多次战斗,3千多骑兵,打到甘南渭县境内时,只剩下二百多人了!可见打得多么艰苦,多么惨烈。……”

“他打的仗,是无法算清的,从万源,到牙山,到孟良崮,到昌潍,到济南,到淮海,到渡江,到一江山,直到西沙之战,……说他是战功赫赫的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一点也不过分。”

#### 四

他是南京军区的老司令员,作者是南京军区的创作人员,接触他的机会不太多,但也不算少。

“啊哈!你们久等了!”他从楼梯上走下来,用浓重的湖北口音向我们打招呼,我们急忙站起,他跟我们一一握手,然后作了个气概不凡的手势:“坐。”

不等我们坐稳,又说:“把你们请来,是要你们到大别山去,好好了解那里的材料,写出来,给部队,那是革命的好教材啊!”

这是1959年春,在南京市中心仁和路5号,一间朴素无华的会客室里,由当时负责建军30周年征文工作的石言、王昊同志,带我去领取撰写回忆录的任务。在相隔两公尺的距离上,我全神贯注地观察这位传奇式的将军。

他那方正的面容并没有使人惊心动魄的地方,他的体态也算不上伟岸魁梧,却有一种刚毅粗豪之气向我袭来,使人想起那个矮墩墩的拿破仑。

“去年冬天,我回家乡,乡亲们见到我,都抱头痛哭,说我们四方面军离开之后,敌人疯狂地屠杀……他们带我去看万人坑,寡妇村,……他们跟敌人斗争,……你们就写大别山人的铁骨头!”他说得又快又急,还向我们晃了晃拳头,“没有铁骨头,撑不起人民的江

山,软蛋子什么也干不成!”

“你们先到当地去看看,先找别人,到北京找王树声,找徐帅,到上海找王必成,到杭州找林维先,到广州找詹才芳,到武汉找陈再道……”

“是不是请首长写个信?”王昊同志深知这些人物难找。

“你们写信,让他——”他指了指坐在一边的秘书“盖章!”

接见,就这样完了,还不到十分钟,我有些失望。

第二次领受任务。

那是1965年冬天,我随军区组织的慰问团去越南北方,他仍然在上面提到的会客室里接见我们。对于出国的要求,大概只说了十句话,然后对我的眼镜发生了兴趣。眼镜者,文人也!

“你打过仗吗?挨过飞机炸吗?”

“挨过!”

“在哪?”

“淮海战场!”

“害怕了?”

我一反往日的拘谨,大声地谈了挨炸的经过:那时一连几夜的行军,疲倦到极点,刚刚在一棚屋里睡下,“轰!轰!”身下的大地在跳荡,房顶上的灰尘,哗哗地撒落在脸上,我们把被头往头上一扯,蒙头大睡,五百磅的炸弹,炸不醒的睡眠,那真是听天由命了!

只说得他放声大笑,“好,好,这次再去尝尝美国炸弹的味道!”

这次接见,大约用了15分钟,有10分钟是我讲的。

1989年6月,我随从他的专机去四川成都,而后去万源,重访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场。在成都逗留期间,随从他去游览武侯祠,他在“三绝碑”前颇感兴趣地伫立了好久。却在《出师表》前停了很短时间,解说员刚作介绍,他便转身走了。

我暗自思忖,他本来喜读《三国》,对“两表”“一对”皆已熟知,因而不想细听,后来,才知道他对诸葛亮《后出师表》有看法,认为里面充满无可奈何的情绪,还有为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的失败有自我开脱之嫌,仔细想来,颇有见地。

这时候,跟随在我们身后的游人渐多,不断传来“许世友,许世友”的低语声,后来,竟然有许多外宾也跟随上来,外国人的这种好奇心,也许并不奇怪,但跟随和围观一群中国人,实属罕见。

后来,我们在武侯祠前拍照,几十名外宾和许多国内游客,一齐挤进镜头,保卫人员竟无法维持秩序,

精明的几个外宾，站在了我们的身后，只站了三四排，后面就为门廊的栅栏所阻，大部分都挤在两翼。于是这张照片就成了一张少见的互不相识的综合照。

“诸葛亮是个好丞相，好军师，不能算是好统帅。”

许司令员一边落座，一边跟陪同的人员闲谈着，“虽说他善用计谋，却不善于利用地形。”

闻者无不愕然，倾听一位高级将领评史论将的确机会难得。听者興味昂然，休息室内一片静寂。

“你们可以仔细看看三国，再好的作战计划，不占地势之利，也难取胜。孔明用兵，过分谨慎，只取用正，很少用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慎则无智，不敢冒险，就很难创出奇绩。……刘备让毛头小子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就是不懂得地利。……落了个白帝城托孤。……”

“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就是不知利用地利，这一点，他不如魏延，兵出子午谷，是能出奇制胜的，因为魏延敢想敢干。孔明没有冒险精神，奇谋就难施展。……后来，邓艾阴平渡险，突然插入蜀国腹地，一战而使刘家政权土崩瓦解，这一手比诸葛亮大胆得多、高明得多。……”

“不知民情难为相，不知地形难为将，诸葛亮治国、外交可以，用兵就差劲了。……”

“赤壁之战打得漂亮。”有人提醒说，觉得他对“智慧化身”未免评价太低了。

“赤壁之战是吴国打的，是周瑜指挥的，他只是搞搞草船借箭、借东风之类的配合行动。……你们想一想，他独自指挥过哪几次成功的战役？七擒孟获？孟获又不是军事家，称不上大战役，是攻心嘛！……胆略，胆略，胆在前，略在后，……没有胆，干不成大事，出不了奇兵。……”

事后，我重读有关资料，在一出祁山之时，魏延基于他的实战经验，提出一项奇袭计划，这是一个可行的计划，对敌情、地形、粮草都有精当的分析，可惜，孔明竟然以“轻躁冒进”否定了这个计划，连5千兵马都舍不得拨出，陈寿在《三国志》中是这样评价诸葛亮的：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跟许司令对他的评价是一致的。

## 五

作者还曾访谈过许世友的家乡人，有一位党委书记，讲到了他1958年冬天回家时的情景。

那时，汽车还无法开到他的家乡，在县里换乘马。他边走边停，思潮起伏，这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陌生的故乡啊！当年他放牛的地方，团团烟雾在山谷中升

腾，那大炼钢铁的人们，在并无铁砂的山谷中，把刚刚砍伐的松、樟、橡、栎，放火燃烧，这是荒唐的年代，历史的又一次劫难。国民党反动派，十年搜山没有烧光的树木，我们数百万人上山，把它伐光了！

眼前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他心中一团乱麻：他那时，还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打败了许多凶恶的敌人，却打败不了“贫穷！”在这浸透了血汗和希望的土地上，勤劳的苏区乡亲们日夜苦干，成果到哪里去了？

他拉马缓缓地走下山坡，他的低矮的家屋，许家洼已经在望了。一个樵柴的老婆婆，仰起脸来，用手打着遮檐，打量着远方来的客人。

这老婆婆一身褴褛，灰白的乱发，在多皱的额前飘摇纷披，脚上虽然穿着破棉鞋，却没有穿袜子，露着皴裂的脚背。“好面善啊，难道这是多年不见的母亲吗？”许世友的心，好像被无形的手揪了一把，他停到老人面前，但不敢冒认。

“你是友德（他的小名）娃？”母亲辨认儿子的目光，特别敏锐。……”

“妈妈！你……”他扑通一声跪在老婆婆面前，泪如泉涌，千言万语化成低泣，这时他想什么呢？也许想到8岁那年，告别母亲到少林寺去的情景。

母亲是坚强的人，只落了几滴喜泪，声音在激动中颤抖：“友德呀，……快回家看看，喂了两口猪哩！”

许世友搀着母亲前行，那老树皮似的手上，老茧有铜钱般厚。这是一位大别山的母亲，她与天灾、人祸和贫穷拼搏了一生，而没有失去信心。她是一位战功赫赫的上将军的母亲吗？年过七旬，还在樵柴、打草、喂猪……母亲与儿子，谁更坚强？

她这一生，经历过多少苦难？自从把儿子养到8岁，他们就很少见面了。母亲是无私的，她把儿子送给了革命，送给了祖国，母亲是勇敢的，从1927年黄麻起义，直到1949年解放，20多年来，她一直面对反动派的屠刀。

司令员要走了，地、县的领导请他吃一顿饭，顺便请他谈谈对家乡感想和要求：

“大好，大好，我看就不那么好！”他板着黑沉沉的脸，“连老祖宗都知道民富才能国强，现在，是民穷财尽！你们说什么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胡说，应该颠倒过来，小溪里有水大河满，小河里无水大河干！……”

“我们是讲锅里有，碗里才有。”有人轻声反驳，觉得确是如此。

“锅里有？”他怒视着这个自以为聪明的糊涂人，“锅里的是从哪里来？还不是从老百姓的碗里挖来

的？”他越说越冲动，“咱们共产党员，从什么时候，学会了自己骗自己？不要为了邀功升官坑害了百姓！”

“首长，咱们开饭吧！”有人低声说。

“我不想吃了，告辞！”他拂袖而起。

他登车走了，开出几十里路，他都一言不发，脸色阴沉，心情烦乱，……

“1982年我来看他，”乡党委书记继续回忆说，“他问家乡有了电灯了吗？我苦笑着说，‘有许多地方，还点你们打游击时用的松明子哩。’他长叹了一口气，觉得对不住乡亲，‘三十多年的奋斗，还是这么穷……我要给省委写信。’……”

这确实是老苏区人民的悲剧，是什么使我们的优越性不能发挥？是什么使我们起步这样艰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乡面貌可是大大变化了！”乡委书记叩叩烟灰，脸上流露出惋惜之情，“许司令员去世的太早了，两年前，我们乡就安上了电灯，乡亲们正等他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呢，……”

许司令去世了，他没有留下财产，也没有留下遗

言，只留下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他留下了一首回顾生平的诗：

八旬回眸忆平生，

鼙鼓旌旗铺征程；

巴山立马啸长夜，

五台横槊待晓明；

冀南烽火壮士梦，

胶东滩水父老情；

四十春秋数捷报，

百万子弟唱《大风》！

许世友司令员去世了，在向遗体告别时，晴朗的天忽然浓云密布，犹如战云翻卷；沉雷隆隆，犹如万炮齐鸣，洒下一阵骤雨，告别仪式完毕，竟然天晴云开。这种奇异的天象，纯属偶然，但绝非作者虚构，三千多名向遗体告别者和南京人民可以作证。奇异的天象不可能说明什么，也不可能产生迷信的揣测，却使不少人产生一种联想：想到他那轰轰烈烈感天地泣鬼神的一生。

（责任编辑：刘家驹）

## 欢迎参加“炎黄春秋”杯有奖征联活动

为弘扬民族文化，讴歌改革开放形势，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和湖北省孝感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炎黄春秋”杯有奖征联活动，特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指导和评审工作。欢迎海内外的楹联爱好者踊跃参加。

### 一、活动办法：

1、征下联，请按楹联规范对出以下下联：

三江呈瑞 五岳献珍 十亿神州兴改革春潮浩荡

2、嵌字联，请在上下联中分别嵌入“炎黄”或“春秋”二字，主题及字数不限。

3、自撰联，请以民族文化或改革开放为主题，自撰二联，字数不限。

4、生肖联，请以12生肖为内容，以其中之一（例如明年是犬年）或全部自撰一联。

### 二、设奖办法：

根据征联评审结果定出名次及奖格。即：特等奖1名，奖金5000元。一等奖2名，奖金2000元。二等奖3名，奖金1000元。三等奖500名，奖1994年精美挂历一本。纪念奖若干名，赠刊有本次征联活动评审结果的《炎黄春秋》一册。

凡获奖作者都颁发本次征联活动的优秀作品荣

誉证书。凡获奖作品除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并公布名次外，另将交出版社出版专辑。

### 三、参赛办法：

1、参赛者可选择本次活动的一项、几项或全部自由参加。

2、参赛者视参加项目多少预交组织评审费。即：参加1项交4元，2项7元，3项9元，4项全部参加10元。

3、4项全部参加者方可成为评审特别奖的候选者。

4、所有参赛者均可获取纪念奖，并可择优一副编入出版的楹联专辑书中（合作者姓名、单位）。凡需要此书者请另交工本费10元。

5、本次活动自1993年4月1日起，至1993年10月30日结束。凡应征参赛者请于截止日期前（以邮戳为凭）将作品寄至本刊中南发行部。

6、凡参赛者请将应征作品用16开纸誊写工整，并写明作者的详细通信地址、邮政编码、姓名（拟用笔名者请注明）和职业。

7、所有应征作品、评审及购书经费，都请直接寄交本刊中南发行部。地址为：湖北省孝感市城站路66号《炎黄春秋》杂志社中南发行部。联系人：韩秀珍 邮政编码：432100。电话：0712-227152。



1940年5月。

阴云，沉重地压在万里长江江面上。山风沿着峡谷，沿着长江江面呼啸而下。山城重庆，朝天门码头，这里聚集了上百万人。在这黑压压的人群中，引人注目的是，全身戎装、身披黑色斗篷、臂戴黑纱的蒋介石，他表情严肃，伫立在码头上，凝望着褐色的江面，冯玉祥将军沉痛地站在他身旁，高大的身躯，像一座石雕像，他们都没有说话，像百万倾城而出的重庆军民那样，悲伤地迎候着张自忠上将的亡灵。

“嘉陵”号拉响汽笛，长声悲啸。

顿时，船满长江，嘉陵江的大小船只，一齐拉响了汽笛，那声音撕心裂肺，痛彻骨髓。山城百万军民强忍在眼眶里的泪水一下夺眶而出，波涛声，风声和着一片恸哭声，多少年来，朝天门码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悲恸的场面……

军乐队不等号令便放响了礼炮，那炮声震动了群山，震动了江河，像是沉重的巨石，砸在人们的心上。

蒋介石从口袋里摸出了手绢，擦去了脸上的泪水。

几位军人从船上抬出了张自忠将军的棺木，缓缓走上船坞，江面上的浮桥吱吱地响着，承载着这千斤之躯。

棺木走上了石砌的码头，不知是谁大喊一声：“将军！”跪倒在棺木之下，顿时，黑压压地跪倒了一片。

蒋介石闭上了眼睛。

张自忠从1916年起就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营长、团长。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察哈尔省主席等职。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度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自参加抗战以后，张自忠一直转战于第一线，担任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后，张自忠指挥的部队常在20万以上。各部出自不同派系，难免互存芥蒂，因而指挥调度十分棘手。张自忠坚持宽人严己的原则，作战中常将33集团军置于最危险地域，尤以59军首当其冲，是以各部将领多心悦诚服，肯于用命。

# 忠义之士 壮怀激烈 一代名将 永垂千古

● 南友

## 张自忠将军之死





张自忠认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只能用热血和生命去换取。因此每一个军人都必须恪尽职守,为国效死。1939年夏,在赴重庆述职期间,张自忠曾对老长官冯玉祥表示:“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人不如人,我总要拼命地干一场,作一个榜样给人看,我一定尽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他还曾致电其弟说:“吾一日不在,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矢志以忠贞至死而已!”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公然成立卖国政府,使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对此,张自忠训诫前线官兵说:“我之抗战,不独为吾辈争生存而战,并且为祖宗争体面而战,为子孙争人格而战,苟非丧心病狂,愿以四蹄行者,必战倭,勿犹豫!”言语铿锵,闻声感奋。

1940年5月,日军为了进一步扫荡武汉外围,并对国民党军的“冬季攻势”施行报复,以11军司令官园斋和一郎为指挥,率领重兵,沿随县、枣阳之线以北地区展开攻势,企图首先歼灭襄河以东中国军队。

5月1日,枣宜会战开始。

张自忠的直属33集团军驻守河西,不是日军第一期进攻目标。但他为挽救危局将33集团军第38、第179师遣赴河东参战。5月1日,张自忠亲书手谕以告所部将领: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军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不久,李宗仁电令张自忠派有力部队渡河出击。张自忠深感战局不利,不顾自患痢疾和众将的极力劝阻,决定亲自过河督战。5月6日,他留书33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以死相嘱。信中说: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与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

张自忠亲率司令部直属特务营和74师的两个团,于5月8日由宜城县过襄河截击敌人。5月11日至5月14日,张自忠部在枣阳、襄阳一带,与日寇多

次激战,15日,张自忠兵分两路,令38师由枣阳、经吴庄、平林、板桥截击,他亲自率总部直属队及74师马贯一旅,经黄龙向张家集截击,敌军一战而溃,张部奋勇追击,将敌拦腰斩作两段。

于是,敌军密集重兵万余人,从南北两路蜂涌而来,向方家集包抄夹攻。张自忠的指挥部就设在方家集。

而张自忠的兵力仅两个团,两天打下来,两个团已经伤亡过半,指挥部也被摧毁两次。可是,张自忠仍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张自忠心中有数,38师距司令部只有40华里,180师,骑兵第九师正在襄阳以东向司令部推进,时间对他是有利的。

天黑时分,炮火暂歇了,张自忠这才想起肚子有点饿了,他赶忙吃了点东西,然后,便叫副官备马,准备去视察阵地。虽然将士们已经精疲力尽,可是明天还有一场恶战。

张自忠刚走出指挥部,便听到身后在喊:“司令,电报!”他接过电报,是第五战区司令部的急电:

“……敌人大军正由钟祥方面渡河西进,命你部放弃正面之敌,向钟祥敌后攻击。”

张自忠的头皮直发炸。指挥部的命令是要他南下,以疲惫之师,移师南下,是将他往死路上送。

但张自忠无法抗命。他只得立即下达连夜突围的命令。

一夜急行军。不知打了多少仗。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日军,每经过一个村庄都要作战,当部队到达宜城洪山区的鬲子口时,已经疲惫得寸步难行。

张自忠面临的敌军大约是他的兵力的五六倍,他准备凭险死守,同时急令38师180师迅速驰援。可是,战局又起变化。

张自忠接到报告:电台丢失。

通讯处长被团长洪进田小鸡似地提到张自忠面前,他是这场战争中的罪人。

“司令!”洪进田声若雷吼,“这小子企图自杀!”

张自忠凝视着通讯处长,后者满脸血污,脸上缠着绷带,浑身筛糠一般。张自忠痛心地说:

“你知道电台的重要性吗?你应用生命去保护它!现在,由于你的罪过,我们与长官部,与左梯队黄维纲军长都已失去联系,我军两面受攻,……”

通讯处长哭喊着：“司令，你杀了我吧！”

“不，我不杀你。杀了你，又顶什么用？”张自忠走到通讯处长面前，一把撕下他脸上的绷带，“你好好看看我！我要你去立功！”

通讯处长永远也无法看见面前的总司令了，因为，他已剜掉了自己的眼睛。

张自忠终于看清了通讯处长眼眶那两个窟窿，不禁怒火中烧。

“狗娘养的！自杀，自杀……我的部下害怕敌人的枪弹，自己挖掉了自己的眼珠……你是想要我把你当伤员运走吗？不，明早，我要你第一个去拼刺刀！”这种时候，张自忠几乎是残忍的，他立即严令疲惫已极的部队，不许喘息，立即构筑掩体。

1940年5月16日，一轮红日刚刚冲破山谷里的浓雾喷薄而出的时候，暴风骤雨般的炮弹便向张自忠部所占据的几个山头倾泻过来。

张自忠拿着望远镜在视察阵地，东边，少说也有三个敌军的榴弹炮营。西边的公路上有几十辆坦克正在沿着公路向他所在的山头冲来，后面还跟着大约一个营的步兵，南边，二团已经与日军猛烈地接上了火。北边，枪炮声忽紧忽松，情况不明。

张自忠一共占据着三个山头，互成犄角之势，可以相互炮火支援，还可以互为依托。

看来，敌军也看清了这一形势，所以集中兵力猛攻东边一团的阵地。经过惨烈的战斗，上午11时，一团的阵地失守了，日军占领了山头，守军无一生还，山头上充满了浓烟，浓烟中，隐约可见太阳旗和日军闪光的钢盔。

漫山遍野的日军现在正向张自忠所在的山头运动。张自忠面临敌军至少有三个师。

下午3点40分，日军已两次冲上山头，硬是凭刺刀、枪托把敌人打了下去，张自忠的卫队都已牺牲殆尽，连参谋长、顾问们都手持冲锋枪伏在工事里。

炮击又开始了。

日军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自己剜掉眼睛的通讯处长腾身而起，像一只发疯的豹子，朝敌人扑过去。但他很快倒在了敌人雨点般的枪弹下。

张自忠左肩中弹负伤。

“总司令！”传令兵惊呼。

张自忠摸了摸血迹。“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军人离开战场死无所！”

苏联顾问神色惊惶，对张自忠道：“我是国际友人，苏日关系未断，若战场被俘，恐怕引起国际纠纷，

我要离开此地！”

张自忠不假思索地说：“派三位弟兄送他，翻过高山，往东北方向走吧！”

苏联顾问迅速离去后，张自忠回过头对众人说：“你们都可以走，我不能走！”

然而朝夕跟随总司令左右的将士们大声回答：“司令！我们拼到底！”“司令！我们拼到最后一秒！”“司令！我们决不离开你！”

炮弹呼叫着在张自忠的身前身后爆炸。突然，一块弹皮打在张自忠的头上，鲜血沿着面颊淌了下来。

“司令，你负伤了！”副官马孝堂惊叫了一声，赶过来为他包扎。

一群日本兵吼叫着冲上了阵地。

炮声、刺刀的碰击声、喘息声、惨叫声、吼叫声，顿时交织成一幅壮烈的场面。

血，糊住了张自忠的眼睛。

张自忠抹抹眼睛举枪射击，一个日本兵应声倒下，又是一个……当他举枪向第三个日军射击时，一颗子弹洞穿了他的前胸。这时，王副官扑上去，背起张自忠，往小村庄东北方向跑去，没走几步，王副官被弹片击中，他丢下了张自忠，马孝堂副官抢上前，背起了张自忠，敌人的机枪朝他的方向疯狂地扫射。

“放下我！”张自忠叫道，“我要坚持到最后一秒！”

“不！”

“这是命令！放下我！”

张自忠躺在地上，大声疾呼：“对民族，对国家，我良心平安……”

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张自忠将军伏倒在巨石之上，两名日军正搜索着向他走来，一个日本兵看了看他，举刀向他刺来，张自忠将军竟就势抓住敌人的枪刺，奇迹般地一跃而起，猛向敌人扑去。可就在此时，另一日军向张自忠将军的前胸猛刺一刀。刺刀贯通了他的躯体，他大叫了一声，握住刀锋，倒了下去……那双怒睁的眼睛盯着蓝天，喷溅的血注流进了烧焦的土地。

傍晚，暮色正在悄悄地从山谷袭来。到处是一具具死尸。一场恶战在这里已经进行了三天，这座山上不知挨了多少炮弹，大火把山头几乎烧焦，只剩下恶鹰般狰狞的怪石被熏黑的身子，一队队的日本兵在打扫战场。

“这里有一个中国军官！”一个日军叫喊起来。几个日本兵围了上去。

那个中国军官身着黄色呢子军服，肩章和领章都

已撕去，看不出是什么级别的军官，50岁上下，头上无军帽，包着浸透血的绷带，短发平头，身上几处枪伤，胸前被刺刀贯通。

一个日军少尉闻讯赶来，他仔细检查了这个军官遗体周围的环境和遗物，向师团指挥部报告：

“我部已攻占302高地，33集团军74师已被我军全歼，并击毙敌74师旅长马贵一。”

40分钟后，敌师团长渡边少将率众赶来，他走到那位军官的尸体旁，命人揩去军官脸上的血迹，他的眼睛一触及到那双紧挽在一起的浓眉，绷得紧紧的嘴巴，和那下巴青楂楂的胡子，不禁大叫一声：

“张自忠将军！”

黄昏，一队日军从山上走下来，一副担架上抬了张自忠将军的尸体，尸体上覆盖了一条军用毛毯。

远处的枪声便密集了。渡边少将命令队伍停下来，渡边少将走到张自忠将军担架旁，他又一次掀起军毯，借着月光，凝视张将军的遗容，那张血迹斑斑的脸那样冷峻。渡边少将心想，作为一个军人，张自忠倒是血染沙场，马革裹尸的将军，令人钦佩，他不由自主地摘下了军帽。

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渡边少将必须立刻率部冲出重围。他下令叫军需处长弄来一口棺材，用军毯包裹了尸体，在一棵大柏树下埋了。渡边用刀在柏树的树身上砍了几刀，剥去一段树皮，在那白色的树干上，他凭借着月光，用小刀刻了一排汉字：

“张自忠将军之墓”

他命令士兵们举起枪来，对着山里的夜空，放了一排枪。然后，命令士兵们快步突围。

东条英机内阁总理大臣是在当天夜里零点三十分收到这份战报的。他用汉字写下：“三军易得，一将难求。”

第五战区及重庆当局得知张自忠殉国，立刻严令战区右翼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尸体。

然而，重庆当局，蒋介石何尝知道，当年被人误会的张自忠将军壮烈牺牲，连侵华的日军头目们都是肃立起敬的。

1935年，他从察哈尔省主席任上调任天津市市长，丧国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不久，华北逐渐特殊化，日本亡我华北阴谋已完全暴露，他辅佐宋哲元将军屏藩华北，整军经武，外与日军斗智，力撑危局。但于国人眼中，他是什么东西，“七·七”事变后，他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并兼北平市长，更是忍辱负重，巧

与日方周旋。但国人不明真相，误以为他已投敌，当了汉奸，不久他化装逃出北平，到达南京之时，京沪一些报纸大为攻击，流言四起，主张军法会审，……

但是渡边少将、东条英机知道，张自忠部的确不同于别的国民党军队，张部的部队装备并不精良，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冯玉祥的部下，军饷和军粮都很困难，但是士兵作战却相当顽强。

1938年3月，坂垣师团长野旅团以步兵两万，大炮三十多门，配合空军向临沂这块弹丸之地发动了猛攻，张自忠率领步兵十一团，趁夜偷偷渡过沂河，并亲临前线，3月13日，张自忠奇兵天降，猛扑日军项背，日军阵脚大乱，正在进攻临沂的日军忙掉过头来应战，这时被困在临沂城内的庞炳勋部，见日军仓皇退却，便乘势衔尾杀出。这一仗，杀得日军溃不成军，毙敌四千余人，俘虏日军一百余名，击毁、缴获坦克二十余辆。坂垣师团长野旅团全军覆没。

在临沂桃园、三官渡战斗中，渡边少将曾亲自与张自忠交战，渡边不会忘记，那一次，渡边率残部仓皇逃窜，两个联队，损失殆尽……

1940年5月28日，重庆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张自忠上将葬礼。

毛泽东在延安题词：“尽忠报国。”

朱德、彭德怀题词：“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贵在朝野图存。”

周恩来则说：“张将军之殉国，不仅是为抗战树立了楷模，同时也是为了发挥我民族大至大刚的气节和精神。中国历史上多少伟人名将，在抵抗外人侵略时杀身成仁，见危受命，张上将之殉国，便是发挥了这种民族气节的传统。”

冯玉祥将军扶着张自忠的灵柩悲痛不能自己，他泪飞如雨，张自忠是他的爱将，从1917年起，就跟随他转战南北，从士兵一直到上将。他深知，张自忠不仅敦厚、诚实，正直，而且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而现在英年早逝，年仅49岁。

冯玉祥来到北碚为张自忠致祭，为张自忠题写了墓碑，并将安葬张自忠将军的小山命名为梅花山。

每年5月16日，冯玉祥，这位身材高大、坚强不屈的将军在张自忠的墓前低下头，祭扫先他而去的张自忠将军。

〔责编 穆图〕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两件有关皇帝之死的著名疑案：一是宋太祖赵匡胤之死，向有“烛影斧声”之说，宋太宗赵光义似乎逃脱不了干系；一是清世祖爱新觉罗玄烨之死，也有“改诏夺嫡”之嫌，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也似乎逃脱不了干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余年，皇权至高无上，争夺皇位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但是，绝大部分帝王的暴死都是清清楚楚的，唯独这两桩没有着落，一系弟弑兄，一系子弑父，都是极其隐秘、极其残酷的，留下了千古奇案。笔者不是历史考古学家，也无暇去考证此事的真伪，倒从从历史的轨迹中悟出一点学问，那就是闭关自守的中国，中央集权之甚，恐于天下独一无二。

中国的皇帝制度创始千古一帝秦始皇，皇权也便同时应运而生，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嬴政为使帝业万世相承，乃创建

皇帝制度，废封建，设郡县；废世袭，派流官；加强中央政府，划一天下制度；颁行秦律于前，焚书坑儒于后。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天下大权，集于中央；中央大权，集于皇帝。总而言之，皇帝即国家，国家亦即皇帝。这样，皇帝与专制合而为一，一以贯之，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

关于皇帝名号的由来，《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提到，秦灭六国以后，秦王政令丞相、御史曰：“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由于自殷周以来，国君君子一般都称为“王”，秦王政以为“王”称号已经不足以显其尊贵，所以要议帝号。群臣议论的结果，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冒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王犹嫌不足，“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令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段话见之于《资治通鉴》卷7《秦纪二》。

从此，“皇帝”就代替“王”而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称。随着皇帝名号的确定，有关皇帝的政务活动及其亲属均制定了法定的称号。例如，臣民对皇帝须称“陛下”，史官纪事须称皇帝曰“上”，皇帝的车马器械曰：“乘舆”，皇帝驾临曰“幸”，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帝死曰“崩”，等等。又如，皇帝父母曰“太上皇”、“皇太后”，妻妾曰“皇后”、“妃嫔”，子曰“皇太子”、“皇

子”，女曰“公主”，孙曰“皇孙”，等等。

究其本质，皇帝的名号本身就包含着专制的意思。蔡邕在《独断》里写道：“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前也，能行天道，事天审禘，故称‘皇帝’。”按“帝”实即古“禘”字，以祭天之礼的专称，中国古代殷周以来唯王者有禘祭事天之礼。故《白虎通》卷一云：“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臣民称皇帝为“陛下”，后世“非天子亦不敢用”此“至尊之称”。皇帝实行独裁统治，总揽一切大权，故“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的权力是有限的，“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皇帝权力行使的方式，一般是在朝则听朝理政，批阅奏章；外出巡幸则监察官吏，察看民情。皇帝行使权力的凭证是玺、符和节。

## 祸起

## 萧墙：

“玺者，印也；印者，信也。”相传秦始皇以和氏璧制成御玺，方四寸，交五龙，李斯手书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印玺之外还有符、节。符为兵符，多用于调兵遣将、从事征伐之用。节也是一种信证，使臣执以示信。

中国皇帝制度的重要内容还包括后宫制度，宫殿、宗庙、陵寝制度等。其它略过不表，单说皇宫，就令人叹为观止。站在北京景山中峰，举目向南眺望，一片琼楼玉宇，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金碧辉煌，这就是极负盛名的故宫。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叫紫禁城，是五百年前遗留下来的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有十五万平方米，比法国的凡尔赛宫大得多，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综观故宫的建筑，可说是最充分地体现了帝王至尊无上的思想；它的总体建筑形制式和总体布局，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礼制和象征帝王权威的精神感染作用，得到最典型的表现。太和殿系整个皇宫的主脑，是举行大典的地方。当皇帝升座时，殿前陈列的鹤、鼎、炉都升起袅袅香烟，缭绕殿宇；殿廊下的金钟、玉磬和笙、笛、

箫、琴齐鸣，跪在丹墀和殿前广场的文武百官三呼万岁，充满了肃穆、尊严和崇高的气势，整个皇宫红墙、红柱、黄色御座、黄色琉璃瓦而赤霞辉映、金光万道，给天下臣民和外国使臣以强烈的皇权威严而神圣的精神感染。故宫共有房间九千多间，仅白昼就足以令人产生广袤繁杂、深沉博大的赞叹；及至夜间，更显得幽深、空旷、午夜时分，万籁俱寂，平添无限的恐怖感。此时此刻，若联想起杜甫的《宿昔》的后两句：“宫中行事秘，少有外人知”，岂不要感慨万千，拍案叫绝了？

不过，中国皇帝制度的最重要的内容，倒并不在那些繁文缛节和空架子上，而在皇权的延续性上；所以，皇位继承制度可以说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命根子，它对皇帝制度得以延续两千余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书》卷43《叔孙通传》里提到，汉初统治者已逐渐认识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

他虽然平定了三藩之乱，统一了台湾，击败了沙俄的入侵，平定了准噶尔叛乱，维护了国家的强大与统一；他虽然革去了内监“十三衙门”，严禁宦官参预政事，使得宦官专权干政的现象未能出现；但也未能逃脱宫门之祸。可见中国古代争夺皇权的斗争残酷、激烈到了何种程度。

然而，话说回来，这两桩历史疑案也只是疑案，并无定论的。想那宋太祖，既然“孝友性成，誓守金匮遗言，不欲背盟”——不忍违背帝位先传弟，再传子的母训，且“尝谓光义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那么，宋太宗也就没有弑兄篡位的必要，因为金匮遗言里已写得清清楚楚了。至于匡胤临终之时，独召光义面谕，光义屏退内侍的情节，亦无实据。而太祖嘱咐光义，“语言若断若续”，“又见烛影摇红，或暗或明，仿佛光义离席，逡巡退避的形状。既而闻柱斧戳地声，又闻太祖高声道：‘你好好去做！’”等状，也不能肯定是光义下手。何况“你好好去做！”这一“语音激而惨”的话，无论如何得不出匡胤反悔的结论。裨官野乘，托词太祖生一背疽，疼痛难当，光义入视，突见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云云，则更是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之所以有此类传闻，也许因为后人鄙薄光义为人，恨其背誓，才作出种种虚话。关于康熙帝之死，则根本谈不上“夺嫡之变”，

因为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胤禵乃一母所生，胤禛还居长。

史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改诏的时间和地点，改早了，若被身体尚健的康熙帝发觉，纵使太监们装聋卖哑，胤禛的死罪却是免不了的；改晚了，倘若康熙一命呜呼，诸皇子、贝勒、王公、大

臣齐聚寝殿，宣读遗诏，那就没有戏唱了，极言雍正帝篡位的史料称康熙帝本遗诏“传位十四皇子”胤禵，胤禵盗之，将“十”字改为“于”字，似乎天衣无缝。可是，殊不知按清廷后室惯例，向称“皇X子”而不称“X皇子”；如此看来，纵使改诏人有包天之胆、乱真之技，这诏又如何改得？也许因为雍正帝后来政令苛繁，治民过严，又大兴文字狱，激怒天下士人，才编造出这一段骇人听闻的故事，也未可知，掩卷沉思，后代历史学家若能考证清楚这两桩帝王疑案，便是天大的造化了。



# 皇权

## 之痼疾

●田慧刚

动”的道理。历代君王无不把立储看作是延续宗祚的头等大事。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无数次宫廷变乱，根源就在于君主专制制度本身，也就是说，在于权力无限之大的皇权。两千多年来，因为嫡庶长幼争立而导致天下大乱者，不胜枚举；在这一漫漫历史长河中，皇子被杀者十之八九，善终者不过十之一二。宋太宗即位以后，不遵金匮遗言，逼迫兄子德昭自刎，又屡屡迫害已弟廷美，致其忧忿而死，史书记载分明。清世宗登基之后，对其诸多兄弟视为仇敌，滥加迫害，或革职，或禁锢，或使人杀之。无他，皆为因其帝位，以传己之子孙也。宋太祖纵然“禀天纵之姿，有神武之略”，他可以矫诏兵变，黄袍加身，他可以“杯酒释兵权”，都逃不过烛影斧声之灾。清世祖更是一世英主，

# “医中之圣”

李时珍逝世  
四百周年祭

# 李时珍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会长 温济泽

今年9月，是李时珍逝世400周年。他是16世纪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科学家中的一位著名人物。郭沫若称他为“医中之圣”。他的辉煌巨著《本草纲目》，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东方医学巨典”，被英国伟大生物学家达尔文誉之为“中国的百科全书”。

## 少年时代

李时珍，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出生在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瓦礫坝的一个世医人家。那时是明朝中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逐渐发展的时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达。李时珍这位医药科学巨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诞生的。

他的父亲李文闻，是当地一位著名的医生，又是个秀才，写过《人参传》和《蕲艾传》，以后又写过《四诊发明》等医药学著作。在他的书房里，常年散发着药草的芳香。由于家庭的熏陶，李时珍从小就对医药发生兴趣。

李时珍出生后，体弱多病，经他父亲多年调治，到10岁左右身体才渐渐好起来。蕲州多山，盛产各种药材。他常跟着父亲和哥哥上山采药。听父亲讲药物知识。他小时候就能分辨出多种草药，说出它们的名字和功用。离瓦礫坝不远，有个南湖，他也常到湖边去

玩，从渔民那里学到了不少关于水鸟的知识。少年李时珍，对草木虫鱼的知识就懂得很多，并且表现了特别爱好。

李言闻在元妙观设立了一个诊所。他常把大儿子李果珍带去做助手，但希望小儿子李时珍将来能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李时珍顺从父亲的意愿，读经书，学做八股文，在14岁那一年，由父亲带着到黄州府去应科试，他考中了一名秀才。

## 立志行医

李言闻要儿子李时珍继续读经书，准备考举人。李时珍心里想学医，对应试不感兴趣，对写八股文更感到头疼。他在17岁、20岁、23岁的时候，三次到省城武昌去应试，都落选了。三次失败之后，他下决心放弃做官这条路，立志致力于他所爱好的医药事业。

他看着许多贫病乡邻需要医生，有些没有钱的病人带着南瓜之类的东西当诊费，来请他的父亲看病。他又看到父亲总是尽心竭力地替人治病，有时还把自己采集和炼制的药品免费送给穷苦的乡邻，受到了许多人的感激和尊敬。他立下行医的志愿，就禀告了父亲。他父亲也深知儿子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特长，也就同意了。

李时珍23岁随父行医，24岁时就自行正式挂

牌。这时李时珍已和他的妻子吴氏结婚，长子李建中  
也出世。他的大哥到外地谋生去了。他就和父亲两人  
共同挑起了养家活口的重担。

这个时期，蕲州连发水灾。江水倒灌蕲河，市镇  
街道和两岸农田都被淹没。洪水退后，各种疾病流行。  
李时珍和他父亲不辞辛劳，忘我地治好了许多人的疾  
病。李家和乡邻们建立了更深的感情，也在乡邻中有  
了更高的威望。

李时珍逐渐出了名。当地王府也常请他去治病。  
有一次，王府有个孩子患了嗜吃灯花的怪病，他用了  
使君子、百部等杀虫药，很快就治好了。现代医学研  
究，认为这是钩虫病人的症状。可见李时珍早在400  
多年前就已掌握了诊治这种寄生虫病的方法。有一位  
老妇患了多年习惯性的便秘，经过许多医生医治无  
效，李时珍用了适量的牵牛子让她试服，果然大便秘  
通。他以后又用这个方子治好了不少病人。请李时珍  
看病的人日益增多，不仅附近几个州县的人来求诊，  
有些远方的病人也到蕲州来找李大夫。

### 勤学苦练

李时珍在行医的同时，为了精益求精，抓紧时间  
下苦功钻研了古代的一些药书。

我国历代医药学家和劳动人民，在长期同自然界  
的斗争中，早就知道能用某些植物、动物、矿物来防  
治疾病。在这些药物中，草木类占多数，因此一般就  
把中药称为“本草”，讲药物的书也以“本草”命名。

我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夏、商时期，就积累了一  
些用药的经验。春秋战国时期，史书上记载的药物  
已有100多种。大约到了汉朝，有人把前人研究的成  
果作了一个总结，写出一部《神农本草经》，共收集药  
物365种，这是我国古代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医  
书。

以后，历代都有订正增补。南朝有《神农本草经  
集注》，唐朝有《唐本草》等，宋朝有《开宝本草》、  
《嘉祐补注本草》等，到了1108年（宋徽宗大观二  
年），四川名医唐慎微编成《证类本草》，收集药物已  
达一千余种。这是《神农本草经》之后又一部带有总  
结性的巨著。

李时珍反复研读了这些医药书籍。他自己家里的  
藏书不多，就利用给人看病的机会，和蕲州几个乡绅  
家接近。蕲州还有个荆王府，住着皇族，李时珍也常  
去那里治病。这些乡绅家，特别是王府里，藏书都较  
丰富。有些在民间见不到的书，在他们的书库里可以  
找到。这样就开拓了李时珍读书的范围。李时珍不仅

反复研究了各种医书、药书，还阅读了子、史、经、传、  
声韵、农圃、星相、乐府等各种书籍，收集了大批材  
料，写下了大量笔记。

他专心攻研的是本草。从博览群书中，他看到了  
先辈的辉煌业绩，也发现其中有一些讹误、重复和  
不足之处，有的是观察上的错误；有的是论说上的欠妥；  
有不少药书成于庙堂人物之手，对民间习用药方抱着  
轻视的态度。特别是自《证类本草》成书以来，已经  
400多年，随着经济、科技、贸易的发展，新发现的  
药物又已不少。他认为：正如宋朝名医唐慎微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证类本草》那样，现在也应该  
有人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经过重新整理、校订  
和补充，编写一部内容更加丰富的本草学的新书来  
了。

李时珍立下大志，要把这个历史重担肩负起来。

### 广罗博采

李时珍拟定了写书的计划，就把对比研究各家本  
草而记下的大量材料，按照自己所设计的分类，一条  
一条地整理编写。起初还顺利，以后越来越困难。他  
觉得要弄清楚许多药物的形状、生长过程、性质和功  
用，光靠研究书本不行，还必须对这些实物亲自进行  
观察和实验。

蕲州有几种特产：蕲竹（竹子），蕲艾（艾叶），蕲  
蛇（白花蛇）。李时珍的父亲观察和研究过蕲艾，写成  
《蕲艾传》。他到药贩子那里去找白花蛇。有人告诉他  
药贩子收的蛇有些是外地来的，真正蕲州出的白花  
蛇，要到龙峰山上去找。他几次登上龙峰山，果然看  
到不少白花蛇，不仅观察到了白花蛇的形态和习性，  
还看到了捕蛇人捉蛇和杀蛇的方法，研究了蕲州的和  
外地的白花蛇的区别，后来写成了《蕲蛇传》。

他又到远近的许多山上、山谷和原野去观察。考  
察了沙参、紫草、当归、豆蔻、苍耳等很多药材，还  
有山鸡、火鸡、野猪、土蜂等好多东西。他一一仔细  
观察，对于许多草药的形态，怎样开花、结实，各部  
分功用如何，都作了认真研究。他常常带着自己的徒  
弟庞宪、儿子建元，背着筐，采集各种药物标本。他  
又很虚心地向农民、药农、果  
农、樵夫、猎人、渔民请教，把  
他们看做老师和朋友。过去书  
上说女萎和萎菹是一种东西，  
经过考察和访问，弄清楚了是  
两种不同的药用植物。过去书  
上说南星和虎掌是两种不同

古  
鏡  
台

的植物，后来证实了是同一植物的两个名字。过去书上没有把葶、葶、蕲、葶这四种相似的水花植物讲清楚，经过亲自深入观察，也终于把它们之间的区别弄明白了。

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李时珍进武昌楚王府为奉祠所的奉祠正（掌管祭祀礼节的官员），兼管良医所。三年之后，又被楚王推荐进北京的太医院，这时李时珍已41岁。他利用太医院的优越条件，学习了更多的东西。太医院里不但藏书丰富，而且所属的药房和御药库，保管着许多各地进贡来的名贵药材，这给了他研究各地药物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李时珍从前读过《铜人针灸经》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到了太医院，在药王庙里，看到了显示人体穴位的铜人模型。他从模型上对人体各个穴位作了仔细的辨认，对腧穴和经络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后来写成了《奇经八脉考》等书。

他在太医院任职只一年左右。明世宗朱厚熹宠信方士，迷信丹药，梦想长生不老，做神仙，而不重视医药。他向太医院提出要重修“本草”，太医们又攻击他“擅动古人经典，狂妄已极”。他在愤怒之下，不得不托病辞职。他在太医院常和方士的迷信邪说进行争辩，但他又认为方士的炼丹法中有些技术还可用。炼制水银、轻粉等药物的方法，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的。

他辞去太医院职务以后，仍南归回到楚王府。南归的路上，经过涿州、安阳、许州等许多地方，沿途考察。从驿府那里，他收集到煮食旋花（俗名鼓子花）能治愈筋骨伤痛等民间秘方。

以后，李时珍又多次旅行到各地去考察，到过湖广、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地，还深入到太和山（武当山）和大别山。他不避艰险，风餐露宿达几年之久，行程两万多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他把自己从书本上得到的药物知识，重新在实际考察中作了对证。他又采集到一些新药，如能治咽喉疼痛的朱砂根和九仙子，能治虚寒和血气消痛的千年艾等，都做成本带回去了。他还冒险采到几枚榔梅，这是太和山的特产，明朝皇帝把它当做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只不过有生津止渴和消酒的作用，并没有什么治病的功能，他还在樵夫和猎人的帮助下，在深山大峡谷中捉到了一只穿山甲（鱗鲤）经过解剖和观察，发现穿山甲的胃特别大，里面有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它是食蚁动物，可以用为治疗惊邪、痔瘕、通经、下乳等的要药，他还走访了各地的铃医，从他们那里收集到很多民间的单方，有

些还是祖传的秘书。这些后来都成为他编著《本草纲目》的重要材料。

## 辉煌巨著

李时珍实际上重修“本草”，始于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时年35岁。

他受《通鉴纲目》一书的影响，采用了“以纲挈目”、“振纲分目”的编辑体例，因此，把书名定为《本草纲目》。

为了修订《本草》，他参阅了800多种书籍，其中精读和详加评注的药书有40多部，医书有270多部。他还经过实地观察和采访，积累和收集了大量的关于药草的第一手资料和民间药方。在初稿写成之后，又经过三次大的修改。到定稿的时候，已是1578（明万历六年），这时他已是61岁的老人。为了完成这部辉煌的巨著，他化了27年的漫长时间，付出了大半生的宝贵心血。

《本草纲目》这部书共分52卷，190多万字。全书把药物分成16个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每一部又分成若干类，如水部分为天水和地水两类；草部分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等9类；木部分为香木、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杂木等6类；服器部分为服帛和器物两类。每一类又分成若干种，如天水类分为雨水、露水等13种；山草类分为甘草、人参、长松等70种。有的部下面直接分成若干种，如金部分为朱砂银、赤铜、铅丹等28种；人部有爪甲、人参、长松等70种。有的部下面直接分成若干种，如金部分为朱砂银、赤铜、铅丹等28种；人部有爪甲、人尿、乳汁，人血、人胞等37种。全书共收载药物1892种，比前人新增了374种。对每种药物的解说方法是：先标药物名称，作为“纲”，下列各栏为“目”。这些“目”有：“释名”（解释药物名称的来源和依据），“集解”（说明产地、形态和采集方法），“修治”（讲解炮炙方法），“气味”（说明药物性质），“主治”（阐述药物的功用），有些药物还没有“辨疑”“正误”栏目（纠正过去本草中的错误），最后是“附方”（说明在实际应用时对症下药的药方）。全书收载药方1109个，比前人增加了4倍。其中李时珍亲自收集的民间药方就有8161个。全书还有金石、植物和动物的插图1110幅。其内容之丰富，涉及知识之广博，绘图之精美，是古代任何一本本草书所不能相比的。他在完成这部巨著的过程中得到他的学生庞宪，几个儿子和许多同行的帮助。



## “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1956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在湖北省蕲春县重新修建了李时珍墓。郭沫若为李时珍墓题词曰:

“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一八九二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李时珍生活在16世纪。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到16世纪在世界上始终占领先地位。据统计,从10世纪末到16世纪,全世界重大科技发明项目中,中国占58%,其他国家占42%。从公元前200年到1800年,中国科技项目传给西方的远远比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为多。不仅科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只是在16世纪之后的几百年,我国才逐步变得落后。

即使在我国变得落后的这几百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仍在世界上流传。《本草纲目》的俄文译本是在1857年出版的,德文译本是在1928年出版的,1929年起又陆续出版了英文译本有10多种。

在国内,《本草纲目》在南京问世以后,过了7年,又在江西翻刻。以后明朝崇祯年间,清朝顺治、光绪年间,又多次翻刻和重订。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万有文库》,收入《本草纲目》,分订为30册。1954年,又将文库中的《本草纲目》单独重印,合订为6厚册。最近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纲目通释》上、下两大卷,除去保存了原著的全部内容,并对各卷进行了重点注释。在注释中,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对其中所载药物的来源、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毒副作用等作了详尽的论述;对所载常用药物的现代临床应用进展也作了较全面的介绍。《本草纲目》共计190万字,《本草纲目通释》达到500万字。这是对《本草纲目》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可以说这是在李时珍逝世400周年之际对他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回顾往昔,瞻望未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和腾飞,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必将到来。

我国古代文明,包括李时珍的伟大学术成就,也必将重放光辉。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电影《李时珍》中的那只歌:“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正是这种传统精神的体现。今后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也必将会继往开来,把这种精神弘扬光大。

我国早期的本草书把药物分成三大类,就是上、中、下三品。上品主要包括无毒,或毒性小的属于滋养强壮的药物;中品有的无毒,有的有毒,既可滋养强壮,又有治病的作用;下品一般多有毒性,专用来攻治疾病。这大致是按药物的功用来分类的,这是一种人为的分类方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打破了人为分类的框框,而按照自然属性分类。在药物分类上,先是矿物,再是植物,后是动物。每部分中,先简单,后复杂,体现了自然界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全书有矿物性药物276种,植物性药物1094种,动物性药物445种,保存了我国古代矿物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大量的可贵的研究资料。在欧洲,公认的植物分类学创始人、瑞典科学家林耐的名著《自然系统》出版于1753年,被称颂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而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比《自然系统》的出版还早175年。

《本草纲目》这部巨著写成之后,李时珍自己无力刊行。当时蕲州有几家大乡绅出钱刻书,但他们对《本草纲目》这部书,态度很冷淡。李时珍不得不带着书稿跑到南京。那时候南京是出版业的中心,他在那里也没有找到愿意刊行这部书的书坊。

书没有刻成,李时珍却利用这个机会在南京继续做了收集和研究药物的工作。他不仅看到国内的一些新药,还看到过去郑和下西洋时带回的保存下来的一些外国药品和外国花木。后来这些都成为他充实《本草纲目》的材料。

到了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也就是《本草纲目》成书12年之后,南京士人胡承龙读了《本草纲目》的手抄本,认为这是一部好书,才愿意出钱刻印。这时李时珍已经73岁,正在病中。到了1596年全书刻成出版时,他去世已经三年了。他的儿子李建元遵照他的遗愿把印好的《本草纲目》献给明神宗朱翊钧,希望这部书能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广泛流传,以此“寿国以寿万民”,朱翊钧只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几个字,就把书藏之高阁了。

但是,《本草纲目》初版刊行以后,在医药界和民间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国内辗转翻刻和翻印了50多次。初版出版后不到10年就传到日本,1637年到1796年,在日本就翻印了9次,其间和以后又两次被译成日文。后来又传到朝鲜。在欧洲,最先译成拉丁文本,书名叫《中国植物志》,1659年在维也纳出版;1735年摘要译成法文本;以后又相继译成俄文本、德文本和英文本,受到东西方许多国家学术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 大陆海外学子拜谒台北胡适墓

叶维力

应台湾有关方面的邀请,美国耶鲁大学两岸学会的一批大陆留学生,今年6月初到台湾访问。访问期间我们有幸拜谒了胡适先生墓,参观了胡先生生前最后几年居住的房子。

胡适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后人褒贬不一,但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则是无人予以否定的。

以胡适名字命名的胡适公园,座落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对面的小山上。适之先生暨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墓即建在园内。胡先生出生在皖南青山绿水之中的绩溪县,大半生往来奔波于大江上下,大洋内外。如今长眠于亚热带花草植物的怀抱里,得其所乎?

胡先生的墓朴素无华,引人注目之处是刻在花岗石墓碑上的全部用白话文字写成的墓铭。文字一如胡先生本人,浅显明白。将胡先生一生的主要事业,娓娓道来。言辞平缓舒缓,没有政治八股味道。这在60年代初期的台湾,恐怕也是难得的。我无法将铭文照录于兹,但我可以告诉读者,那铭文前的一行大字是:“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胡先生一生倡导白话文,身体力行。这刻进石头里的白话墓铭,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属于胡适的。

胡适台湾故居在“中研究”院内。在这里胡先生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四年。

房内有两间卧室,先生生前和夫人各居一间,另有一个书房和一个客厅,家俱陈设十分简单。

现在紧连着胡适故居,有一间展览室,陈列有胡先生部分遗物、遗照和手稿。由于笔者的研究课题涉及胡先生的个人生活,因此对这方面的材料尤其感兴趣。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封胡适于1915年11月,写给B. C. Williams(有译为韦莲司小姐的)的信件。此时胡适刚由阿色佳(Ithaca,康乃尔大学所在地)转学到纽约不久,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哲

学。Williams(威莲司)是胡适在1914年间结识的女友。她父亲是康乃尔大学地质系的教授,她本人专修现代美术,一个人在纽约居住。韦莲司是个生活上不拘小节,思想上自由开放,行为上特立独行的奇女子。她剪个短发,不事修饰,走在纽约街头十分显眼。她兴趣广泛,文学、艺术、哲学、政治无不涉猎,对东方文化也有研究。

胡适在认识韦莲司之前,已在美国生活了三年半。在康乃尔大学的校园里,胡适是个活跃分子。他积极参与各种学生社团活动,结交了不少中外朋友,但其中并无女子。

1914年5月的一天,胡适第一次访问了女生宿舍。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对此做了简短的记载。研究胡适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胡适造访的正是韦莲司小姐。此后,胡适与韦莲司来往频繁,在韦莲司去纽约学美术后,两人则书信不断。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光是胡适就给韦莲司写了一百多封信,其中一部分是在胡适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两人同在纽约期间写的。

到底胡适和韦莲司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研究胡适学者的兴趣。在笔者看来,无论韦莲司仅仅是胡适的朋友,抑或是朋友兼情人,她都是一个对胡适各方面影响至深的人,其中有思想上的,精神上的,性情上的,品味上的,同时也有感情上的。她对胡适追求独立人格,倡导女子解放,尤其有关键性的影响。总而言之,说她是胡适留美期间众多朋友中的第一人,绝不过分。胡适自己曾坦诚地说过,如果想要了解他留美时的真实思想和感情,要从他给韦莲司的一百多封信中去找。

据说,在胡适去世后,韦莲司女士将多年来保存



完好的胡适给她的信件全部交给了胡的遗孀江冬秀女士，而这些信件到目前为止尚未公布于世。眼前的这封胡适于1915年11月写给韦莲司的信，不知是否是其中的一件？

这封信给“Dear miss williams”亲爱的韦莲司小姐的信不长。信里胡适详细地解释了什么是中国道家的“八仙”。尤其有意思的是，胡适画出了每位仙人所持之物。没有想到，胡适不但英文文笔流畅，字迹优美，并且画也画得维妙维肖。无论是蓝采和的篮子，韩湘子的笛子，还是吕洞宾的宝剑，画得都栩栩如生。看来胡适颇有绘画才能。当然他对韦莲司的一片情意也在不言之中了。

与胡适1915年信件并列的，是40年后的1955年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此时，胡适与夫人正客居美国纽约，而终生未婚的韦莲司已回到了她的“老家”琦色佳。韦莲司在信中谈天气，谈身体，也谈到了自己的心情。语调亲切，随便，字里行间流露出老友间的信赖和默契。韦莲司称呼胡适为“Dear Hushih”（亲爱的胡适），在信的开端特别要胡适将此信读给她的夫人听。（Please share with your wife）胡夫人的中文仅是粗通，英文程度更可想而知。韦莲司这样写，表现出她的细心和得体。

在这两封信的上方，是一张难得一见的照片。这是1953年韦莲司邀请胡适夫妇访问琦色佳时三人同照的。这时的胡适、江冬秀和韦莲司大约都是六十出头的年纪。三人满面笑容，看来十他融洽。笔者从未见过韦莲司的照片。这次得以一览风采，满足了多年的好奇心。韦莲司身材中常，并不显老，看来端庄大方，开朗自信，可知她当年一定是个出色的人物。

不知是在何时，韦莲司曾送给江冬秀一枚陶针。这只朴素大方的椭圆形别针陈列在一个橱窗内。笔者注意到，在两个重要的场合，胡夫人都配带着这枚陶针。一次是在“中研院”同仁欢迎胡夫人由美抵台的会上（胡适先行返台），另一次是胡夫人去医院探访病中的胡适。这枚陶针似乎为胡夫人所偏爱。但到底为什么，则有些费解。

在展览的实物和图片中也看到了胡夫人年轻时的照片。她坐在椅上，膝前站着儿子祖望、思杜，怀里抱着女儿素斐。看着这位以小脚而出名的胡适太太，一位同去的友人评论说一望即知她是乡下人。是乡下人不假，但江冬秀当年却也长得干净俊秀。从这点来讲，胡适母亲的眼力还是不错的。

江冬秀本无文化，又裹小脚，这是胡适对这

门婚事消极抵制的原因，也是他到了美国后，与韦莲司交往的重要背景。后来在胡适的督促下，江冬秀放了脚，并开始学习文化。1917年胡适返国后，终于和等待了他多年的江女士成婚，了却了胡适母亲的一桩大心事。

在展览室中看到江冬秀写给胡适的两封信，都写于胡适先行返台就任“中研院”院长之职，江冬秀只身留在美国期间。从信上看，胡夫人对胡先生独自生活很不放心，从饮食起居，不厌其烦，一一叮嘱。老夫老妻的情义，跃然纸上。江冬秀虽然没有专门读过书，但字迹工整，笔划清楚。虽偶有错别字，但无伤大雅。看来胡夫人也是个内秀之人。据说她闲来无事，喜欢翻翻通俗小说。因此在胡适书架上洋书与线装书之间，也杂有武侠小说之类的书籍，供夫人消遣。胡适提倡个人写自传，逢入便作宣传。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50年代在纽约曾看过，江冬秀写的自传认为写得朴素实在，是难得的历史记录。但胡夫人后来把自己写的东西收回去，亲手销毁了。唐先生现在后悔不已，认为当时不该听“胡师母”的话，连草稿都没有留下一份。

对于研究胡适的人来说，胡适和韦莲司彼此的信件，江冬秀写给胡适的信及他们三人的照片，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次得以在台北胡适故居展览室看到，可以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重要历史人物的个人生活，特别是男女关系，一向不大为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所重视。这其中有为尊者讳的缘故。像胡适这样生于新旧交替、中西文化冲撞、历史大变革中的一代人，他们在个人生活中的追求和矛盾，既是时代性的和超越个人的，又能反映出具体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台北胡适故居展览室能将胡适个人生活这一面有所展示，虽然只是点到为止，已经十分难得。

## 同根 多吉



“样板戏”，一度家喻户晓，人人哼唱，可是您知道“四人帮”一伙利用“样板戏”所搞的阴谋诡计吗？您知道有关“样板戏”的各种轶闻内幕吗？本文作者是权威的知情人，他将告诉您想了解的秘闻。



江青最为得意的一张照片。

### （一）交响乐伴奏《红灯记》

1968年，经过中央乐团和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的多项实验与修改，交响乐伴奏《红灯记》就要彩排了。

9月1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叶群、温玉成、刘贵权一行人，浩浩荡荡，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了这一所谓中西合璧的创作。

江青看戏时很高兴，边看边与身边的剧组人员对着台上指指点点。

戏终的时候，全体领导人员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一同高唱了那首法定的剧终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照常规，这说明戏成功了，大家对这台戏是肯定的。但是江青不。

她要大家留下来，劈头就说：

“你们有私字！你们个人要表现自己，不顾集体。……公与私，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公哪来的私？一个共产党员、

# 戏台女皇梦

## 样板戏秘闻实录

● 晓高



一个革命者、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应当是公，首先应当是集体，把自己往下放一放，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鬼事情了！”

大家听得没头没脑，不知出了什么事。

江青呷口茶，换了一种讥讽的腔调：

“乐队的同志都有前途。乐器，是金属、塑料、木头，你们用这样的声音来抢肉嗓子？喉咙是肉的，都抢，怎么能抢得过你们呢？你们这也想表现、那也想表现，这是修正主义！……哼！就是资产阶级初期的经典作品，也不是你们这样。你们今天完全是喧宾夺主了！”

这一回，大家听明白了。

原来，江青是嫌交响乐伴奏的巨大声响压掉了京剧的唱。可交响乐就是要“交响”嘛，每件乐器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打击乐，也得溶和进去。这怎么能怪演奏员们“自私”呢？何况，京剧之所以以唱为主，正是因为它

有既能衬托又能突出唱的伴奏乐器；而采用交响乐伴奏，很难免不同京剧的唱段争声音。

见乐队的演奏员们低着头，江青提高了说话的调门：

“我是听唱来了，你们这几个大喇叭、钹，到天安门广场还可以，小礼堂几百个人听，受不了！演员唱什么都听不见，说什么更听不见，……我今天粗暴了，把你们那个大喇叭、钹拿掉了。我不想泄你们的气，有些意见，我记下来了，你们必须改，改不好不能上演。”

见江青的火气丝毫没有收敛之意，周恩来插进话来，给剧组打气。他说：

“看了你们的戏，虽然有些意见，但这是新创作、新东西，新东西总是粗糙的嘛。”

他停了停，不忙不慌地喝茶，“没有一个新作品一开始就是写好了的。不论是文艺作品，还是政治作品，一开始都粗糙。毛主席对自己的文章都要修改好多次，何况是毛主席的战士，毛主席的学生？”

周恩来微笑着望着大家，轻轻地点着头说：“所以，我们还是很高兴，听到交响音乐来伴奏京剧，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江青同志搞了八个样板戏，今天这又是一个样板。”

江青尖叫着打断周恩来：“不行！改不好不能成样板！”她说话的态度十分坚定。

“改好了又是一个样板！”周恩来同样地坚定。

当着公众，周恩来很少有这样与江青针锋相对。他没理会江青的插话，继续鼓励大家：

“这是你们的新创造。第一次难免有缺点，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是高兴的。大家不要泄气，试验总是要进行许多次嘛。”

老谋深算的康生一直坐在一旁冷眼相观，这时，他认为很有必要挺身而出，为江青打圆场了。他接过话来说：

“这是第一次嘛，总的说是有希望的。当然





# 戏台女皇梦

## ——样板戏秘闻实录

啦，东西粗得很，但西洋乐器与中国打击乐、民族乐器京剧唱腔结合起来，不是很容易的，不能因为它粗糙，看它有缺点，就否定它。江青同志是严格要求你们，鞭策你们。大家还要满怀信心，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江青同志亲切关怀下，创造我们自己的音乐。”

……

“接见”完毕，已是深夜。

第二天晚上，江青又通知再次“接见”这个剧组。

人们心里七上八下地坐在会议室里等待，没有一个人讲话，今天可没有总理在场了，难道江青同志要把昨天没教训够的话，吐个干净？

9时半钟，江青身披风衣、头戴军帽，由温玉成、刘贤权陪同，前呼后拥而至。

一进门，江青就兴冲冲地高声叫道：“今天上午10点起来后，我给主席讲了昨晚的事。主席说啦，还是不能泼冷水，应该从积极的方面想办法，把它改好。”

大家暗暗松口气。

江青坐在正中的一个沙发上，一改前一晚的刁蛮：

“咱们一场一场地过吧，我说的不对，请同志们提意见。现在，就从前奏曲开始。”

她翻开笔记本，把它放在翘起的二郎腿上。

“我看，”江青的两只手都比划着，“前奏曲去掉大号、吊钹也解决不了问题。前奏应该简洁，它说明全局，现在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江青的情绪突然兴奋起来，她手舞足蹈着：

“应该是写在敌人铁蹄之下，我们的英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敌人进行斗争，突出这个主题。你们现在的前奏曲起到这个作用没有？起码现在还不鲜明，基调不行！前奏曲要很清楚，要有军歌贯穿全局，再与京剧揉合在一起。”

江青清了清嗓子，“一开始就要有‘向前，向前，向前……’”她以纯正的音调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

……

这一天，江青十分耐心、和气，指示了音乐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接见”一直从晚9点半开到翌日凌晨5点半。整整8个小时，江青一直没有停口。她的精力实在惊人。

是什么力量维持着这个本是一身病痛的女人呢——权力。

她通过“样板戏”找到了通往政治权力至高点的最便捷的通道；同时，江青也通过“样板戏”与修改、编排这些戏的过程，贯彻了自己很多的政治意图，所有这些，无疑成了她通往权力终极的助推器。

所以，每次以改戏为名的座谈会，绝非只谈戏。正如江青自己所说的那样，“八个样板戏，都是‘斗、批、改’”一样，文艺界“文革”运动中，应该批谁、斗谁、解放谁、打倒谁，谁是叛徒、谁是特务，对谁要如何处置……等等，全都贯穿于谈改戏之中。特别对于《红灯记》来说，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内容，占

去了谈戏、改戏的大部分时间，那就是江青的自我吹嘘。

一出《红灯记》改下来，江青几乎讲全了自己从幼年到“文革”时期的所有“革命故事”。

在责怪演员们懒惰，基本功不过硬时，江青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你们太不刻苦啦！我只上过一年中专，一年啊！因为当时女生少，还因为有一个远房叔叔认识校长，走了后门，我才入校。在学校，可是受了气啦！因为家里贫苦，我穿不上制服，穿不上好衣服。可我那时天不亮就到西城喊嗓子，……你们？你们现在可好，9点钟才练功，一会儿就练完了，太懒惰啦！”

1968年9月17日这天，当着许多中央领导的面，她大肆吹嘘自己的过去。

“唉！”她长叹一声。

“《红灯记》我都改过几十次了，还是不行，你们不刻苦。我17岁时，日寇侵略教育了我，我拿起文艺这个武器，反对敌人。你们现在条件好，又没人逮捕你们，你们还不好好为工农兵服务？”

“你！”她指着刘长瑜：“铁梅回家那场，你完全不懂，傻瓜！应该这样——”

江青提高八度调门，尖着小嗓声气地示范：“爹爹——，奶奶——。这么一念，观众马上眼泪就下来了，我就是这么流泪的。”

“还有你！”她转对钱浩梁。

“文革”运动中，李少春被打成“反动权威”早被剥夺了演李玉和的权利。B角演员钱浩梁接替了他。江青颇为赏识这位武小生行当的年轻演员。因为他年

轻、资历浅、好调教，他也比李少春听话，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他发脾气。

江青对着钱浩梁：

“我给你设计的碎步你不懂，那已经形成了语汇了。坐过老虎凳的人，腿部有伤，应该一条腿走，一条腿提起来。你，为什么不练？”

“我，我没理解。”钱浩梁紧张地回答。

“你已经算是老艺人了，还这个样子？真让我生气！我气！我要训子！”江青梗着脖子，高声叫道。

全场上的响起了一片掌声。

钱浩梁站在人群之中，有些尴尬，更感到受宠若惊。他以虚心请教的方式与借口，给自己找台阶下：

“是脊梁对着观众，还是面对着观众？”钱浩梁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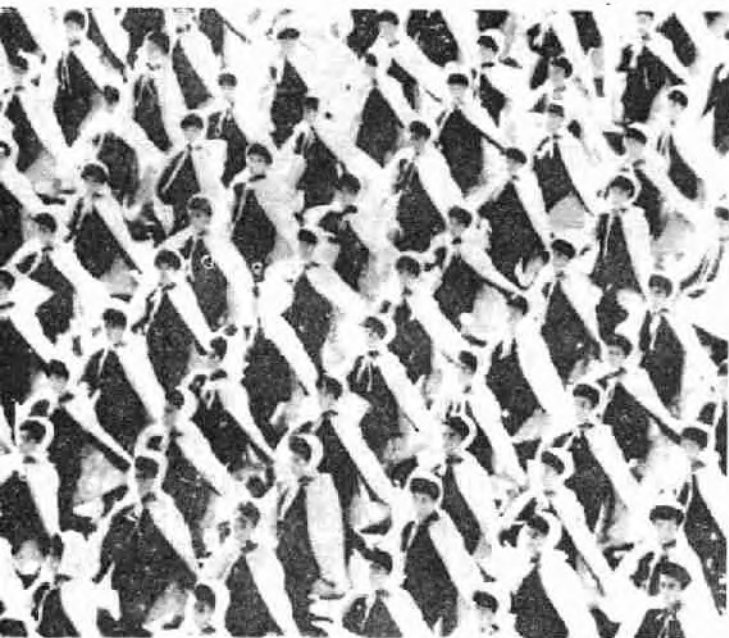
“脊梁对着观众”，江青说，“唱完了导板，从下场门上，背对着观众退出来。腿要好看，退到舞台中间，转过身来，面对观众亮相，表示他的腿是受了伤的。这样就漂亮多了。”

江青站起来示范，边走边步边说：“用碎步的语言表现他受过刑，又表示疼也要站起来，又有优美的舞蹈姿势。”

江青停住动作，两手插在腰上，对钱浩梁



●江青与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在一起



●70年代国庆游行中的“样板戏”方队。

说：“要讲究亮相，瞧你现在出场的那副样子，斜着身子大步出来了，好像没受过刑。”

钱浩梁小声嘟囔了一句：

“脚上有铁链子——”

江青立即打断他的话：

“可以用塑料的嘛！哼，主要是你的思想。”

“下面的动作是亮相，亮完相，再唱那一句‘我看到……’”江青细致地给钱浩梁提着要求，“还可以拖两拍，来回走，表示看的很远，看到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一定要胜利！一个共产党员就义前要想的很远——咳！我就有两次为红旗落泪啊！”

江青提起自己的过去，语气就和缓多了。

“我在上海有一次接关系，坐车过白渡桥，看见楼上有红旗，我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我怕别人看见，赶快扭过脸去。还有一次，他们要绑架我，两个人绑架我，就好像我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孙猴子。几条枪对着我呀！可他们没有人证物证，我跟他们斗了一夜，才迷糊了一下。我还是想到那面红旗，我相信革命一定胜利。你们知道吗，要是没有我的斗争生活和艺术实践，就没有《红灯记》这个戏。阿甲他

让你们唱什么‘热泪涟涟’，什么玩艺儿？哪有共产党员赴刑场时热泪涟涟的？还是浩梁接受了我的意见，才改成‘斗志更坚’。……还有那句‘东奔西藏’，那是‘搜孤救孤’来了。一个共产党员如何能那样？——我就不藏，敌人捉我，我就上大街，往马路上跑。”

第三场《粥棚》，是江青最喜欢的一场戏。她通过这个简单的过场，揉进了自己历史上许多她认为是很光彩的东西。这种念头，大概从她推荐这部戏起，就抱定了。所以，当张东川、阿甲要去掉这场戏时，才令江青发了那么大的脾气。

江青对创作人员宣布，一定要用一切艺术手段，写出第三场的历史背景。

第三场的历史背景。

“要写地下武装，磨刀人是一个地下武装人员。李玉和在群众中是很有威信和群众领袖。钱浩梁，你没有和工人同吃同住的经验，所以总是刻画不好李玉和的内心世界。你应该和工人同吃同住一段时间……”

江青越说越来了劲。

“——解放前，我在纱厂工作，在夜校当教师。当时我神经衰弱，每天夜里都要改卷子到深夜。我住在一间亭子间里，每天早上工人从楼上下来，都要经过我的房子。她们怕吵醒我，都脱了鞋光脚下楼梯。她们很爱护我，我和她们的感情也很融洽。你们是缺乏这种感情的，你们没有生活。”江青得意地笑笑，“现在，你们能理解了吧？工人阶级的感情就是这样的。”

江青还对《红灯记》剧组人员讲过自己“蹲监狱”的故事。

“——我在上海也被捕过。没有我那段经历，就不会有《红灯记》这个戏。”

“我是被绑架的。他们叫黑牌汽车在兆丰



# 戏台女霸王林夕

## 样板戏秘闻实录

公园附近等，然后把我带走。我知道他们手中没有什么证据，我就闹，大闹。我说，你们把我的名誉搞坏了，我要上诉你们。”

“在狱牢里，我晚上闭起眼睛，就想到苏联领事馆那面红旗，我想红旗一定会在全国插遍的。”

“蹲过监狱的人都知道，那是要靠坚强的毅力的。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在上海女青年会工作。很多人在被捕后牺牲了；有的坚决斗争，挺住了；有的叛变了；也有的消极下去了。”

“我为了不出漏洞，得天天背供词。供词要自己编，哪些是能说的，哪些是不能说的，哪些是要隐藏起来的，所以最后审讯时，我的姿态特别高，比他们都高……”

“所以”，江青带着全剧组跟着她迢迢忆旧的思路转了一个大圈之后，又回到戏中来。“‘赴宴斗鸠山’一场不能太多露。这场戏是写气节的，写革命的气节的。一定要写斗智，用智慧和敌人斗。《粥棚》一场也有斗智，敌人很狡猾，但我们要比他们更高明。可是，这一场你们的音乐太欢快，这是配器的问题，要改。”

江青突然装出一脸的诚恳样子。

“我昨天发了脾气，你们想想，我能不发脾气吗？乐队抢声乐，这么抢，我怎么请主席和林副主席看呀？请了他们看这样的东西，我要吃批评。主席批评起来，可凶啦！”

江青做出一副痛苦样，两只手不停地比划着。

突然，她的思维又跳跃到另一根弦上，直楞楞地冒出一句与刚才的话毫不着边的主题。

“我学过三个月的钢琴，贺绿汀说我们不认识‘豆芽菜’，其实我是认识的，现在忘了。八个样板戏是我的副产品，我的主要工作不是这方面。”

江青讲着讲着，突然把《沙家浜》也扯进来。

“中央乐团这次把《沙家浜》搞成什么样子了？太混帐了！你们上了戚本禹的贼船。戚本禹可是个坏透了的人，他们合着伙地整我。

我有两次差点儿死在他的手里。

“戚本禹去年春天和杨成武一道整我的黑材料，我才不怕呢！我倒是有个‘红材料’，那是我1937年在《大公报》上的文章。我说我坚决不做第二个阮玲玉。”

“所以说，敌人是狡猾、阴险的，你们第六场现在改得还可以了，突出了这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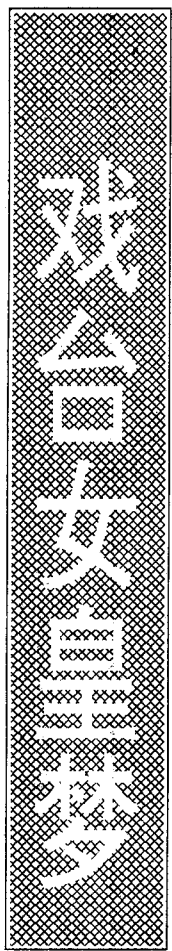
“同志们”，江青在最后进行总结了。“我们用西洋乐器伴奏，这是革命。搞西洋乐器的，都是贵族，今天我把你们拉来伴奏京剧，他们一定要骂，我们就更应该搞好，以后还可以再搞别的。”

### （二）颐指气使，江青 妄评《智取威虎山》

1969年，江青决定，八个“样板戏”都要拍成电影。而且每部戏都要拍两种，一种是纪录片、一种是艺术片。她精心选择制片厂和导演、摄影师。

八部戏并没有同时开机拍摄，江青提出，“样板戏”拍片的原则是：“成熟一个拍一个。”尚未达到拍电影水平的戏，一边在舞台上演出，一边修改。

在江青看来，最成熟的戏，莫过于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了。这个戏1958年就开始排演，已经有了十年的修改基础，又有张春桥这样的人直接掌



## 样板戏秘闻实录

管，如虎添翼，江青是比较放心的。

1967年，毛泽东第二次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并亲自修改了两句唱词。

1969年初，《智取威虎山》剧组被邀来北京接受审查，通过后即留在北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与1964年相比，演员阵容已经大改大换：董祥苓饰杨子荣、沈金波饰少剑波、齐淑芳饰小常宝。

2月27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的二楼小礼堂，中央首长们严肃地审看了“文革”期间又

杨子荣出场了。

“杨子荣的帽子太难看了，往后面戴了不说，两边还搭拉下来。”……

第二场，李勇奇出场。

“李勇奇喊妈不要带哭声，不要吼。应该一声比一声强：“妈……妈……妈！”江青在台下比划着大声喊起来。

第三场的小常宝，也没逃过江青那张刻薄的嘴：“帽子又那么难看。那么蓬蓬着，毛向左右蓬松搭拉，这是谁搞的嘛？！”……

第四场几个军人刚一出场，江青就立刻喊到：“领章不红”……

负责《智取威虎山》剧的于会泳坐在一边有些不安了。他在江青身边不住地咕哝：“请首长批评，我们改进……请首长批评，我们改进。”

“嗯，现在的器乐编作的不错。”江青点着头。

台上，杨子荣在常猎户家“访贫问苦”，激昂地唱道：

消灭座山雕，  
人民得解放，  
翻身做主人，  
深山见太阳。

音乐也跟着深情、激昂起来。江青歪起头凝神仔细听。

“这里有个小过门，你们搞了‘东方红’曲调吧？”

“是。”于会泳赶忙回答。

“好！”

江青听着戏，突然问道：“董祥苓的嗓子怎么哑了？”

“累了。”于会泳回答。

张春桥坐在江青另一边，插话说：“也有些紧张。”

江青没有理会他们：“打击乐太响、太响，压过唱的声音了。”

“已经叫他们往后移了。”于会泳补充道。

“那是乐池有问题，不要这样响。”江青有些火了。她看看于会泳紧张的样子，笑了一下，

几经修改的这出京戏。

在这次审看的过程中，江青的嘴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位“新贵”，民族音乐系教师于会泳。他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因为为几部“样板戏”谱曲、配器，颇得江青赏识。台上这部《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就是这位“新贵”改编的杰作，江青十分满意。她让于会泳坐在她身边，随时回答她提出的各种问题。

“打击乐队坐在哪？在台下吗？”

“不，在台上。”

“怎么那么响？把靠乐队的那个话筒拿掉。”

台上，少剑波出场。

“少剑波的帽子不好，往后戴得太多了，帽子太大。”……

缓和了些口气：“再这样，我要把它砍去了。”

“不，不，我们能把它搞好。”砍掉打击乐怎么行？音乐配器都是成龙配套的，于会泳心里真着急。

江青很有风度地笑笑，“嗯”了一声，体量地说：“那就轻点儿。”

在议论打击乐的时候，江青最感兴趣、最关心的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段“马舞”演过去了，江青没看仔细，满脸的不高兴。

对杨子荣这段“马舞”，她不知提过多少次意见。

江青很喜欢骑马，早在延安时就学会骑马。江青曾对《红灯记》剧组回忆过她第一次骑上马背时的情形。那是她责怪演员们练功不刻苦的自我夸耀。她对钱浩梁说：



“我不会骑马。第一次骑上马背，马不走，我用棍子打了一下，马拼命地跑起来。我那时年轻，还会掌握点平衡，跑了两个小时，马才停下，我浑身象碎了一样。可我下来，还是跟大家握手，像没事一样。你练功也要有这种精神。”

一提起骑马，江青就来精神。在她心爱的“样板戏”中，又有一段骑马的舞蹈，她兴趣

倍增。她看了几次童祥苓在“打虎上山”一场中的“马舞”，摇着头直嚷嚷：

“很糟糕，很糟糕！我是有生活的。要从生活出发，要设计得很美。马头很高，可你腿抬的太低了。你再做一遍。”

童祥苓又做了几个“马舞”动作。

“不行，你跳的不稳。”

江青离开坐位，拉开架势，给童祥苓做了几个示范。江青一身精瘦，动作做得挺漂亮，但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了，能跳得稳？大家恭敬地看着，没人出声。

江青喘着气回到坐位，大讲了骑马的要领与感觉。

“记住，要从生活出发，从生活中提炼。可惜我的马拉回去了，天冷啦，怕冻。不然，让

你们骑骑马，感觉就有啦！应该弄匹马给你们试试。不过，也可以叫你们看看骑马的电影。”

康生插嘴说，有部西方电影，整个片子都是骑马的。可以调出来看。

张春桥赶紧凑上来说：“杨子荣一出场就是策马奔驰，没有上马动作，祥苓要好好向江青同志学。”

江青谈起骑马，收不住话题，喋

喋不休地讲下去。康生配合着江青，在纸上画了个马蹬子，给大家看，要大家领会江青所讲的上马动作。

江青说：“在雪地上骑马，雪深路滑，所以劈叉的动作是必须的。”她采纳了康生的建议，马上从中影公司调来有关骑马的西方影片，送剧组观看、学习。

“今天，本想好好看看剧组把‘马舞’改

得怎么个样子了，光顾说打击乐没看清。”江青正要找茬子发一通急火，于会泳在一旁早已看在眼里，没等江青发作，赶忙说：

“是不是演出后请江青同志再单独看看‘马舞’？许多问题我们还需要请教。”

江青顺了这口气。整场演出没再挑什么大毛病，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演员的服装、鞋帽上了，几乎出场的每一个角色的衣、帽、裤、靴、腰带、补丁、全都批评到了。

“杨子荣的围巾要用个别针别住。围巾的颜色不够亮。要浅驼色或淡咖啡色，这一条偏紫，马上换！”……

“哎，这个帽子，不好！我看也不要穿马靴了，看这副样子多窝囊，还是穿原来的吧，改回来，改回来！”……

“腰带不行，扎得太往下了，再加上那顶大帽子，你们看看杨子荣成了什么？上身高、下身短，头重脚轻，这可不行！”……

下一场，杨子荣马上换上了江青要求的驼色围巾。江青摇着头，对于会泳说：“如果不夺险的话，围巾还是换成白颜色的吧……”

台上，深入虎穴的杨子荣要给土匪头子座山雕“献图”了。

于会泳赶紧凑到江青耳边说：“过去，杨子荣是俯首打躬地献图，现在我们改成了舞台上这个样子，您看看怎么样？”

江青的鼻子哼了哼：“这个事我不知道和他们磨了多少次。后来这里没有唱，是我硬叫他们加的；接图也是我出的点子。”

于会泳讨了个没趣儿，陪笑称是。

新的一场拉开帷幕。

“嗯，杨子荣换了条领带，好点了。”江青转移了注意力，“现在大衣的毛太累赘了，毛太花。是塑料的吗？……哟，人造毛？不行，还是要小羊毛的，卷的。领子也太宽了，像女人的大衣一样。”

张春桥在一边应和：“是呀，台上四个人的大衣，就数杨子荣的那件难看。”

江青对着台上指点着：

“李勇奇上衣穿黑的也不好，要穿灰的或

藏青色的。他和李田的衣服都很难看，我说过要刻意塑造无产阶级的形象，让他们的衣服破也要破得好看。……在群众中要有一个女的穿绿色上衣，让穿蓝衣的那人改穿绿的，这样，小常宝穿红就显出来了。”……

“啊呀！你们看看，少剑波的靴子有多窝囊！那个申德华的帽子真丑！……衣服、帽子都要重新安排，你看，你看，杨子荣这段‘除夕夜’真是‘大帽子一扣’啊！哈哈……”

演出完毕，她回到休息室，剧组领导与演员也被请来听意见。江青手拿自己头上常戴的那顶皮帽子，迫不及待地谈起帽子问题，指示帽子应怎样设计。

“像我的帽子这样，两边要直的。我这项帽子比你们的好，边儿不能往外蓬出去。”

张春桥在一旁笑道：“我们今天看戏的时候，一直在议论帽子。”

江青没有笑意，拉长着脸，她指着童祥苓：“你，像顶了一口锅！”

她对剧组领导说：“要像我的帽子那样，还可以把毛搞得短些。前面的那一块皮是方的，而你们的是圆的。我的帽子就不像大帽子，不信让童祥苓戴上看看。”

“童祥苓，你戴戴！”江青叫过童祥苓，把自己的皮帽扣在他的头上，然后歪着头欣赏了一下。

“于会泳，你也戴戴，大家研究嘛。”

于会泳接过江青的帽子，试了试。

“嗯，毛可以再短些。”江青叹道。

对京戏一窍不通，很少发表意见的姚文元见大家都在谈穿戴，也可插上几句嘴。他指指童祥苓，说道：

“不要把脸压下去，帽子要往上戴戴。你的腰带，也扎得太靠下，往下扎了就会显得上身太长，不美。”

大家又由此议论起腰带问题。最后，大衣、靴子、皮带、围巾，没有一件不被指责。

江青尤其对大衣的皮毛不满。剧组向她介绍说，上海的工人很支持“样板戏”，仅皮毛一项，就做了18种样品供剧组选择。江青听

了哈哈大笑，满意地点着头说：

“好！那就选一种毛短、带卷的吧！”

周恩来只对几处唱腔和舞蹈动作提了意见，没有参与服装鞋帽的讨论。

说到唱腔，这倒提醒了江青。她就势提出一句关键唱词——杨子荣“迎来春色换人间”一句，其中的“色”字，就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御笔，要告诉演员，演唱时，一定要吐清楚这个字。

江青高声叫着：“康老查了这个字，‘色’字音在‘十三辙’中念‘塞’音。哼，资产阶级权威总是在这些地方敲我们。以为我们不懂，不知道。可是，你们没唱出来这个字，下没下功夫我不知道，反正我听不到这个字。要好好研究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还有”，江青最后又正色道：“董祥苓，你怎么有点驼背？要挺直！沈金波，你也有驼的味儿。”

江青最忌讳驼背，尤其是在舞台上，在她所树立的英雄形象上，她不止一次地训斥演员。演李玉和的钱浩梁、演郭建光的谭元寿，还有几个女演员，为驼背问题不知被她教训过多少次。江青十分注意英雄人物的形象，她多次指示，演兵的人一定要年轻、英俊、腰板挺直，“不能要老头子”。电影摄制组拍英雄人物时，也一定要加柔光镜，予以美化。

江青的忌讳很多。她对相貌丑陋、或是看不顺眼的人，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极度厌恶。她常常以貌取人、度人。

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江青发现了中国京剧团的一位演员兼导演，她立刻感觉全身不舒服。

会议结束后，文化组的成员被留下来。江青气呼呼地问：

“那人是哪里的？怎么那个样子？”

“×××，京剧团的创作人员。”

“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文化组的几位成员感觉莫名其妙，这个人什么问题也没有啊，首长为什么这样问？他们如实回答：

“没有，每次运动，他都没出过什么问题”

“不对，我看这个人长相不对，他一定有问题。你们去查一查看。”

大家对那位同志，本来是很熟悉的。有的与他甚至是多年的同事。但江青既然下了令，谁也不敢违命不去调查、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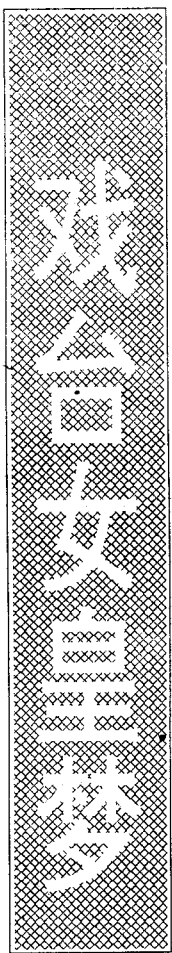
过了一段时间，中国京剧团又专门向江青汇报说，此人在京剧团工作多年，家庭出身和本人表现都比较好，没什么问题。



江青还是不偃。让再仔细去查，好像是非要查出些什么。可文化组查来查去，就是查不出问题，人家也没什么小辫子可抓。

于是，谁也不敢再向江青提起。每当江青接见，只能让那位同志回避。慢慢地，江青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才算躲过去。

又一次，江青在钓鱼台17楼召集“样板团”负责人开会，中央乐团军代表×××也到会。散会后，江青盘问于会泳：



## 样板戏秘闻实录

“中央乐团的那个军代表叫什么名?”

“×××。”

“从这个人的样子看,他恨我,你们去查一查他!”

……

江青还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就是为人改名字。

江青把信口随意改名,当成一种对人的恩惠。她喜欢怎么叫,这个人就该叫什么,要谁改,谁就得改,如同封建皇帝赐名赐姓一样。

早在1968年审改《红灯

记》时,江青就对殷承宗说:

“就凭你这个名字,我也要造你的反。你是想继承你那个祖宗啊!”

殷承宗笑着讨好说:“我改‘诚忠’吧?”

“可以,这样好!忠诚不二嘛。”江青即表赞成。

江青又喊过来钱浩梁,说:

“叫人家记住你钱浩梁?好家伙?多少笔划!去掉你那个‘钱’字吧。就叫‘浩亮’,‘浩’,浩大的浩;‘亮’,漂亮的亮。几年前我就想叫你这个名字了。”

钱浩梁傻乎乎地问:

“不要‘钱’了?”

“你还要‘钱’干什么?我就不要那个李了。”

“好!我坚决不要了。”钱浩梁响亮地回答。

“嗯,还有双重意思:一个是不要你祖宗的那个钱,一个是不要金钱。我们只要革命。”

从此以后,“浩亮”一名就叫响了,借着李玉和之光,大走了红运。

一次,江青给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戏,突然觉得饰演吴清华的B角演员宋琛琛名字太长。她对宋琛琛说:

“你的名字干脆改或宋琛算了,去掉一个琛。”

接着,她又转向一位叫张婉昭的女演员,说:“张婉昭,你就叫张昭吧,不然,你的名字要进宫廷了。”

不等人家同意,在排练的过程中,江青就已经喊着她起的新名字了。

“张昭基本功不错,可以排排连长……”

江青一边说戏,一边念叨:

“张婉昭的名字多旧呀,进了宫就成妃子了。唉,现在叫‘淑’的也太多了,好像没有‘淑’字,就不是女名了。”

### (三) 张春桥与《海港》

张春桥不懂京剧,但他懂政治。

京剧《海港》的修改,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上海市委几位领导亲自划定人物、编写台词、唱词,特别是从原作突出描写对下一代的阶级教育改为描写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主题之后,反面人物钱守维,就成了戏中的关键人物。这个人物到底要有多坏,他的政治性破坏目的到底有多明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仅靠剧组是不敢做主的。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在1969年夏天,在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召开《海港》创作修改会议,亲自出马召见剧组,给钱守维定调,市委副书记徐景贤也出席了这个座谈会。

张春桥天生一副冷面孔。但这一次,他一出场,便诙谐地说:

“钱守维搞了破坏,以前一直没处理,群众有意见。外国朋友也在问:‘为什么不处理这个坏人呀?’这个问题一直拖下来,结果,直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咱们才来商量处理这个坏家伙。”

大家果然笑起来。

徐景贤首先急着提出对《海港》最新修改稿的不满：

“钱守维撒玻璃纤维，用个纸袋，象撒胡椒面一样。”

张春桥不屑地冷笑一声，说：“那是小偷小摸。钱守维曾是美国主子的红人，他对‘亡国共产’十分痛恨，他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对我们有刻骨的仇恨。他的破坏性很大。”

“对！这种人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干出大坏事来。比如，炸掉一只船……，现在玻璃纤维的性质与炸船的性质是一样的。”徐景贤的态度与张春桥完全一致。

剧组汇报说，许多观众来信反映，玻璃纤维不会发生生命危险。

确实，大量说明玻璃纤维没有过大毒性的信件，从全国各地不断地寄给剧组和文化组，有些甚至直接寄给江青。许多来信还附上各种玻璃纤维样品、化学分析鉴定等等，证明它不能致命。

张春桥皱起眉头：“嗯，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一直没有解决。玻璃纤维如果混在小麦中，经过磨粉再吃，危险性就更小了。”

“改成农药吧。”剧组有人提议。

“不行！农药我们不出国，运往非洲不可能。”张春桥马上否定。

“那就改成砒霜。”又有人出主意。

徐景贤否定道：“砒霜太落俗套。只有玻璃纤维可以表现码头上各种货物来往，有码头特点，比放毒好，放毒成了小特务了。”

“这个问题，再研究吧，今天看来是解决不了了。”

张春桥把讨论引入实质性内容。他说：“现在的剧本，敌我矛盾没有写好，观众看了分不清楚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钱守维的毒辣给人印象不深，他搞破坏的目的也没说清楚，不能使人感到‘这个人坏’”。

张春桥翻翻笔记本：

“还有方海珍，她的语言像市委书记，不像个支部书记。这个意见，我1965年就提过，可你们一直没改好。现在的政治术语太多了，语录也太多了，多了就显不出来了。语录要恰如其分地合乎当时的情景，合乎人物身份也使用。”

“就是”徐景贤借机插进话来，“第四场短短一场戏，就用了五段毛主席语录。”

这种话，只有张春桥和他那批“新贵”们能说，别人是万万说不得的。阿甲作为《红灯记》的导演，说

了几句，就被当成靶子，打成“反革命”。还有人不同意在舞台上挂毛主席像，搞形式主义而落得“反对毛主席”之罪而不得翻身。

江青曾经说过：“样板戏只许我说不行，谁也不许说不行，谁说谁是破坏！”

但是，张春桥可以例外。更何况他也是真心为了给江青捧场，以求“样板戏”锦上添花呢。当然，江青肯定的东西，他不会否定；江青否定的东西，他也不敢肯定。他不过是在江青审查之前，尽可能地完善，使戏站得住罢了。

一次在北京某剧场审查一部戏，周恩来出席，陈毅也去了。看完戏，张春桥即对戏中的形式主义提出意见。陈毅当场就感慨地叹息：

“这话只能你讲，我讲就成右派喽！”

为给钱守维“创造”破坏的机会与条件，钱守维的职务由原来剧本中的“仓库保管员”改换成了“调度”。但有人提出质疑：对钱守维这样一个坏人，为什么共产党解放初期还要把他留下来，给以“调度”的重任？

张春桥很愿意解释政策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圆钱守维“升任”“调度”之说；另一方面，可以突出自己领导者的地位。他说：

“我们解放初期把旧人员都包下来，是主席的政策，不是刘少奇的政策。刘少奇是包庇坏人，我们是先搞清楚每个人的政治情况，然后按一技之长重用。所以，钱守维还是可以用的。有些大学教授、反动权威，我们不是也用了么？这一点在戏里不写，但自己要清楚，现在我们每个国家机关中，都有这样的人。”

徐景贤附和着张春桥说：

“钱守维就能留下，因为他有一技之长，在调度上，也能给安排得很好，但到了节骨眼上，就要捣乱。‘调度’是很重要的，铁路夺权就是先夺调度室的权，因为那里是心脏，是要害部门。所以，钱守维破坏的政治目的还是要讲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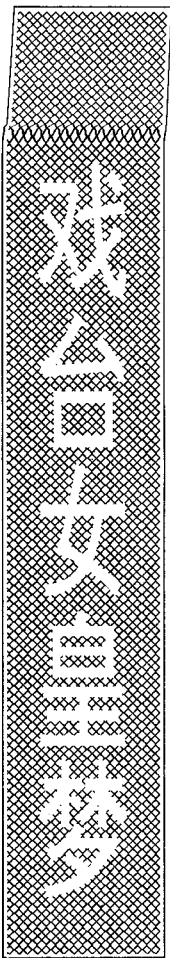
“但是，”张春桥接上去强调，“要找到观众一听就懂，而且能产生仇恨的事件。只有政治术语不行，要用情节。”

他翘起二郎腿，点燃一支香烟，若有所思地喷吐着烟雾，开始为剧组编构情节：

“可以设想美帝、苏修本答应运去粮食给非洲某个国家，后来又不给了，我们必须赶在一定时间之前送到……”

“也可以设想路途中某个地方，比如台湾海峡可能有一次台风，我们必须赶在台风之前通过，而那边

# 样板戏秘闻实录



又在急等着要……。这些条件都要说清楚，否则观众对钱守维的破坏计划、拖延时间等问题就恨不起来。达不到反映阶级斗争是激烈、复杂的效果。”

编剧组详细记录了张春桥的意见。虽然张春桥口口声声说剧本未来得急看，“尚未进入角色”，而实际，他是下了功夫的。这是他老谋深算、含而不露的性格特点。他甚至为《海港》一剧设计了许多具体细节：

“钱守维先是利用调度职权进行破坏，遭到抵制，然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遇到抵制，最后发泄一下，才放了玻璃纤维。玻璃纤维的事他是这样估计的：‘不大不小，你们也查不出来’。不然他是不会干的。”

张春桥要求剧组，按照这个原则改戏。

在谈到其它问题时，剧组汇报说，许多人给马洪亮拿杠棒打韩小强提意见，演出时，每到这里，台下也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喊声。

张春桥轻蔑地哼了一声，阴笑着说：“其实他们自己也搞武斗。我看打人这个问题一百年也解决不了。当然啦，如果将来观众实在通不过，我们也不能勉强，只好不打。将来改回来也容易，现在不要动了。”

张春桥随手翻动着来开会时才拿到的剧

本，一页，一页地掀过去。

“‘觉醒的人民望北京’‘那一句改掉没有？”张春桥问。

“还没有。”

“要去掉，这是个老问题了。‘仰望北京’要让人家非洲人自己讲，我们讲就不太谦虚。”

张春桥对每一个细节都掌握得很细，都能把握住一个“度”。

谈到五重奏伴唱《海港》，张春桥点着头说：“‘五重奏’有时蛮好，有时太响，有些压倒唱。‘五重奏’的伴奏有些烘托，听起来要比京剧好得多。剧团是很热情的，但无论如何是伴唱，这个关系要搞清，出发点要明确。演员不唱的时候，乐队还是要表现表现的，不让他们发挥长处也不行，大家都有一番激情要表现，你们可以多交换意见嘛……。”

这番道理比江青对交响乐伴奏产生效果的指责和缓得多。的确，张春桥与江青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物。

张春桥曾在上海文艺界搞了一次“清理队伍”运动，以筛选人员。一切以政治标准划线，愿意服贴地跟着他们走的，名曰：“下决心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则留下；否则，一概不给出路，不管你是多大的演员。

他大张旗鼓地斗倒了著名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借“周信芳是京剧界的‘南霸天’”之辞，在上海京剧界彻底肃清了周信芳的影响，把京剧界的威信、文艺界的威信、政治界的威信全部集于江青一人身上。

京剧《海港》经张春桥和上海市委的精心修改，1971年11月进京演出。25日晚上，江青在姚文元陪同下，到首都剧场审看。

江青在第一场与第二场幕间进入剧场。每场结束都带头鼓掌。同时，她拿个小本子，逐场认真地记。

剧团早已安排了专人，专门观察、记录江青看戏时的表情动作，何时鼓了掌、何时流了泪、何时在本子上记录、何时点了头、何时笑了、何时打拍子……事无巨细，一一记下。

演出结束后，江青、姚文元十分高兴，两



人跑到台上，与演员共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唱完歌，江青笑容满面，和全体演员逐一握手，高声地叫着：

“辛苦了！感谢你们，戏演得很好！”一副有风度、有教养的首长气派，同对北京几个“样板团”的不满时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态度完全判若两人。

在休息室，江青接见了《海港》剧组的军代表、编导、音乐、舞美人员以及主要演员。

“我看了《海港》的电视，你们大概也知道了。今天又看了演出。戏改得很好，很动人。我感动得流泪了。”

江青略改动了几处唱词。并指示说，戏是写国际主义的，从头到尾要用“国际歌”贯穿起来。

当然，江青看完戏也不可能没有一点意见，她抓住了南方人、特别是方言特殊的上海人的发音弱点。

“你们有一个缺点，口白不清楚。一个原因是因为原作写的台词没上韵，不上口；另一个是演员演得不清楚。”

江青举例说：

“比如，‘北欧船’的‘北欧’两个字，本来就难咬准，电视片里念得也不清楚。应该是这样：‘北——欧’，她耐心地示范。主演方海珍的李丽芳跟着她学了一遍。

“嗯，这样就好些。”

江青对剧组领导说：“口白问题，你们要重新摸一下。另外，花腔要减，太多的花腔，工农兵不好学。我们样板戏的唱腔，既要工农兵容易学，又要叫那些‘老行家’也觉得不错才行。”

剧组汇报说，正准备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朱琳教教大家道白。

“朱琳？”江青眼一瞪，“她不行！口白你们可以请教请教高玉倩，她的口白有功夫。”

#### （四）江青为“红灯记”点将

《红灯记》中的三位主演：钱浩梁、高玉倩、刘长瑜中，只有高玉倩受到江青的批评与责骂最少。高玉倩嗓音宏亮、道白清楚、角色把握贴切。江青几乎没有挑剔过她在唱功、做功、念功和表演方面的毛病。

可以这么说：李奶奶的形象，完全是高玉倩的创造。这并不是说其它演员没有创造过角色，而是他们的创造，大多被江青否定了，其角色设计已不知多少遍地被江青更换了原样，已经不是演员自身的创作了。

所以，对于高玉倩在艺术上的认可，江青嘴上不说，心里是十分满意的。

可是，在混乱的“文革”初期，高玉倩因“历史问题”，被剥夺了唱戏、练功、上舞台的权利，只能“劳动改造”天天摇煤球。

所谓的“历史问题”，无非是在解放以前，高玉倩嫌梨园界世道太黑，不愿再唱戏，想换个工作改个行。于是，她在朋友的帮助下，学习了两个月的英文打字，然后去报考美军南苑机场的英文打字员，无非是想混口饭吃。不想还未被录用，只好再回来唱戏。这点事在“文革”之中成了严重问题，高玉倩被大字报责为“特务”，《红灯记》中的李奶奶也因此而换了人。

1968年底，江青已有了把八个“样拍戏”拍成电影的打算。她以拍电影的标准，加紧审查这几部戏，并仔细挑选拍电影上镜头的每一位主要演员。

11月15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审查京剧《红灯记》。

江青是当然的主审。她早对扮演李奶奶的演员心中不满。刚到剧场，她先看了演员，不高兴地搭拉着眼皮：

“高玉倩可以放出来嘛，又没有确凿的旁证，就说她是特务？我办的案子都是讲求证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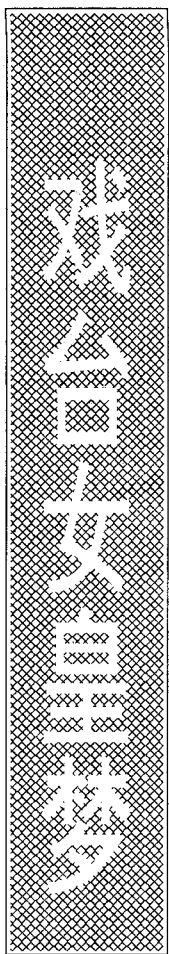
剧团领导也不愿意整高玉倩，但“文革”是场混乱的“群众运动”，派性也十分严重，解放一个人，是要有个“说法”的，如果江青肯说话，当然就好办了，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团领导赶紧问道：

“高玉倩可不可以拍电影？”

“怎么不可以？！”江青面无表情，冷冷地反问了一句。

第一场演完，第二场就是李奶奶的戏了。大幕还



## 样板戏秘闻实录

未拉开，江青又想起高玉倩。

“高玉倩来了吧？”

剧团领导一阵紧张，十分钟之前刚说要解放，怎么就能来呢？他们慌忙应道：

“没来，明天叫她来吧。”

江青点点头，自言自语地念道：

“说她是特务，又没有真凭实据，叫她彻底和张东川、阿甲他们划清界线不就成了吗？大不了要她在群众面前交代交代，排《红灯记》，她有

尽，又加上一句：“铁梅的衣服要像红灯那样红，红头绳也要那样红！”

于会泳照样坐在江青身旁，随时听取江青的意见。他虽原是上海两台“样板戏”的曲作者，但江青欣赏他，信任他。以后，每台“样板戏”音乐与唱腔的重新设计与修改，都由他负责。

江青听完第三场李玉和喝粥的唱段，对于会泳提出了详细的修改要求：

“李玉和出场要有一句导板，一句回龙、一句慢板，再接原板。”

于会泳小心地请示：“是西皮小导板吗？”

江青点点头：“对！西皮小导板。杨宝森《骂曹》的‘逸臣当道’可以参考。”

话音未落，江青突然看到了台上几个喝粥的群众，这使她很快转换了话题：

“啊呀！老百姓的衣服补的丑死啦！要补的是地方，补肩膀，现在补的那么不美，你们见谁的衣服补丁在肚子上啊？”

这场结束时，江青要求把这场戏改在日间。

“老不见天，黑沉沉的，改在下午4点！”一直没发表意见的周恩来，对江青提出异议，说：“这是一个傍晚。”

江青猛然回过头去，蛮横地叫道：

“就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

说罢，她紧闭住嘴巴，再也不吭气了。

人们感到空气的紧张，都沉默了。周恩来也没再讲话。这次使剧组犯难了，这场戏的时间到底改不改呀？

直到下一场鸠山在办公室接电话，念道：“怎么，掐断了？”时，江青高兴地忘了刚才的不快，手舞足蹈地喊：

“这是我搞的！为了堵塞对上级的破坏。”

没人应和，她转过视线，望望左右的人们，想起了刚才的事。在推推眼镜的功夫，做出一副微笑的脸，转向周恩来，谦虚地指着台上鸠山头顶上的一块横匾，问道：

“‘武运长久’是不是武士道啊？”

“是武士道。”周恩来礼貌而平静地回答了

一功啊！”

第二场开演了。台上，李奶奶在擦拭着红灯。江青劈头一句：

“你看，你看，我讲过了多少次要研究研究配色，可你们看看，李奶奶的围裙有多难看！一定要改成藏青色的。”……

铁梅出场。一曲“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倒让江青眉开眼笑起来，她歪着头赞道：

“嗯！不错。长瑜有个小样儿，儿气极了，她都27岁了，能把铁梅演得这么天真、稚气，不容易呀！”

江青的脸，好像夏日时节多风暴的天气，说变说变。

“服装设计是谁？铁梅的衣服不好看！这是什么颜色？要真正的红、要红得漂亮。裤子要咖啡色或驼色的。”停了停，她感觉言犹未尽

她。

“啊！是武士道就可以用啦。我原来就是不愿要这个‘武运长久’”。

江青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周围的气氛和缓多了。

第五场“痛说家史”是李奶奶的重场戏。这场的唱与念，都是戏的关键。对台上演员的表演，江青很不满意。

当李奶奶念道：“铁梅，给你爹拿酒去”时，江青忍不住了，她大声唠叨着：

“要京韵，要上口，这个基本功应该有。”

再接着往下看，气更不顺了，台上演员念一句，江青坐在台下指责一句：

“念白要有高低，要讲辩证法。‘她姓张我姓李’这句末尾完全应该低下来，然后下一句再高上去……唉！她唱这句‘铁打的金刚’时，也不会换气，她不懂辩证法，基本功也不过硬……这个‘被捕’的‘捕’字要紧，要突出，她现在是一个劲儿地嚷……”

江青一边看一边说。剧组领导迅速、认真地记录着她的话。江青时不时还示范几句，看到后边，她完全泄了气。声音明显地不耐烦了：

“要有起伏，要有过程，要低下头去，然后有个过程，再念下面的话……不要急嘛，这个人性急。她又哭了，演员可不能哭哇！演员哭，声音就没了。搞自然主义不行！一唱到那儿，她就哭，我倒没哭，哼！”

她拧过脖子，不看了，一个人生闷气。

剧团领导深知缘由，稍稍地走上前来，耳边请示：“是不是叫高玉倩今天就来？”

江青眼睛一亮：“现在就叫她来。这个戏的李奶奶是她创造的。”

剧团领导一面打发人去找高玉倩，一面又悄悄递上一份关于高玉倩问题的报告，哄着江青说，团里的群众已经同意解放她。

江青这才慢慢地舒了一口气。她要拍电影，没有得力的演员怎么行？现在非高玉倩不可，至于别的，她可以不管。运动、整人，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嘛。

于是，她点着头说：“我完全同意群众对

她的批评，叫她交代、揭发。”她说的揭发，当然是指她所痛恨的张东川和阿甲。

“电影马上就要开拍，是不是让高玉倩马上练功？”

“对！马上练功。”江青坚定地说。

幕间休息的时候，江青把前来参加演出及观看演出的所有著名京剧演员，都召集到休息室。一方面是交流，另一方面，也想训导训导他们。

江青象个文艺王国的女皇，她随意地拨弄着她的臣民：

“吴玉璋，你胖了。要练功，每天两小时。还要拿顶，一次十分钟。你们不拿顶，膀子哪儿有力气呀？”……

“冯志孝，你也要练功。要听杨宝森、余叔岩、高庆奎和言菊朋早年的唱，不要你那个味儿，去掉你那些马派的东西。”

“裘盛戎，你给我念句‘乌鸦’”

“嗯。”江青听了裘盛戎的念，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她对大家说道：

“你们要学杨小楼《霸王别姬》的念白。武生还有个周瑞安，‘周一腿’嘛，靠背武生吴彦衡也不错。……还有个姓戴的会杨派，可他是个大汉奸。叫他赔偿，叫他教杨派，先说出几出戏。他过去跟着彭真说我们的坏话，不能放过他。”

正当江青气愤起来，吐沫星四溅的时候，高玉倩走进休息室。她是在劳累“改造”了一天之后的梦境中——半夜3点被人喊起，然后又一直在“快！快”的催促声中，莫名其妙地被带到剧场里的。

江青立刻变了一副脸，笑盈盈地站起来，迎上前去，做作地对高玉倩拥抱了一下，弄得高玉倩不知所以然。

“玉倩啊，你受委屈了。群众对你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你要跟他们彻底划清界线，揭发他们。”

高玉倩茫然地点着头。

“玉倩啊，电影你拍。演《红灯记》，是我点的你，是我让他们听听你有没有大嗓。他们

跟你说过没有？”

高玉倩如实地回答“没有。”

“阿甲坏透了，贪污了好多东西。”

1963年时，李奶奶的角色是在中国京剧院四个团中公开招考的。高玉倩中选，此事院内院外众人皆知，江青今天想做好人，太晚了些不过她很有手段，她把责任推到已被打倒、毫无发言之权的阿甲身上。

高玉倩被解放了，回到《红灯记》剧组，随即投入了拍电影的紧张工作。

已改名为“浩亮”的李玉和的扮演者，是武生出身的演员，他身上功夫好，虽然开始唱功欠缺一些，出演李玉和曾遭到京剧院领导以及导演的怀疑与反对，但对他的武功，在年轻一辈演员当中，他算数的着的人物了。

江青为在她强行改成刑场的一场戏中，充分贯彻自己的意图，给李玉和受刑之后的出场专门设计了一套碎步动作。可浩亮的几次排练都令她失望。

“腿抬高一点嘛！浩亮，你可是个武生啊！”

浩亮一出场，江青就在台下叫。

这是1968年9月26日晚，江青亲临中国京剧团的排练场，指导“刑场”一场戏的排练。

“浩亮，你的腿功不行。腿要抬高，身子不能歪。”

浩亮又努力地做了一遍。

“唉！”江青失望地叹口气，对台下的人们说：“这是一个造型问题，你们在戏校学习时，没学过那个功？”

众人摇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台上，浩亮竭尽所有能量地边舞边唱，一切都按照彩排、演出的要求进行。他手上、脚上都带着链子。演到高潮时，浩亮昂首挺胸，唱出那句激昂的高腔——

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

锁住我双脚和双手，

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好一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气魄。

江青中断了与众人的谈话，突然冲着台上喊：“往高！抬头！……唉，胸也不挺，你是

个驼背！”

当浩亮第二次做碎步动作时，江青站起身来，朝着台上摆手：

“浩亮，你下来吧！你没有那个基本功。有了那个基本功，造型就很美。这个动作要等你练好再上，练不好就不上。你的功底不行。你的腿原来能抬很高，现在却抬不高了，不练功吧？”

江青转对剧组领导人之一的李金泉，说：“去掉他的事务性工作。练功！每天唱两个小时，舞两个小时。”

浩亮带着一身的汗水，从台上下到江青身边。江青指着 he 冒着腾腾热气的后背：“怎么不挺起来？你老是驼着个背！”

浩亮不好意思地笑笑。

江青冲着旁人喊：“应该在背后打他三锤！都是阿甲他们，整得他弄成小老头了。李玉和是英雄啊！无产阶级的英雄。上了刑场就要大义凛然，要八面威风。你是武生啊！连腿都伸不直？真是糟糕。”

江青又坐下，对浩亮说：“上去再走一遍碎步。我看你能走几步。是不是少走一点，就可以藏丑，走太长了不行，你没那功夫。”

浩亮跳上舞台，又走了一遍。

江青喊道：“这样吧，锣鼓经缩短，你能走几步，就叫锣鼓打几步。腿抬高时，拿出你的本事来。今天不练了，看你浑身是汗。你老爷大概不练功，现在你一定浑身疼吧？我相信你一定浑身疼，下来吧！”

浩亮顽强地咬住嘴唇：“我再来一遍！”

他回到边场，重新搓着碎步出场。

江青已经不看了，她在左顾右盼地找着什么人。

“志孝，你有这个戏，来一遍看看。”江青对坐在台下的冯志孝说。

冯志孝也是中国京剧团的台柱子，著名的老生演员。见江青点他的名，谦虚地说：“我是跟浩亮学的。”

“你穿的是练功裤吗？”江青不容商量。

“是”。

“你上去！”江青对冯志孝命令道。

然后，江青对看台上的浩亮喊：“你下来！”

不知是出于疼爱，想让他放松放松筋骨肌肉，还是嫌他一身的汗气，江青对浩亮说：“你不要马上坐下，兜一个圈再来我这儿坐下。”

台上，冯志孝开始做动作。

江青大笑。“不行！你不仅后搓步不行，连浩亮有的你都不行。哈哈！再来一遍！”

冯志孝又做了一遍。

“好！这次好些，可以藏丑。”

江青指着冯志孝对浩亮说：“他不是搓，他是颠，你不要既想颠又想搓，干脆就颠着出来算了。”

突然，江青看见了李光。

“李光！你上去走走我看。”

李光也没有做出来江青所要求的动作。

江青对排练场的所有演员大声说：“现在，你们谁能按要求走出来？上去！自报奋勇！不

要怕丢丑嘛！”

几个男演员都上台一试。

江青摇着头，叹道：“唉！旧教育制度毁人啊！要把那些戏剧学校砸烂！那些王八蛋不教你们好东西，真气人！”

接着，她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阴着脸，说：“有一个人，会这功夫。他的《挑滑车》、他的《蜈蚣岭》、他的《恶虎村》都有这功夫。他还有三个跟斗，都是绝招。”

一提这三出戏，京剧行里的人都知道，江青在说张世麟。他是京剧界的武生奇才。“文革”前曾在天津京剧团当台柱子，有几出拿手好戏，令人拍案叫绝。可惜“文革”伊始，他就被当成旧文化的典型人物揪出来，关进“牛棚”。戏，自然是无法演了。

江青很痛恨他。因为他享受旧式艺人贵族的生活方式并固守封建式的师徒关系，保守了他的“绝招”。可是，江青又实在欣赏他的武功功底。

“你们穿相当紧的硬底鞋都不行，而那个人穿平底鞋演武松，能有同样的效果。他的头和肩都有锣鼓经。浩亮，你就没有，哪里都没有，你要练。”

江青眯起眼睛，像是想寻回昔日里，她当戏迷票友看戏时的那种感觉，自言自语地说：“杨小楼一出场，闭着眼，一亮相，再睁开眼睛，台下就鼓掌……我也不知道他的绝窍在哪儿，反正他有那么个绝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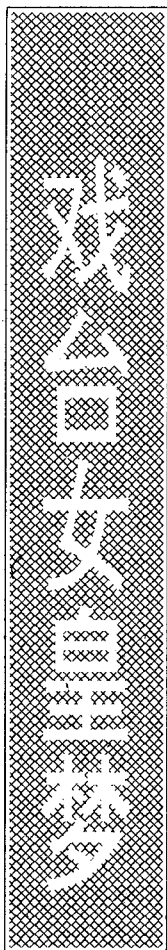
她问浩亮：“你是个杂家，各种功都练，你跟谁学过戏？”

浩亮翻着白眼珠，扳着手指头，数出一串武生大师的名字，其中就有张世麟。

江青听到这三个字，象触了电一样，一拍大腿，霍地一下子站起：“他就是不教你？你怎么不偷着学来！”

浩亮吓了一跳。师傅传弟子绝技，无论是在武林还是在戏班子，都是有一套规矩的。有人跟定一个师傅一辈





## 样板戏秘闻实录

子,也不一定能得到真传。

江青朝着坐在一边陪着的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喊:“谢副总理,立刻把张世麟从天津拉来!”

谢富治马上点着头:“我就去安排,明天下午,他就可以押到。”

江青神气了些:“要他演传统戏,就要他这个功夫,岂有此理!敢不教?看他的《挑滑车》、看他的

《蜈蚣岭》、看他的《恶虎村》。叫他拿出全副本领来表演,偷懒不行。”

见大家都不作声,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江青笑了。她习惯性地歪起头,颇有几分得意地说:“你们连样子都没见过吧?就为了他这个招,我每场《挑滑车》必看。我估计你们在学校都没学过。他不肯教。他还算不算中国人呀?如果他不算中国人,那就算了,把他驱逐出境。”

“工农兵养活他几十年了,叫他赔偿!你们说应不应该?”

“应该!”众人异口同声。

“叫他赔!叫他把基本功都教出来,他要是不把浩亮教好——”

江青突然故意停顿一下,憋足了气力,提高了调门“——枪毙!”

那尖厉的高频声波直刺每一个人的耳膜,人们瞪起惊恐的眼睛望着这个权势显赫,一句话就能置人于死地的女人。好像那种不祥的命运也会顷刻之间落在自己的头顶之上。

“哈哈……”江青见状大笑起来。“我这是气话。他月月工资上千,不让他赔偿行吗?……好哇!”江青一拍巴掌,“搓步出场,再来一遍。”

浩亮、冯志孝都做好了准备。

江青对浩亮说:“刚才志孝采用的是老生动作,武生也能做。我看你前头索性颠着出来吧,不要搓了。”

江青转过头去,问冯志孝:“你怎么做的?”

冯志孝抓抓头皮,一副为难的样子,说:“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江青大叫起来。“这话不对!错误的!冯志孝,你上去,颠!你就是颠,能说不知道?再来一次,累不着你!”

两天以后,《红灯记》剧组领导李金泉利用江青审戏的空当,向江青汇报:

“昨天晚上,张世麟来了。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先对他做了批判,然后让他表演了几个戏的搓步。”

江青一笑:“怎么样,他的搓步基本功很好吧?”

“是不错,他的搓步基本功无论是前面的,后面的,左面的,右面的都很不错,我们正在学。”

“嗯,别忘了好好斗他。”江青说。

### (五)“三突出”

“样板戏”日渐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后来作为一个标尺,用以衡量一切文艺作品。

江青曾经说过:“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

“三突出”的初次亮相,刊登于1969年11月号《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之中。它有这样

一套“定式”：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

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文化大革命”中，“三突出”理论一直被尊为“无产阶级文艺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是针对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的关系而言。要求形成对比，要以反面人物衬托正面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的强大。对反面人物的描写，“只能使它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

《智取威虎山》描写匪徒山洞一场，到底让谁围着谁转，就是这一条理论的焦点。

原舞台设计将匪首座山雕的座椅安排在舞台中心，围绕着盘审杨子荣展开剧情。这一方案立刻遭到江青斥责：“立场站到什么地方了？”

根据“三突出”原则，为表现杨子荣“只身把龙潭虎穴闯”，在匪窟中面对“凶焰万丈”的座山雕，“为人民斗恶魔，我志壮力强”的英雄气魄，导演改变了舞台调度，让杨子荣用一张“联络图”牵着座山雕的鼻子满台转，使杨子荣始终处在舞台的中心，主宰一切；而座山雕却居于舞台的一角，被动挨打。以匪首的卑微无能陪衬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高大无比。

《红色娘子军》第三场，洪常青乔装赴南府，这一天正是南霸天的生日，红军借此机会里应外合消灭他们。影片摄制组从剧情和戏剧性出发，开场由南霸天府中的“寿”字拉出镜头。江青怒了：“这不是渲染南霸天的威风吗？你们的屁股坐到了哪一边？”……

“三突出”中的第二“突出”是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不允许花笔墨去描写中间人物和一般群众。

这种“突出”，还要注意以落后人物的转变来衬托英雄人物的表率模范作用。如《海港》中韩小强与方海珍，就是这种关系。方海珍要弄清散包事件的真相，必须找韩小强，并帮助他转变思想。在最早的演出本中，只有韩

母对韩小强进行家史教育，没有方海珍的戏，无法突出关键时刻英雄人物的形象。所以，剧本遭到批判并进行了修改。

第三“突出”，是在所有英雄人物中间，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谁是主角，谁是主要英雄人物，就要把戏让给谁。

京剧《红灯记》本名《三代人》，是写三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的英雄故事。“三突出”理论形成后，李奶奶与铁梅的戏就被砍掉许多，集中突出李玉和。江青不止一次地指责描写三代人是“平分秋色”。

她特别对电影拍摄中李奶奶的几个镜头大为不满，认为太多了：

“怎么搞的？我千方百计地突出李玉和，你们却偏要突出坐机关的老太太！把李奶奶凌驾于李玉和之上？”

其实，导演也不过是在李奶奶有戏时，给了她几个镜头，绝没有“凌驾”之意。遭到痛斥，诚惶诚恐。拍其它几部“样板戏”的电影导演，闻风转舵，改变“谁有戏把镜头给谁”的传统电影手法，竭尽全力突出英雄人物，以至于拍出了许多不伦不类的东西。

电影《沙家浜》就出了一个笑话。在伪军司令胡传魁“夸新娘”的一段戏中，导演为避免“突出敌人、正不压邪”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硬是把边唱边表演的胡传魁处理到画面外，镜头全部给了阿庆嫂，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没戏的阿庆嫂，胡传魁的唱段成了“画外音”。而阿庆嫂一人矧有介事地做出一副听讲的表情，至使许多人搞不清这个一号英雄在干什么。

电影，虽然只能在江青“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要求之下伸展，但它毕竟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江青不允许别人把“样板戏”改样，自己却抓住拍电影的机会，尽力在拍摄中补充舞台上的“样板戏”“三突出”不足的部分。

江青早在1967年初看芭蕾舞剧《白毛女》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提出戏要以武装斗争为主题，突出正面英雄人物——大春，并要求把喜儿与大春“团圆生产”的结局改成喜儿参

军。但“文革”几年，《白毛女》改来改去，总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毕竟戏已定型，喜儿是“白毛女”，是戏的中心，是第一主角无可非议。白毛女的故事在中国又早已是家喻户晓，大幅度修改不易被人接受。但江青说过的事、认定的事，必须做到。她抓住了拍电影的机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春一定要体现这一思想，这才应该是全剧的中心。”江青多次这样要求剧组改戏。

大春的戏比喜儿少得多，如何在电影中加强大春的形象，就成为影片摄制组进行再创作的重要课题，也实在是一个难题。

“三突出”不是要求“在所有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吗？为突出大春，在群舞中，摄影师也没忘记镜头一直跟着大春。

不料，江青又拍了桌子。她在一次会议上公开点名：

“《白毛女》要重拍！我真不知道有些创作人员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整部戏都在歪曲！”“又错了？”直到这时，摄制组成员们还不知错在了哪里。

直到江青要他们写出书面检查的时候，才为这些稀里糊涂就犯了“错”的人们指点迷津：

“第一场中，你们就把贫下中农和恶霸地主两个阶级的大搏斗，拍成了大春一人的孤军奋战；把革命群众的集体参军拍成了大春的个人行动，既贬低了群众，又歪曲了大春。这可是一个觉悟问题、立场问题，你们要好好检查思想！”

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常宝，是戏中的第一位旦角。在演员表排列名字时，江青坚持要配角李勇排在常宝前面，而且李勇奇造型的图册画面，一定要比常宝的画面大。

“这是突出哪种思想，哪种路线的问题。”江青这样说。

舞剧《红色娘子军》普及本出版时，封面选用哪一张照片，也曾引起过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致使一向独断专行的

江青，也迟迟举棋不定。

本来，经过创作人员根据剧情和各级领导根据“三突出”原则细心地挑选，“常青指路”成了无可争议的入选封面的照片。这是第一场的一个造型照。——晨曦的椰林中，洪常青手指红区，吴清华一身鲜艳色套装，在洪常青身后单腿足尖站立，向着红区放眼望去，激动兴奋的脸上充满着坚定与向往。小庞在侧后方拉开距离，又以更低一层的角度为这一造型做了完美、谐调的补充。

这个造型，象征着受苦受难的中国劳动妇女，冲出旧社会的牢笼，向着共产党指引的光明前程，寻求光明、自由与平等。把《红色娘子军》全剧的情节内容，做了最准确、最大限度的包容与概括。

江青却出了新花样。

“《红色娘子军》可是要突出武装斗争的啊！封面一定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主题。”

创作人员又是一阵忙，选出一张第五场红军对前来进犯红区的南霸天匪徒进行狙击战的照片。画面上，在以战场红色调为底的滚滚硝烟之中，洪常青与吴清华在一块大岩石背后，正对着进犯红区之敌举枪射击……

还为突出党的领导，另有一张党代表洪常青给犯了错误的吴清华上党课时的双人照也被提名参与候选。

江青手里拿着这三张照片，越看、越比较，就越拿不定主意。后两张虽然突出了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但总觉得展现剧情内容不那么贴切，画面也不如第一张候选照片美观。

于是，江青建议这个问题可以发扬发扬民主，让大家讨论这三张照片的利弊，汇成文字材料，限时上报。然后，再由她来定夺。结果，讨论结果，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大家谁也不敢表示真态度，生怕日后追究犯不突出政治的错误，打了几个回合的哈哈，没说个所以然来。

封面问题就这样一直拖下来。直至不马上开印就会耽误整套“样板戏”出版计划，江青才忍痛割爱，咬牙拍板，下令按第一方案执行。



按照“三突出”模式塑造出来的英雄，都千篇一律，没有个性，没有典型，完全雷同化了。对“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的评价，当时社会上就暗中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

身穿红衣裳，  
站在高坡上。  
昂首挺胸膛，  
挥手指方向。

## （六）反复无常的江青

电影，是更广泛宣传“样板戏”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江青对“样板戏”影片的拍摄把握得十分精细。“首长”加“内”行，把个电影界折腾得翻来倒去。

“三突出”在电影界进一步被发展了。江青自得地提出一个“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标准。

“还原舞台”——一切按照舞台标准进行。

《智取威虎山》有幸第一个被批准拍电影。江青几经考虑，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最具优势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片子由江青亲自点将：谢铁骊执导，李文化摄影。

起初，谢铁骊担心自己对京剧艺术不很在行，怕拍不好。这又是第一部“样板戏”影片，责任重大。所以，建议找一个懂京剧艺术的导演。江青听说后，立即给谢铁骊“打气”，因为她深知她必须依靠谢铁骊这样一流的好导演。她对谢铁骊说：“我看迷信可以破除，你大胆拍吧。”

北京电影制片厂接受了拍第一部“样板戏”影片的任务后，摆开架势要大干一场。他们曾拍过许多戏曲影片，有丰富的经验，为拍好这部至关重要的《智取威虎山》，他们计划充分发挥电影的优势，突出电影的优势。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江青来审查样片。

银幕上出现了一片白茫茫北国风光的外景……。为使外景与室内剧情衔接，在杨子荣出场之前，导演有意安排杨子荣押着野狼嗅侦察归来。在对唱段的处理上，也采用了电影化的手法。如参谋长介绍杨子荣“出身雇农本质

好，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的一段唱词，就通过电影中“化出”的艺术手段，一句一句地“图解”而出，达到了很好的电影效果。

摄制组正为这一连串的加工镜头而兴奋之时，江青却拉下了脸，她愤怒极了。

“这是什么东西？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你们怎么可以乱加动作？想篡改我的样板戏吗？”

江青再次强调“还原舞台”。

全片宣告彻底失败。

在江青的催逼之下，第二次拍摄又匆匆上马。摄制组在“还原舞台”的紧箍咒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照葫芦画瓢地拍摄舞台演出，甚至连布景的制作方法和尺寸，也分毫不差地模仿。把个电影拍得同舞台演出一模一样。

江青看了，摇着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你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你们这样的片子与我的样板戏貌合神离似是而非！”

又失败了。摄制组被勒令停止拍摄，深刻检查。

《智取威虎山》影片除了这两次失败，还有一次拍摄教学片的实践，同样归于失败结局。

江青急了。

“你们都该打屁股！白吃饭！还要人民用血汗钱给你们交多少学费？”

这以后，江青下大力投入《智取威虎山》电影的拍摄。这是她第一部“样板戏”影片中的“样板”啊！成败与否，关系到整个“样板戏”影片系列。她急于取得经验，她必须取得经验。于是，她亲自督战。

《智取威虎山》电影，成了江青拍片的“试验田”。她要求逐场看样片。

第四次拍摄，摄制组人人紧张得脑袋发麻，手心冒汗。

江青反倒不急了。

“第二场整场要回炉，浪费一点不要紧。

我不是要你们浪费，我要的是经验！”

这期间，江青对剧中英雄人物更为精心。

在一次审片之后的座谈中，她拉杨子荣的扮演者董祥苓坐在自己身边。

“祥苓，我要好好研究研究你，怎么样？”

江青指的是董祥苓的脸部造型。

她对着化妆师，也对着大家：

“化妆时眼睛角上要往上画出去一些。现在杨子荣的眼睛滚圆滚圆的，脸又这么横的出来，多难看，一点也不英俊。这样不允许！”

江青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

“化妆师，这一点可不可以解决？”

话虽是说给化妆师的，但江青是想让所有人都听得到。

“可以解决。”化妆师紧张地站起来回答。

“嗯！要克服一切困难，在近影特写中要突出杨子荣的英俊。舞台上看不出的斑点皱纹，上了银幕就看得出了。加了柔光镜没有？”

“加了”。摄影师马上回答。

银幕能把演员的面孔放得极大，什么细致微小的毛病都逃不过镜头的大特写。十分不利“三突出”原则对英雄人物的美化要求。董祥苓拍《智取威虎山》电影时，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为拍好英雄人物形象，他既要带勒头带又要吊鼻。由于勒头带太紧，笑时脸部肌肉太绷，表情受到影响，笑好似哭一般。可问题却不好解决，大家都在发愁。

江青也没有好办法。她突然要董祥苓放弃吊鼻。她关切地拍着董祥苓的肩膀：

“祥苓啊！鼻子不要吊啦！搞不好影响上呼吸道，影响声音。”

江青把美化英雄的希望寄托在化妆上。化妆师化的妆，她怎么看也不满意。座谈会上，江青用铅笔指着董祥苓的脸比划着：

“他的眼睛圆，上下不能再画了，再画就成大核桃了。……可以淡淡地往上画一下，不难的，你们看——

她要来一张白纸，在纸上画着。

“睫毛要黑一些，往上卷一些，你们有没有睫毛夹？”……“有，就要用，要千方百计地使我们的英雄人物美些。”

她左右看看，象是在捕捉下一个猎物。

“沈金波！”江青大声叫着少剑波的扮演者。“你怎么面黄肌瘦的？是不是不给你吃？”

显然，江青对《智取威虎山》剧中第二号英雄，参谋长少剑波的人物形象也不满意。

沈金波一楞，无言以对。过了半天才说了一句“我身体挺好，我还觉得胖了些呢。”

京剧演员毕竟不同于电影演员。他们首先要会唱、会做、会打，然后才能考虑形象。可江青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又是那样完美高大，电影拍摄也只好迁就着了。

江青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英雄的光彩，对摄影也提出了种种特殊的要求。

比如，拍正面英雄人物时，要多用仰角，要正面、光效要明亮；拍反面人物时，要多用俯角，侧面，光效要昏暗。否则，就是颠倒了敌我关系，犯“正不压邪”的错误。

这种以“三突出”为中心的电影拍摄理论在《红灯记》影片李玉和与鸠山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赴宴斗鸠山”一场，场上只有李玉和与鸠山两人，你来我往、斗智斗勇唱完全场。戏的比重是一样的。但突出谁，却是重要的立场问题，如何突出，也是一个艰巨的技术手段问题。导演除将镜头多给李玉和之外，在全景镜头里，李玉和总是在前景，呈正面，居画面中心。而鸠山则在后景，呈侧面，靠边站。当两人斗争进入高潮时，导演又安排了一组节奏强烈的对列镜头，仰拍李玉和近景，俯拍鸠山中景；仰拍李玉和特写，俯拍鸠山半身。这就在气势上使李玉和始终压制鸠山。

这一场的镜头得到了江青的肯定。

她笑了。“嗯！这就叫‘原于舞台，高于舞台。’”作为经验，这一场的镜头被广为宣传。

以仰角拍摄英雄，不能绝对。要因人而异。

上海京剧团《海港》剧中主角方海珍的饰演者李丽芳，就属长方脸形。仰角拍摄，实在不是适合于她的最好角度，为避免犯错误，摄制组依旧机械地使用仰角拍摄。结果，使银幕上的方海珍显得又老又丑，手比脸还大。不但没有突出她、美化她，反而丑化了她。加上方

海珍的妆粗犷有余,英俊不足,前一半是真眉,后一半是画的假眉,一遇到反侧光,后半部画上去的假眉就被吃掉了,反而损伤了英雄形象。

江青对方海珍的形象最不满意,不知挑过多少毛病。

“方海珍的头发真是岂有此理!后面有个包似的,象个老母鸡!”……

“你们还给方海珍穿粉红格子的衣服,你们自己说说怯气不怯气!”

结果,《海港》影片被江青宣判死刑,重拍。

### (七) 使人不知所措

演戏,是自始至终连贯的,演员投入戏中,感情好表现,唱段也能保持连贯性,一气呵成。

电影则不然。演员感情刚酝酿上来,唱上几句就要换下一个镜头了。

“样板戏”的主角们都本非职业电影演员,在镜头前翻来复去的总唱一句,感情难于连贯。可江青偏偏对“样板戏”拍摄提出高标准要求——讲求“激情”。

江青说:“激情,就是无产阶级的美。”

为达到戏曲演员的声情并茂,避免后期录音表情与声音的不谐调,江青要求各摄制组拍摄“样板戏”时,一律采用同期录音方式。

当时的音响设备很差,同期录音效果达不到要求标准。各摄制组想尽办法,保证激情,保证质量。

影片《红灯记》拍摄之前,就准备了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还是使用传统的电影拍摄方式,以单机分镜头拍摄为主,在武打、群舞场面使用多机连续拍摄。录音采取同期、间期、后期相结合的方法。

第二套方案即照顾演员的“激情”。以多机、分段拍摄为主,录音也基本采用同期。

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題,前者在镜头处理、光效、构图、音质等方面虽然便于处理,但对演员表演的连贯和激情方面可能产生

一定的不良影响;后者对保证演员表演连贯有利,但多机连拍,各摄影机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干扰,使光效、构图、音质变得极难掌握。

同期录音虽然能够保证“激情”,但在当时连立体声录音设备都没有的条件下,录音师只得自己动手,将两个单轨录音机改装,联为双声道。这样的设备,很难保证录音效果,如果一旦在同期录音中哪个部分稍出点差错,整个唱段都得重拍,对演员的精力消耗极大。

显然,多机、同期拍摄的困难很大,很不现实。但没有人敢提出困难。

《红灯记》摄制组于1970年6月14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负责人对全体成员进行了政治动员。人们纷纷谈认识、表决心,“三忠于”、“四无限”地坚决表示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革命大批到贯穿始终。

多机摄制与单机摄制,到底哪一种方法好,《红灯记》摄制组成员谁也不敢下定论。于是,摄制组长只好决定,先各用一种方法试验拍摄同一场戏,对比效果,让事实说话。

摄制组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试验拍摄了《红灯记》第二场。从双片看,单机拍摄、先期录音无论从音质,还是光效、画面,都优于多机拍摄与同期录音的效果。

为照顾首长情绪,也给演员们保持革命激情留有余地,《红灯记》的拍摄最后采取了单机为主,多机为辅,主要唱段先期录音,对白和一般唱段同期录音的方法进行。

虽然“激情”发挥受到阻碍,但对影片效果,江青是从不含糊的。她要求动用一切手段,把戏拍得感人。

江青要求镜头、音响、画面、光线、布景、化妆、服装等各方面都要以突出英雄人物为主。

“你们可不能把自己的专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削弱、淹没了英雄人物。”软硬兼施,江青也常常动用几分语重心长。

江青常喜欢用《奇袭白虎团》压别人:

“谁说京剧现代戏不能演武戏?让他看看

《奇袭白虎团》”

摄制组经过多次实践，拍摄顾及了演员的“激情”，就无法表现武打与舞蹈的连续性、京剧的锣鼓点可不等人啊！

同时，要拍出武打的一招一式、一起一落，就又忽略了整个武打的气氛，搞不好，既表现不出“革命激情”，又表现不出武功技巧。摄制组真犯愁。

在一次审查《智取威虎山》时，江青看到常宝向杨子荣控诉土匪罪状，悲愤地呼喊爹爹的镜头。

“怎么眼里没有泪水？激情没有出来。”

拍摄时，这一组镜头要来回回地拍，饰演常宝的演员要来回回地唱，已经消耗掉很大的感情

与体力，再来来回回地哭，确实难以为之。更何况，演员动用了真情，哭起来，声音就没了，怎么还能再唱呢。

摄制组告诉江青说常宝的眼睛已经滴了甘油。

“滴了甘油？在哪？我一点眼泪也没看见，要滴上晶莹的泪水！”

谁也不知道江青所言的“泪水”是指什么。银幕上，常宝唱到“我娘她跳洞身亡……娘啊……”

“这儿也要看见泪珠！”江青说。

“有的。”旁边有人应了一声。

“有？有什么？”江青狠狠地瞪着那个应声

的人，“我看不出来。泪水要用适当的光照着。你们这里缺少这道光。”

不仅是泪珠的闪光，就是普通的眼神光，江青也要求得极为细致、严格。眼睛的神彩是突出人们内心的最好写照，她的英雄人物特别需要眼神光。

审看完《海港》样片，江青极不满意。

“怎么所有的人都看不到眼神光？你们打没打眼神光？”

导演谢铁骕诚恳地说：“眼神光比较难，它

与角度关系很大，稍一动，就没有了。”

“哼，别说得那么难，那么玄乎，明明是你们自己有问题。”江青一脸不悦的神情。

摄影师钱江在

在一旁补充谢铁骕的话：“眼神光在一定的反射角才能看得出来。”

江青面带愠色，嗲声叫起来：

“我不听你的！不听你的！人家的片子怎么解释呀？人家有的是40年代片子，在玻璃上跳舞，难度多大呀！”

江青指的“人家”，是西方影片。她常把她比较欣赏的几部挂在嘴边。特别是在摄影方面，江青对几部片子佩服得很。

1973年元旦晚，江青请“样板戏”各个摄制组观看她精心挑选的一部西方电影《网》，边看，她边作解释。

看完，江青要求大家“座谈”。



“我请同志们看这个电影，内容就不说它了。你们都是名家、专家、行家，人家使用的那些技巧，我们可以借鉴吗？有什么技巧可以学？今天请你们讲。”

江青收住话题，左右看看。

“怎么样？谁先讲？”

竟没人吭气。

江青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怎么？我点名吗？谢铁骊！你先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不要紧，不抓你们的小辫子。”

不知首长今天葫芦里卖什么药，不知又想拿谁开刀，大家只能沉默。再说，江青已多次看过《网》片，欣赏哪儿，否定哪儿，谁也吃不准。谢铁骊没敢冒失。

江青情绪却十分的好，自己拾起话茬来，似乎是想启发大家些什么。

“这片子整个靠视觉形象，全片只有十句话左右。其实，不用说话，也看得懂。”

她有些生谢铁骊的气。

“象你这样的导演看上一遍，就应该有个意见，应该有感触了。你不讲？唉，钱江，你讲！你也应该有感触了，不要怕讲错嘛！”

钱江虽是一流的摄影师，但在这种场合，对这部江青崇尚的影片率先表态，他显得有些犹豫。

江青等不急了，再提示几句：

“这部片子的成本非常低，老板一定欢迎。摄影师可下了功夫啊！光等待就用去了多少时间啊！等云、等潮水、等各种各样的潮水。他为资产阶级的名、利可以这样做，你们为革命更要有这种精神。人家都用了眼神光，近景也多，但并不使人感觉镜头在跳……”

江青讲着，突然发现了一个人，她钉住话题喊道：

“石少华同志，你讲讲。还有《奇袭白虎团》的摄影，你叫什么？”

——“我叫李光惠。”摄影师十分恭敬地做了自我介绍。

“嗯。”江青点着头，“你也讲讲。”

……

“好几处加了辅助光，成本很低呀！就几个演员嘛！表现海浪时，也不全给你看白浪，也有黑浪，有时用黑浪衬托白浪……沙滩也有各式各样的变化，我们看的都是一面水的，也有两面水的，各式各样。看得很清楚，连胡子都看得很清楚……整个画面构图都很讲究，给人印象很深。是不是？……成荫，你讲！你们搞的那个分镜头，怎么老是蹦来蹦去的？”

江青突然一个回马枪，又杀回到“样板戏”影片上，她喊完成荫，又左右瞧瞧。

“那个李文化躲到哪里去啦？……一定是在躲我。都这个时代了，还想‘小桥流水人家’吗？”江青痛恨李文化拍摄的《早春二月》。“张冬凉躲到哪儿去了……”

江青一个换一个地点着导演和摄影师的名，好象他们都是橡皮泥，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捏来捏去。

看到这些行家们认真而又谦恭地听她给上专业课，江青得意非凡。

“怎么样，这回看得过瘾了吧？摄影的看了《网》，没有不过瘾的。”

“钱江”，江青指着钱江的鼻子，“你看了也过瘾吧！你可没有人家的魄力大，没有那样的耐心，不敢闯，怕失败。怕丢了‘名’呀、‘家’啊！哼，全是资产阶级的臭名！”

虽然是严冬时节，但江青的额头上还是冒出汗来。她掏出一方雪白的手绢，轻轻在脑门上点着，嘴上却依然止不住地兴奋。

“还有一部叫《白鬃野马》的影片，我陪你们看过。在坐的如果有谁没看过，可以看看。一共五本，基本都是高色调的，这很难得。也没什么对话。还有很多的特写，眼睛的特写、手的特写、还有半个眼睛的特写……”

“咳！”她又回到现实中来，“你们太让我失望。我老说要给你们付学费，春桥同志也说要给你们付学费，你们还是缩手缩脚。”

“该打屁股！”江青突然收起一脸的和蔼，换了一副腔，声半日也提高了八度。

在坐的人低着头，默不作声。这些五、六十岁的大导演，大摄影师们，听这个权力无边

的女人象对三岁孩子一般的训教，已经习惯了。

“是什么原因？灵魂深处的东西要挖出来，不然将来搞创作还是不行的。”

“人家这个编导，虽是个资本家，为了赚钱，可他也是艺术家啊！”

“不要把自己象稻草人那样装起来嘛，不要怕失败。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吗，胆子要大一些！学费给你们付着，还那么胆子小？——对得起准呀！”

话，都让江青说了。人们低着头听，心里却只有苦笑；首先自己没准头，谁敢胆子大呢？胆子小了挨批评，胆子大了倒起霉来，那可就不是遭批评和训斥了。

### （八）“出绿！出绿！”

江青对“样板戏”影片的要求，不但讲求用光，还十分讲求光效色彩。

《海港》片第一次拍摄失败，就糟在光效色彩方面。

“怎么搞的，你们拍的片子总是红的不红、绿的不绿。清晰度也差，模模糊糊，乱七八糟。……脸也平平的，一点立体感都没有，象块饼！……这怎么解释？还不能说是电影工业没有过关吧？片子可是依斯曼的哟！你们不善于总结经验，老要党和国家给你们交学费？现在，四、五本片子又要给你们交学费了不是？……”

江青初审样片，就一口气指责了这么多。

她专门召集《海港》摄制组开会，要求摄影师钻研技术技巧。她告诉大家，用光就是技巧，技巧就是艺术，采光、构图就是电影的语言。

她责备摄制组过于浪费：“本来拍一个近景用3000支光，你们要用多少万？用了多少万？还是灰不溜秋的。不象人家，亮是亮的、暗是暗的，你们的片子没有层次，缺少隔离光。”

在技术技巧方面，江青决不含糊。她要用艺术把红旗打到全世界，用艺术宣传中国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她对样板团和摄制组说：

“干巴巴地老是‘万岁，万岁’，人家最讨厌。”

这话当时若换成别人说，十个有九个要死定了。

在摄影技巧上，用光与色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中国拍彩色片经验尚不足备的“文革”初期，八部“样板戏”全部是彩色片，摄制工作确实有一定难度。

可江青在生活中就是一个极其注意讲究色彩的人。在艺术上她更不会放过。舞台上，她要求布景、道具、服装的色彩时而要和谐，时而要冷暖搭配，时而又要有中间色过渡。拍摄影片，她对颜色的挑剔就更多了。

江青对“样板戏”影片色彩最突出的要求，不是“出红”，而是“出绿”。她要求每部影片必须拍出很好的绿色。

江青说，出绿才能使整个画面显出层次，才能烘托英雄人物朝气蓬勃的革命风貌。

在每一部“样板戏”影片拍摄中，都常听到江青关于“出绿”不突出的指责。

《红灯记》：“我千方百计地给你们安排一点绿，你们就是不搞上；我在破门帘上配了一块黄、一块绿的补丁，你们没拍出色彩……”

《红色娘子军》：“舞台上的闪电，到电影上却没有了，全是黑的。我讲过用闪电，为什么不用？一用闪光，就可以使叶子的绿色显出层次……”

《白毛女》：“听说我批评别的戏了，你们就出了绿，出得太特别啦！没有层次……”

《海港》也是听说江青特意要“出绿”的意见后，才刻意追求“出绿”的效果。这个摄制组，是拍摄《红色娘子军》的原班人马。在前部影片，因为“出绿”不好，没少挨骂。所以，在他们所接到的第二个片子《海港》中，就拼命地“出绿”，不但搞了各种绿色树木，还怕不绿，又在绿树上打上绿光。

结果，绿得特别了。

江青初审，气得使劲摇头，眼镜都快摇下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单调、虚假，没有层次。戏的季节是什么时候？——是盛夏啊！你们把

影片拍成了初春的嫩绿……”

《奇袭白虎团》是最后一个拍电影的戏。摄制组吸取了其他几部戏的摄制经验，专门研究了“出绿”问题，计划了一套周密的方案。

导演采用了分区照明的方法，使景物有明暗对比，把松树、草皮的绿色又分为深、浅、嫩不同的层次，并在树、草、铁丝网、木桩上洒上了水，再以闪电的光效使树木、草皮产生绿色的光斑。从摄制出的样片看，绿，确实出得很不错了。

审过样片，谈意见时，江青歪着脑袋想想，总觉得有点什么不如意……嗯，不是绿，而是红……对！红少了。

“二场的火光处理得太小，敌人难道就放了那么一点点火吗？”江青说，“没有冲天的火光，怎么能够揭露敌人的残暴？”

摄制组按照江青的要求做了检查。这份检查倒也真实反映了他们的思想——他们说，是因为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怪，怕火光处理得大了，会闪在敌人身上，犯美化敌人的错误。江青批评《海港》影片第三场场景：

“色彩失真呀！龙柏和美人蕉堆在一起，大

红大绿，多怯！……太阳也那么大，红的那么特别。……还有早晨，早晨应该是大红，现在是洋红，彩虹的紫色也没出来嘛……”

除了色彩之外，美工师的另一难处是植物造型。

江青批评《海港》中的法国梧桐不好看，“都是矮墩墩的，弯弯曲曲，象长了大瘤子。”

那天，张春桥也在场，他附合着江青说：“是呀！我都看不出是什么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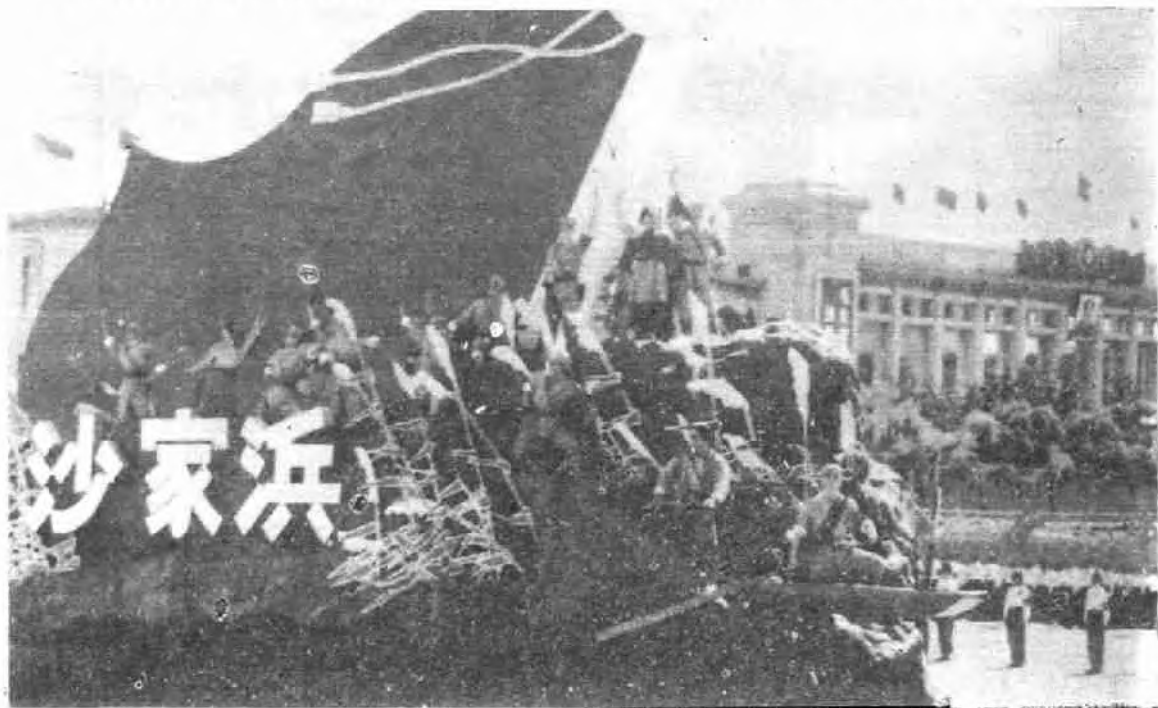
江青还挖苦过《红色娘子军》中的椰子树：哟！这是什么树呀！下面那么粗，上面那么细，是怪胎树吧？哈哈哈……，你们怎么会搞出这样的东西？”

因为江青对《沙家浜》一片中一棵柳树的挑剔，至使这棵柳树整整花费了美工和制景人员 200 多个工时，她才勉强通过。

江青想出了几个新点子，来美化这一场的布景：

“沙家浜是鱼米之乡，景物要富有江南之美的特色。我给你们又精心设计了湖、云、霞；还有樟树、白果树和新的柳树……。”

小小的舞台能够容下的东西，几乎都让江



青设计到了。

剧组根据江青的指示，又是一阵忙。

可是样片出来，江青极度地失望。

“缺绿！缺少层次！湖水的皱纹象海浪，太阳怎么也不红？……我那么耐心地启发你们，你们还搞出这样的东西？！根本问题：是你们缺乏对无产阶级艺术的责任感！”

一天，江青突然感到李玉和家的几场戏色彩单调，马上喊来《红灯记》摄制组。

“你们为什么不开动脑筋，想想办法呢？你们为什么想不到要加点蒜苗、白菜、菊花什么的呢？你们的创作思想是倒着的啊，完全象个迈不开步子的小脚老太婆！”

于是，李玉和家外增添了蒜苗、白菜、菊花。绿色、白色、黄色搭配起来，格外耀眼。

后来，江青又曾多次提出要在“样板戏”中老百姓家布置点绿色，挂上辣椒、大葱和萝卜。

江青虽然讲求影片的用光、配色，但是光靠一流摄影师也不行。我们本身的国产胶片质量不过关，再高的技术技巧，也怕不出来令人满意的色彩。

60年代末期，“样板戏”影片刚刚开始开机的时候，我国一方面从国外大量进口“伊斯曼”胶片；另一方面，特别加强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技术革新。

这种革新，称为“染印法”。主要目的，是改进国产胶片的色彩。旨在第一：拍摄好毛主席的形象；第二：拍摄好“样板戏”。

色彩基调的选择，提出“敌人最害怕革命，最害怕红色，我们就要突出红色、突出革命，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样板戏服务”的原则。确定“以黄为基础，突出红，控制使用青，配以三色平衡”的色彩标准。

江青对电影工业，特别是“染印法”相当关注。她要求中共中央及国务院等领导机构多次召开有关会议，部署、解决电影工业问题。

70年代，中国工业，包括电影工业，本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分管，后由中央领导纪登奎、谷牧分工。江青却始终觉得不得力。她带着王洪文挤进来。

1975年，毛泽东已很少在正式场合露面，周恩来总理也重病在身。王洪文作为政治局的新生力量，逐步接手国务院各部门要事。这使他插手电影工业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1975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一个电影“染印法”工作会议。主要研究电影工业及电影胶片问题。

江青知道后，给国务院打招呼说，一定要“见见”会议代表。

晚上10点，江青在王洪文的陪同下，来到会场，把国务院负责电影工业，并也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纪登奎和谷牧挤在一边。

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江青讲话。

“开会我不知道，不知什么原因让我知道了。虽然我同洪文同志都不是国务院的，但我抓了七年，洪文同志也抓了三、四年了。我们知道了就要尽点责任。”

1984年8月10日，毛泽东接见山东省《奇袭白虎团》剧组



胶片研制与生产只属于工业，不属于文化范畴，江青还没有过吹嘘自己的机会。面对着台下在座的电影科技人员，她认为有必要给他们补上这一课。

她指着自己的一颗牙齿，脸上现出忿恨的神情：

“我童年时对封建主义就非常仇恨。封建主义打我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我被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诺，就是这颗牙……”

大家跟着她杂乱的思绪，一会儿听她讲上高小时因为“爱国”，不肯学英文的故事；一会儿听她介绍年轻时，如何通读了六遍《国家与革命》的经过；然后，再听她关于近三个月来感冒五次的痛苦回忆。

谁也不知道江青这番话与中国的当代电影工业有什么关系。

“可是，”江青话锋一转，“你们呢？不愁吃、不愁穿，条件那么好，搞出来的东西粗得很，我都不愿看了，导演简直是白吃饭！”

她还说，因为她拍过好多好照片，就有人吹捧她。她听不惯吹捧，便“一气之下”，把照片都烧掉，工作室也拆掉了。她扯着嗓子说：“我把一切都交给新华社了，统统交给党。”

然后，江青用手指头一个一个指点着几位摄影大师：“钱江、李文化、张冬凉！我请你们到颐和园去，用用我的采光技术，可你们就是不肯用。这些年，是我拉扯着你们过来的，可你们却顽固到这种程度。”

江青回过头来又喊起著名导演成荫。

“我告诉过你们要用柔光镜来美化我们的英雄，可你们就是不用，成荫，你今天得给我

说说这是为什么？”

成荫站起来，如实地回答说，如果按江青的要求对英雄人物的近景照与大特写加上柔光镜的活，前后就同不加柔光镜的镜头不好衔接了。

有人敢同她理论？江青瞪起眼睛。她要的只是服从，绝不要谁与她讲道理。她立刻打断成荫的话。

“那是你们有私字。该打屁股！你们都是白吃饭。哼！生怕失败。哟！丢了大名可不得了哟！”

“主观世界不得到改造不得了。你们制片厂的人，拿着高薪不干活。都给我下去！学点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谁不下去，我就武装押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她又点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位领导的名：

“你说说，北影厂欠国家多少钱？还没有写剧本就要钱？哪国的规矩？钱迷！寄生虫！垃圾堆！！”

她声嘶力竭，瘦脖子上青筋凸起，吐沫星四溅。

江青喊累了。坐在椅子上喘气。下巴仍翘得老高，似乎是生了所有人的气。

下面的时间全部留给了王洪文，他谈了一个小时与电影胶片毫无关系，却又自以为熟悉的话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整个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纪登奎只谦虚地讲了几句客气话。谷牧片言未发。

对会议内容，与会代表们回去后都不知如何传达。（之一，未完待续）

#### 炎黄春秋杂志社首届理事会名单

理事长：杜导正（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副理事长：贝兆汉（广州白云山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广尧（黑龙江省广泰实业公司总经理）

理事：白亚南（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

蔡道峰（广东潮州市振园运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林春露（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会主席）

秘书长：徐孔（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

## 一群不速之客

一群十六七岁的红卫兵小将，由于一个突然萌发的念头而聚集在这里，策划拦截中苏国际列车。为首的是北京100中的李建军和北京54中的红涛。李建军长得膀大腰圆，典型的一副飞行员体魄，原来100中是北京飞行员预备学校，在里面读书的大多是军队干部子弟。相比之下，红涛则又弱瘦小，但却聪明异常，反应敏捷，与人辩论对答如流，多次靠口才为小分队解围。在小分队里是不可缺少的“军师”。拦截国际列车的念头即产生于他的脑中。

红涛的战友，54中的另一位“极文革”筹委罗建军，前不久在北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即把北京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报纸还登载了他与毛泽东握手的照片。红涛正在哈尔滨串连，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所作为。恰好收到一位同学的来信，信中说：“你和罗建军都是我校红卫兵发起人，如今他在北京，搞了反修路，轰轰烈烈，革命影响大得很；你却在搞串连，什么有影响的

事也没做，你若再做不出点成绩来，还有什么资格回来领导我们？”红涛深受震动，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到海拉尔拦一次国际列车，再到满洲里搞个强大的反对苏修的宣传攻势，才能产生影响，不辱没红卫兵这一光荣称号，以致会给苏修造成不小的压力，自己也为世界革命做出贡献。小分队一行二十几个人立即支持了他的建议。

他们马上和黑龙江省委联系，又到齐齐哈尔边防检查局开了进出边境地区通行证。通行证上写着：“兹有红涛等22名北京红卫兵到中苏中蒙边境一带视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希沿途军警岗哨验证放行。”并在红涛的照片上盖上齐齐哈尔边防局的钢印。齐齐哈尔边防局还为他们准备了皮夹克和皮大衣。他们穿戴武装好之后，立即乘火车向海拉尔进发。

火红癫狂的1966年9月3日，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特快列车，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边陲小城海拉尔。一场被载入中苏关系史的国际事件就此发生。

# 国际 特快 列车



慢车耽误了十几个小时，终于到达了海拉尔市。这是一座颇具异国风光的漂亮小城。

建筑风格是俄罗斯式的，街上奔跑的汽车、摩托车及人们使用的收音机全是苏联制造的。人们的穿戴打扮也风格各异，红涛他们看了既新鲜又好玩。

海拉尔市委恭恭敬敬地迎接着这群来自北京的威风凛凛的红卫兵们，他们几乎成了毛主席派来的钦差大臣。生怕遭到冲击的市委干部，认真地向这群毛孩子汇报工作，对他们要拦截苏联国际列车的想法，不仅不敢提出异议，还特地派向导带他们参观了一直严格保密的日本人留下的“地下城”。

“地下城”是日本关东军30年代修建，为了进攻苏联屯积兵力用的。修完之后，十万名劳工全部被害，尸骨就堆积在海拉尔河畔，成了一座白骨山。那次大屠杀唯一的幸存者就是这位向导——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那时还是个小男孩，在机枪扫射时，他被别人压在身下侥幸活了下来。

日本原打算在希特勒攻克莫斯科后，关东军一举夺取西伯利亚，和德国平分苏联。不料希特勒惨败，关东军这一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苏联进攻东北时，海拉尔一战最为激烈、残酷，绝望了的日本关东军大都在地下城自杀了，尸骨仍在其中。

即使二十几年后，这群胆大包天的红卫兵们去参观时，也不由汗毛倒竖、胆战心惊。

第二天，海拉尔市委派车送小分队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和牧民们联欢。当这群红卫兵中的几个女孩子林东红和李小梅等人在蒙古包前下车时，蒙古族乡亲惊叹道：“真像天仙一般美啊！”

牧民们白天为红卫兵表演了精彩的赛马，晚上围着篝火联欢……

## 一场国际混战

9月3日傍晚，“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就齐聚在海拉尔车站，他们周围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筒、毛泽东画像以及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传单和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小册子。这一切物品都是海拉尔市委应他们的要求而准备的。市委委员在惶恐中向中共华北局发电报告了此事，华北局立即转报中央。中央当时没有立刻答复，于是一切

照计划进行。

北京至莫斯科的1次特快列车缓缓地按时开进了车站，这一站是即将离开中国国境的倒数第二站（最后一站是满洲里）。列车缓缓停稳，车门刚刚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早在等候的红卫兵小将们便一拥而上，在车门前或在车厢外。迅急展开了反对“苏修”的革命行动。

胖敦敦的北京女十二中的林东红，这时却灵巧地一下子窜到车厢里，不由分说就去张贴毛主席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一惊，不知道她要干什么，等明白过来后，也不甘示弱，愤怒地将画像扯下来，撕个粉碎。

当时正是视毛泽东为神的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因为不小心写错一个字或说错一句话被打成反革命，挨批斗或蹲监狱。苏联女列车员公然撕毁毛主席像，在林东红的眼里简直像是吃了豹子胆，是可忍孰不可忍！“你敢撕毛主席的像！”她愤怒地吼起来。

苏联列车员不懂汉语，嘴里不停地嚷着：

“Бандит（“土匪”）！”

林东红不懂她讲什么，只管往包厢上大刷浆糊，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不住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北京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建和北京女四中的严静等一群人，正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着“反修”的传单和小册子。旅客们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出认真阅读的样子，看出他们是日本人；有的人连看都不看，象扔废纸似地轻蔑地扔到窗外，他们显然是俄国人。

一场不可避免的混战开始了，双方吵得脸红脖子粗，但驴唇不对马嘴，谁也听不懂谁的话。

车下也是一阵纷乱。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在车厢外刷写着大标语，他们身边站着几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和几个来阻挠他们的俄国人又推又搡，大吵大闹，不许“苏修爪牙”干涉他们的“革命行动”。

# 在边境被 毆

另一拨人则把车站月台变成宣传讲台，面对三三五五稀稀落落的外国旅客，激情满怀地发表“反修”演说。

红涛在一节车厢门口，正用流利的俄语和一个苏联女列车员激烈地辩论着。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现在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你反对革命吗？”

红涛愤慨地说，苏联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十月革命，他们现在欺压苏联人民，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投降美帝国主义。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对方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反共反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前空耻辱。你们不要上当。

她还拿着一份《真理报》读了一段，“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进攻欺骗不了任何人。毛泽东集团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它有力量，而是由于它虚弱，害怕自己的党和人民……”

红涛愤然反击：“《真理报》无真理！”

对方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唯恐天下不乱的外国记者兴奋得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没完，录音机转个不停，手提打字机也“嗒嗒”地连声响着。

口号声、叫骂声、辩论声此起彼伏，寂静的小站喧闹非凡，人声鼎沸。

列车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早已超过了10分钟的正常停车时间。

站长来找李建军说：“现在该放行了吧？再不放行，造成事故的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站长同志，我们这是革命行动，党中央毛主席支持我们，你害怕什么？你没听说吗？北京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前几天改成反修路了，毛主席还接见了发起这一行动的红卫兵……”严静说。

“别和他罗嗦，支持我们反苏修，他就是革命的，不支持就是反革命，就夺他的权，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北京36中的张小游不耐烦地说。站长一听，脸都气青了。

李建军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看，差不多可以了，让车走吧。”

站长发了信号，火车一阵长鸣，准备起动。

突然，几个小分队成员跑来说：“林东红、李小梅不见了，可能让苏修绑架了！”

李建军大吃一惊，冲着站长嚷着：“马上让车停下来！”

站长破口大骂“苏修王八蛋！”立即发了紧急停车的信号。

早有几个小分队成员以百米赛的速度，跑到车头前面二十多米的的地方，横卧在铁轨上。

列车刚刚移动，又来了个紧急刹车，距卧轨者只有几米远。

李建军等人迅速跑到一节车厢门前敲门，苏联列车员在里面怒目而视，硬是不给开。站长勃然大怒：“不开，他妈的给我用银头砸！”几个工人早已拿来了大银头，递给了站长，他一边砸门，一边说：“没我的命令，不许放行！”苏联列车员终于打开了车门。几个身强力壮的红卫兵一拥而上，推倒了几个拦路的俄国人，一个包厢一个包厢地搜寻。

终于在一个包厢里找到林东红和李小梅，她们被反绑着，嘴里塞着毛巾。松了绑后，伙伴们扶着她们走出车厢。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修，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同仇敌忾，异口同声。

“拿油漆把车厢的那一面全涂上标语，上车，把没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红涛说。

“写汉语他们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你会俄语，你带着人去写吧！”

于是，红涛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和排笔刷子，绕到车厢另一面，在车厢上用俄文写满了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捍卫马列主义！”

“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接着通过了满洲里，离开了中国国境，驶向了西伯利亚旷野。但是这趟列车并没有直驶莫斯科，进入苏联国境后就被苏边防部队扣住，费了几天工夫才清除完车厢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负责人还遭到了逮捕。

“战斗”结束，小分队召开全体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评红涛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我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7日再搞一次行动，然后到满洲里，传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 一个紧急电话

9月6日，海拉尔市委的同志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小分队的电报，电文是：“你们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小分队的人一一传看着电报。华山问他们下一步的打算。李建军讲了小分队的计划。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这一次你们要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有人对电文感到迷惑不解，“又是‘注意策略’又是‘很好’，是批评还是表扬？”还提出了许多其他问题。

华山拐弯抹角，对具体问题一概不明确答复，但坚持让小分队事前一定要请示中央。小分队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7日，在海拉尔市委的帮助下，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然而到下午还未和党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苏联的国际列车，留下红涛一人再做最后的努力。

他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电话，要求直接找周总理。电话员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红涛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海拉尔，有重要事情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找不到，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任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马上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现在在海拉尔单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充分肯定你们的反修行动，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的水平，我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胜利。”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

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汇报请示。”

## 一个“光荣”噩梦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但不要上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们一闹，他们就说你们侵犯了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事件，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红涛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告诉他总理的意见。他和大伙商量了一会儿，回答说，“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已到，他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的人已闹到列车里演讲。我们大家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红涛又给总理打电话。总理说。

“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够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修欺负了吗？毛主席听了很生气，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在10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召开大会欢迎你们，毛主席也要接见你们。我等待你们凯旋。”

红涛说：“10日前赶不回去。”

总理说：“我派飞机接你们。”

后来，北京又来电话，由于海拉尔军用机场停不了大型客机，让他们到哈尔滨乘飞机返北京。

周恩来放下电话又回到会场，继续他的讲话。他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刚才电话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的红卫兵，我们最可爱、最勇敢的红卫兵，他们想在各条战线上破旧立新，前几天搞了反修路，我们坚决支持了他们。现在他们的劲头可大了，有一股北京的跑到海拉尔，闹到苏联国际列车上去了。我刚才打电话叫他们下来，他们听出我的口音，问是不是毛主席的话，我说当然是毛主席说的。他们一听说是毛主席的话，马上就下来了。他们是好孩子，的确很可爱。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9月9日，小分队一行二十几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他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他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小分队的成员向在场上千名红卫兵说，“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的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小分队的人十分激动、兴奋。

接着，周恩来开始回答红卫兵们提出的问题。

有人提出，“8·18”以前成立的红卫兵，经过镇压的斗争考验，是真正的红卫兵，“8·18”以后成立的红卫兵，是搞投机赶风潮，不能算红卫兵。

周恩来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8·18”毛主席在天安门同红卫兵见面后，红卫兵多了起来，这有什么不好？不能说“8·18”以前是红卫兵，“8·18”以后就不算了！你们算老红卫兵，老英雄，但后继无人也不好。红卫兵不能搞垄断，垄断是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是要全世界都无产阶级化的。8月18日前成立的是创始的，我们佩服，但8月18日后风起云涌成立起来的，我们也应该欢欣鼓舞。

有人要求把信号灯的作用颠倒一下，应当红灯行，绿灯停，因为红色代表革命，“革命怎么能代表停止呢？”

周恩来回答说：“这个意见前几天女15中提出来过。我和谢富治同志很重视，马上找人研究，司机们都说不行。晚上绿色与白色分不清，特别是在雾天，绿色看不清，只有红色最鲜明。红灯不仅是革命的指路明灯，也是保证安全的明灯。”

还有人批评周恩来对中学红卫兵的关心不够。

周恩来婉转地说，“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你们责备我们对中学红卫兵关心少了，我们只能承认有部分道理，不能完全接受。我这二十多天，向大家报告，都是在接触中学红卫兵。8月下旬，你们在苏联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斗争了一个多星期，要把扬威路改成反修路，还组织了几十万人游行，我就是支持的，和大家一起准备的。当时我向北京卫戍区的同志们说：‘如果苏修使馆出来挑衅，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誓死保卫中学生，不能动中学生一根毫毛。’所以，不能说我们对中学生关心少了？”

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两点多了，周恩来在小会客

厅里单独接见了小分队。他和小分队的成员们一一握手，称赞他们的革命精神。当和红涛握手时，周恩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他回答说。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听说你和他们用俄语辩论了两个多小时。你是小分队的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周恩来又问他们是哪个学校的，要他们都坐下来，具体汇报了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又谈了东北、内蒙的文化革命发展形势。

他们提出了几个无法理解的问题：本来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这次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倘若如此，我们的党不是完全变质了吗？我们快到满洲里时，满洲里市委有的干部拉家携口跑到苏联去了，说是让我们吓跑的。中央为什么不采取措施……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介绍道：“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我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我。”

接见快结束时，周总理和小分队全体成员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红涛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2观礼台上。在城楼上，毛泽东接见了他俩，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他俩握手。

小分队的声誉此时达到了顶峰。

有一天，红涛到外交部去了解苏联对这次事件的反应。

苏欧司的老刘说：“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只得答复说，此次行动并不是我国政府所为，而是民间所为，对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一下把抗议照会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再看看这张《真理报》，就知道苏联的反映了。”

红涛拿起报纸一看，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他们

拦截国际列车的塔斯社消息，称他们为“暴徒”，“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红涛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

他回校时，另一位红卫兵领袖罗建军见面就问他怎么想起跑到海拉尔拦国际列车的？

“还不是受你的启发，你在北京搞了反修路，闹得轰轰烈烈，我岂能落后，现在咱俩算拉平了，你搞了反修路，我拦了国际列车。”说完他俩哈哈大笑了起来。

小分队回来后，补充了新成员，全队扩大到三十多人。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时，有人说，应当继续北上，到满洲里去完成尚未完成的行动计划。有人说应当到南方去“煽风点火。”红涛和李建军商量了一下，干脆兵分两路，一路北上，一路南下。北上由红涛带队，南下由李建军负责。

9月21日晚，红涛带领一路小分队北上。

他们坐火车刚到天津站，就听到车站的大喇叭广播说，“红涛同志，请你马上下车，有紧急电话。”电话是林东红打来的，她说：“周总理听说你们北上，十分着急，他让你们马上回来，天津市委派车送你们。”

他们立即下车出站，赶到天津市委。市委已派一辆小面包车在门口等候。红涛和市委一个同志谈了几句话后，就和小分队的同志一起乘车回到北京。

车一直把他们拉到人民大会堂。

这是红涛第二次到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是7月29日，和罗建军一起参加北京新市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那次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对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问题做了检查。刘少奇在检查时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会见快结束时，毛泽东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出来和大家见了面，中华大地，从此全部卷入红色风暴之中。

红涛他们被领到江西厅，周恩来正等着他们，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们握手，只是表情很严肃。

待他们坐下来，周恩来先批评他们没有打招呼，就再次北上。他说：“我不同意你们北上，那里的情况你们已经了解了嘛。还有许多新东西你们需要学习，许多新问题等待你们去了解嘛！”又建议他们到西面去，看看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他们不清楚总理为什么不同意他们北上，西面又是哪儿……



# “重庆”号

## 巡洋舰的

# 最后

# 秘密

●竹繁

迄今为止，“重庆”号军舰是我国唯一的一艘巡洋舰。它建造于1937年，曾参与过诺曼底登陆战役，排水量为5270吨，舰员编制约600人，武器装备主要有6吋口径的主炮6门、4吋口径的高炮8门及多门口径不同的副炮，还有6具直径为21吋的鱼雷发射管。在当时这无疑一艘颇为现代化的战舰。1948年夏天，英国政府依据租借法案将这艘名为“震旦”号的巡洋舰移交给了中国。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移交后更名为“重庆”号。

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起义成功，震惊中外，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以“重庆”号的强大优势火力，一旦为我党所掌握，必然是如虎添翼，为此，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要不惜代价找到它，击沉它。

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的侦察与轰炸，“重庆”号舰从烟台港悄悄航行至辽东半岛的葫芦岛，停泊在防波堤的一侧。经过伪装，如果从空中俯视，对于不熟悉港口情况者来说，肯定会将其当成防波堤的组成部分。

为了寻找“重庆”号的踪迹，国民党空军每天出动多架飞机不断对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黄海、渤海海面实施侦察，20天竟无收获。

3月中旬的一天，作为副驾驶的上尉飞行员王金笃驾C47运输机飞抵辽东半岛上空实施侦察。飞抵锦西上空时，王金笃忽然发现了一个疑点：怎么葫芦岛港的防波堤多出了一大截？这个副驾驶为何对这里的地理情况如此清楚？原来这个赴美受训后任国民党空军4大队21中队飞行员的王金笃是一个钓鱼迷。在驻防葫芦岛时，沿海的不少地段都是他的钓鱼好去处，其中葫芦岛港的防波堤就是他的常去之地，对防波堤的长短等情况都了如指掌。所以虽在数千米高空他还是仅凭目力就发现了疑点。

“有情况，降低高度，再在葫芦岛上空绕一圈。”他一边急切地向正驾驶喊道，一边两眼紧紧盯着葫芦岛港的防波堤。当飞机降至1000米左右时，忽然隐蔽在葫芦岛两边的高射炮以密集的猛烈炮火拦击。一见有炮火射击，王金笃更认定这里面有名堂。于是，在求功心切的驱使下，飞机竟降至150米进行超低空侦察。这下看清楚了，长出的那段防波堤就是上面伪装有树枝的重庆号巡洋舰。机上的通信员迅即将此情况电告国民党空军第二军区的陈嘉尚（曾任过国民

党空军总司令）。接获这一电讯后，陈一边令王金笃等人继续留空监视，一边派遣另两架同类机去接替监视。同时，他调兵遣将令驻上海的8大队的7架B24重型轰炸机于次日飞抵青岛机场作好轰炸准备。3月18日，陈嘉尚亲自搭机任空中总指挥，用C47运输机对“重庆”号巡洋舰实施首次轰炸。

由于地面防空火力的猛烈射击，飞机始终不敢低空投弹，所以，头两天的连续轰炸几乎无损“重庆”号的毫毛。据此，之后的轰炸战术则改变为由4架B24轰炸机以4200多米的高度进行水平轰炸，而C47运输机则在附近海域上空低空盘旋观察轰炸效果，校正炸点误差。

谈起轰炸效果，王金笃最近披露道：

由于是高空轰炸，前两架轰炸机的投弹均偏差较大，第三架才有弹直接命中“重庆”号的舰尾，第四架又炸中烟囱的后部，使得舰身起火，整个战舰翘出水面，在多处中弹后无法动弹。不肯罢休的国民党空军又分别于19日和24日两天再次出动飞机进行轰炸。见如此狂轰滥炸，“重庆”号已不可能保住，于是舰上的官兵只好放开海底门让战舰自沉于葫芦岛港内。

求实  
篇



# 中国百业研究中心北京百业档案用品公司

为了更加适应各企、事业、机关团体档案部门、办公部门及文秘部门的工作需要,特向各界介绍我部产品。我部对所经销产品信誉第一,质量保证,实行三包,并代办邮购托运及包装。运费按货款的10%(邮寄按15%)预收,多退少补。

单位:元

序号	名称型号	单位	售 价	性能及用途
1	缩微摄影仪 SL-35	台	169500.00	缩微率 6.5—30 倍,自动准确曝光,对各种不同文稿均可获得理想的密度。
2	冲洗机 SC-1	台	39550.00	系高温常温台式两用自动冲洗机是缩微摄影仪和拷贝机配套产品 35.16mm 均可。
3	平片摄影机 SP-1	台	25990.00	可将文献资料逐幅拍摄在感光片上,每张单片可容纳 98 个画面和一个行标题区,适于情报、公安、档案部门拍摄文献资料杂志图书等。
4	装柜机 ZPE-200	台	11017.00	系缩微工作必备仪器准确的输片机构和高精度的切片粘接机构保存阅读拷贝复印。
5	拷贝机 KB-2	台	5085.00	本机适于 16 及 35mm 成卷胶片的拷贝。
6	皇冠文件粉碎机	台	3200.00	碎纸成粉末状,确保机密。国家保密局监制。
7	检索柜 JPG	台	3164.00	用于缩微平片(或开窗卡存贮和检索)适于厂矿企业、档案、情报、医院、图书银行等部门。是理想存贮检索设备。
8	阅读器 YF-35	台	6441.00	适用 16 及 35mm 等多种缩微胶片阅读,具有性能稳定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等。
9	阅读器 AYA	台	2825.00	大屏幕阅读器操作方便、价格便宜,适于范围广。对工程图纸,报纸的阅读效果更佳。
10	阅读器 YF-35	台	6215.00	适用 35mm,有孔、无孔缩微胶片及开窗卡,如再配其它镜头可供阅读 16mm 缩微胶片。广泛用于图书、档案、情报、科研及厂矿企业等。
11	CD-16 空气吸湿机	台	2258.00	吸水量 16kg/24 小时,噪音 55DB 可解决 30m <sup>2</sup> 库房去湿。
12	CD-12 空气吸湿机	台	2078.00	吸水量 12kg/24 小时,噪音 35DB 可解决 20m <sup>2</sup> 库房去湿。
13	便携式小型复印机	台	5800.00	合资产品,方便灵活,无需要控购,经济实惠,适用于中小档案部门及办公部门。
14	复印机臭氧净化器	台	大号 1989.00 中号 1600.00 小号 1310.00	可净化复印机工作时产生的臭氧。保护工作人员的健康,获优秀发明奖。
15	加湿 201 型	台	320.00	201 型 24 小时加湿量为 2 加仑,适用于 20m <sup>2</sup> 房间。
16	“文善”装订机	台	398.00	具有装订整齐迅速及操作简便之特点。
17	长城牌 DG 资料柜	个	2825.00	适用于存储 16 及 35mm 缩微匣装片盘,还可根据需要制成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带等不同装置。重量 150KG,体积 13201×595×728
18	多功能化学气体消毒柜(奇星牌)	台	2400.00	是利用化学药剂的升华作用,具有杀虫灭菌迅速,效果理想,达到保护档案的目的。
19	密集档案架	节	1100~1400	钢制,每例三至五节可自由选择、多列组合。本产品适应于机关、档案、工矿、医院等安装使用具有占地少,节省资金,使用方便等特点。产地北京。
20	声像档案柜	台	2600.00	防磁、防尘、防光、贮藏量大、查找方便,外型美观,已通过国家级鉴定。
21	磁盘档案柜	台	2450.00	性能同上。
22	零号底图柜	套	4100.00	三节为一套,每节五个抽屉。适用于设计部门存放图纸,美观大方,抽拉轻便。
23	壹号底图柜	套	3400.00	同上
24	卡片柜 20—60 厘	套	1370.00~ 3580.00	具有存放量大,查找方便。
25	五节档案柜	套	783.00	钢制、搬运方便、占地量小。
26	普通双节档案柜	套	760.00	钢制、适用于机关、厂矿、办公部门等使用。
27	密码双节档案柜	套	783.00	钢制,适用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档案办公部门。
28	财务档案柜	套	830.00	钢制,适用财务部门存放凭证。
29	桌上文件柜	个	188.00	0.15 m <sup>3</sup> ,适于存放文件、单据等。
30	玻璃文件柜白色 茶色	套	750.00 760.00	钢制、美观、大方、使用方便。
31	大门柜	个	770.00	钢制、美观、大方、使用方便。
32	二门更衣柜	套	845.00	钢制、美观、大方、使用方便。
33	三门更衣柜	套	860.00	钢制、美观、大方、使用方便。
34	8 开落地式切纸机	台	885.00	可切厚度 5 厘米,最适合办公、档案裁切,另加包装费 100 元。

序号	名称型号	单位	售 价	性能及用途
35	16开落地式切纸机	台	550.00	可切厚度3厘米,实用方便,另加包装费80元
36	久锋DQ-1型切纸打洞机	台	292.00	简便、实用、方便
37	会计传票装订机	台	470.00	方便、迅速(电动、手动)
38	飞蝶牌单切纸机	台	198.00	适用于档案,资料整理工作
39	四步梯	台	290.00	使用方便、轻巧灵活、稳固可靠
40	双层折叠书车	辆	270.00	方便灵活、适用于厂矿、机关、医院、饮食、旅社。
41	温湿度直观表(带石英钟)	块	83.00 92.00 114.00 123.00	实用、美观、适用档案库等部门
42	信封开启器	个	26.00	方便、实用、开启信封不用手撕
43	文件卷盒	个	1.80	国际GB9705-88,进口牛皮纸制规格3000×220×30(40,50)
44	文书卷皮(硬)	个	0.85	国际GB9705-88,进口牛皮纸制规格280×210×20(20)、300×200×15
45	文书卷皮(软)	个	0.35	国际GB9705-88,规格297×210 800×220
46	科技档案盒	个	1.80	进口牛皮纸 规格 300×220×20
	档案盒	个	4.10	塑料制品
47	科技档案夹	个	1.10	16K厚25、30mm进口纸板300×200×20
48	会计档案帐簿盒	个	1.80	进口板纸,规格298×220×25
49	会计档案(凭证)盒		0.75	进口板纸 规格280×140×20(30,40)
50	会计档案帐簿盒	个	1.10	360克进口板纸,规格299×220×25
51	公文(档案)袋(百)	个	38.00	16K进口牛皮纸制
52	文书卷内文件目录 文书卷内备考表	百张	3.80	国际GB9705-88,国内通用16K型60克书写印纸制,规格260×185
53	著录卡片	百张	5.00	250克铜板卡双面压暗格,规格127×75
54	照片档案册	精套筒	35.00 20.00	美观实用,漆布外护封面,可各存60张照片和底片活页。
55	防霉剂	盒	39.00	气味清淡,效果明显,每盒60片
56	高效香型防老杀虫片	盒	38.00	气味清淡,效果明显,每盒50片
57	长效抗霉驱虫灵	盒	32.00	精装每盒40片
58	BY-DALJ档案 辅助立卷系统软盘	每套 2张	55.00	适应各类型微机,可根据需要自动排列卷内文件,自动计算文件件数页数自动生成带国颁标准目录表格文本文件并可输出打印。
59	CDW档案文件资料 微机管理系统	每套 一张	220.00	1、科技档案管理系统 2、文书档案管理系统 3、文件材料管理系统 4、缩微胶片管理系统 5、借阅处理管理系统 6、工人干部管理系统 7、档案状况统计系统
60	电脑资料夹	个	横 22.96 竖 19.32	用于存放各种电脑资料
61	加厚装订机	个	25.00	用于纸张、皮型、屏蔽柜缘装订
62	相对湿度自动控制记录仪	台	950.00	适于档案、图书、情报资料,文物等严格控制相对湿度自动测量自动控制、自动记录等
63	铅笔字迹固定液	瓶	14.70	用于使用铅笔字迹的保护。价格根据数量面议
64	保险柜	台		有不同样式及规格。

我部还备有各种办公文具用品、档案专业书籍、参考资料。

中国百业研究中心北京百业档案用品复兴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真武庙二条十号。

(总工会大楼东侧南200米处,可乘1、4、19、42、52、56路及地铁南礼士路下车,320路白云路下车)

电话:3262858 3260026 经理:王建军 徐学京 刘建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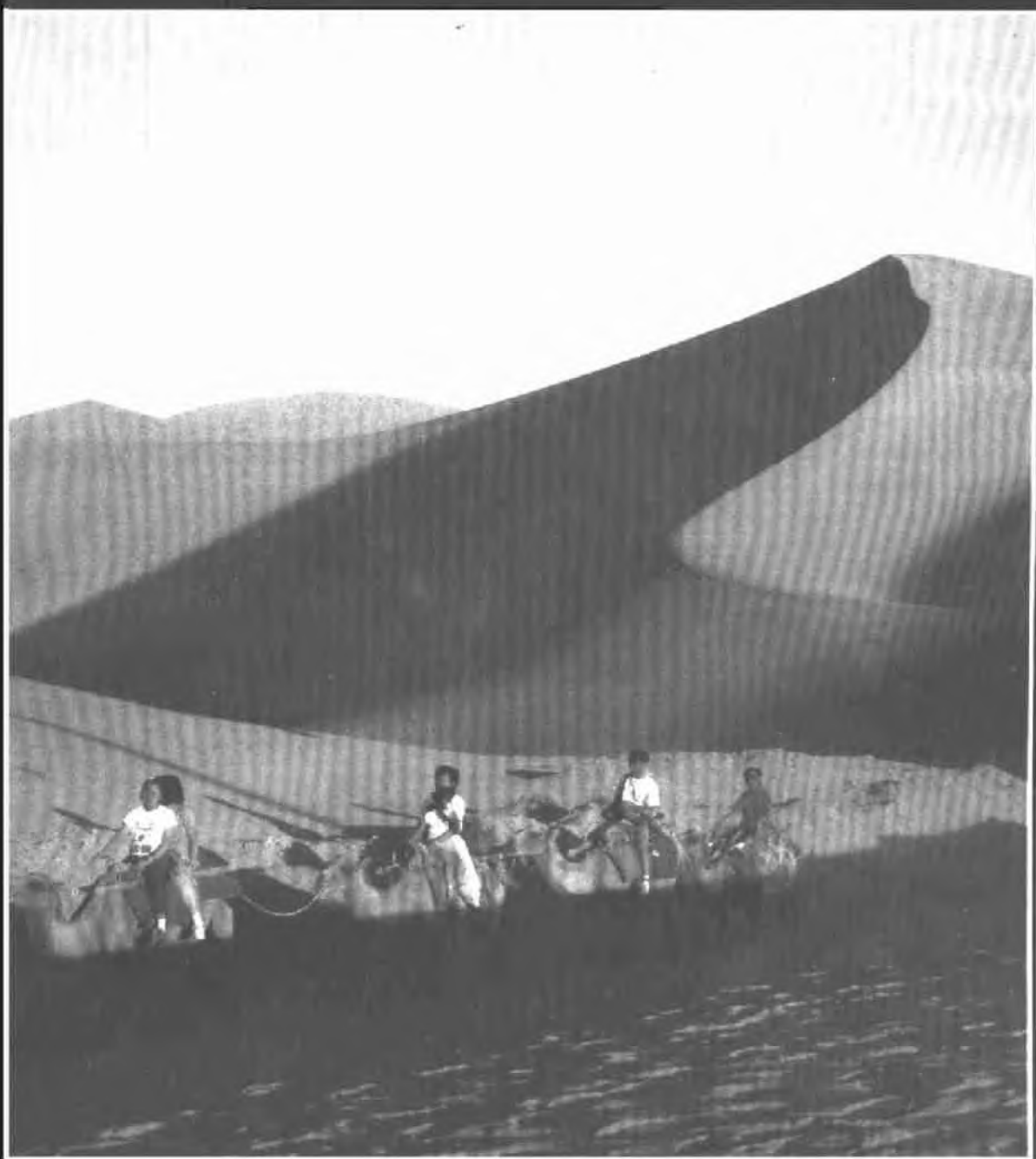
联系人:杨瑞琴 施青山

帐号:工商行北京南礼士路分理处 36-661073-05

### 订 购 单(回执)

产 品 名 称	序 号	订 购 数	金 额	备 注
				货款已于 月 日通过邮局、银行汇出,人民币 元,另包装发运费(货款)的10% 元一并汇到
合计金额(大写)				
购货单位(盖章)	经办人:	火车到站	邮政编码	

注:此单裁下寄北京西城复兴门外真武庙二条十号中国百业研究中心百业档案用品服务部收。邮编:100045



炎黃子孫同屬炎黃  
春秋千載共渡春秋



戲臺女皇夢：樣板戲秘聞實錄

我在周恩來專機上做空姐

華國鋒“欽定”

毛主席紀念堂設

計方案



●四封设计：刀达

炎黄春秋 1993/9(总第 18 期)

统一刊号：CNI—2817 定价：2.98 元